



Education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雪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福利

[英]诺曼·巴里 著
储建国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Welfare

福利

[英]诺曼·巴里 著
储建国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利/(英)巴里著;储建国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Welfare

ISBN 7-206-04587-1

I. 福… II. ①巴… ②储… III. 社会福利—研究 IV. C9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876 号

Norman Barry

Welfare

(Original ISBN: 0-335-201423)

Copyright©Norman Barry 1999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福利

著 者:诺曼·巴里 译 者:储建国

责任编辑:崔文辉 贺 萍 封面设计:陈 东 责任校对:闫 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37801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5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75 字 数:13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587-1/D·1397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 | | | | |
|-----|-----|-----|-----|-----|
| 万俊人 | 马德普 | 马敬仁 | 孙晓春 | 李 强 |
| 任剑涛 | 应 奇 | 何怀宏 | 林尚立 | 姚大志 |
| 胡维革 | 贺照田 | 高 建 | 袁柏顺 | 徐湘林 |
| 夏可君 | 顾 肃 | 梁治平 | 曹德本 | 葛 荃 |
| 谭君久 | 薄贵利 | | | |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斌
叶兴艺 赵多方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福利”是社会科学中富有争议性的概念，它容易引发政治学和经济学中诸流派的激烈论战。诺曼·巴里的这本书主要探讨福利观念与各种政治哲学之间的关联，可以为关心福利问题的读者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福利哲学起源于19世纪的功利主义，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主流是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但各种福利观念也在旁边生长出来。尽管斯密认为市场可以让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促进公共利益，但他也披露了对市场失灵的担心，认为政府在法律和秩序之外，还有建立和维护某种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责任。这可以理解为，福利不是通过纯粹交易而最大化的，因为存在不能由市场定价的可欲之物，它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边沁提出了某种集体形式的福利观念，他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可以成为政府福利政策的依据。但边沁的含糊之处在于，他既可以建构比《国富论》

远为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也可以建构允许国家权力扩张的福利理论。后来的功利主义者在福利方向上发展着边沁的理论。边沁的秘书查德威克根据效率原则给国家行动发了执照，对政府改进福利的能力持乐观态度。而斯图亚特·穆勒则将社会正义概念引入古典自由主义的殿堂，他的机会平等正义观成为 20 世纪福利哲学的思想源泉。

现代福利理论的诞生依附于对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概念的重新解释。格林认为自由指的是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它让我们去做那种值得做和值得享受的事情，也是我们与他人一起做或一起享受的事情。霍布森和费边主义者则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不会显示亚当·斯密式的均衡倾向，而会显示金融寡头的独裁主义。霍布豪斯认为自由不是仅仅没有限制，而必须包括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关心个性发展的自由需要一种合适的平等概念，因为“没有平等的自由是高贵声音和悲惨结果的代名词”。重大的不平等将个人自由转化为某些人位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国家有责任以集体善的名义对此加以校正。

积极自由主义者一般支持国家的积极作用，它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市场在供给福利方面的不足。他们的福利主张一般可以转化为某种权利理论，也就是积极权利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国家增加个人在社会中的机会和能力。这种权利是一种法律权利，它不重视那些对福利起支持作用的社群纽带，因而甚至可以证明物质财富向国外转移的有效性。

正是由于权利理论的不足，有的福利学者便将公民资格理论嫁接到权利观念之上。它将福利要求的适用范围只限于特定社群，人们根据社群成员的资格而享受某种福利。这便将普遍主义的福利观转化为特殊主义的福利观。马歇尔区分了三类公民资格：法律公民资格，它包括自由表达权利、财产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等传统的权利；政治公民资格，它覆盖了一个民主政体中的政治权利；福利社会公民资格，它让人们拥有某种资源的权利资格。公民资格的道理在于它能够将所有个人整合进一个社会，但这种思想似乎太不明确，不能满足普遍的正义观念所意味着的那种严格性。

有一种社会福利理论用“团结”观念来为福利进

行证明，它认为，一个社会的福利不能简化为个人因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而有权享受的幸福体验，而是包括了理性和社群情感的复杂融合。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其实接受了经济“租金”，没有社会合作的存在，个人的收入会更少。因此，福利是来自集体资源的一种“补偿”形式。

还有一种社会福利哲学强调平等本身，它不是为社会和经济意义上必要的不平等提供正当性证明，也不是识别和消除客观的需要，而是为了自身目的的平等主义。而平等取向的福利观念也有冲突：自由主义者就赞赏市场的平等主义，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其实是非常平等的，集体主义者则看重国家在促进平等方面的作用。

除了古典自由主义者之外，其他流派的福利主张都为福利国家理论做出了贡献，以致在 20 世纪中叶以后，福利概念几乎与福利国家概念融为一体。在很多人看来，促进福利的责任完全在于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批评了将福利与国家福利联系起来的观念。他认为福利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不仅可以来自自愿组织、教会等等，而且可以来自

市场本身，而国家则是这里的后来者。很明显，作者尽管不反对国家提供某些福利，但他对国家持怀疑态度，希望进一步挖掘市场和社群的福利价值，不要过分依附于国家。在当代西方社会，这种福利观倾向于新右派观点，相信中国的读者会以批评性的眼光来看待。此外，作者对于福利理论的讨论是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的，文中罕有提及其他制度形态下的公共政策中福利实践，观点难免狭隘和偏颇，这显然和作者的西方背景有关系。同时，文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和我们所持的观点不同的地方，凡此种，还希望读者在阅读进行甄别和批评，秉持正确的原则，进行得当的取舍。

编者

第一版序言

当代社会和政治思想为福利概念所主导，这也许会让上个世纪的评论家们感到惊讶，而那个时候并不缺乏这方面的话语。事实还远非如此，因为当前关于福利的政治论争中运用的一些思想至少两百年以前就开始形成，真正的差别是现在将它们置于中心位置。有一种律令要求国家最大化，一种叫做“福利”、“幸福”或“满足”之类的相当模糊而散乱的东西，这种东西现在似乎压倒了所有其它的政治价值，尽管它一度被理解为政府日程表中的次要项目。甚至一些反国家主义作者也在这样那样的意义上将福利视为惟一的存在之必需（*desideratum of existence*），尽管他们主张这要通过个人的实践而非直接的政治行动来实现。因此，“福利”便成为一个特别“现代”的概念。

这在本书中，我试图概括这个概念的主要特征，阐明它在典型政治论争中的作用。这项努力必然包括在正义、平等、自由和权利等其它政治概念的背景下来讨论福利问题。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些概念中提炼它，以便分离出它的不同特

福 利

征。这是一项特别困难的工作，因为任何关于福利的评论注定要充满关于政治生活实质性目标的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假设，而国家的作用和个人自我实现的意义便成为争论的关键领域。

我试图说明，当代思想中一个最具决定性的元素是将福利思想转化成福利国家。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在政治论争中，除了那些更抽象的政治哲学之外，福利不可避免地当代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联系既非在分析上具有说服力，也非一种准确的历史描述。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已经说明，存在各种各样的福利来源，只是在 20 世纪中叶，它才成为某种知识共识的一部分，这种共识认为政治当局应该对福利的供给负主要责任。的确，这种共识是短命的，在当代政治思想中，我们正在见证从事前述“转化”工作的一些重要作者在进行尖锐的批评。

考虑福利问题，必然要认真分析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主张。正如我在倒数第二章指出的，福利问题不能被不合理地解释为对社会世界的这些传统的和竞争性理解的一个例证。而且，我还指出，在任何福利讨论中，如果对围绕该主题的争论达成决定的可能性抱怀疑态度——只要不是绝望态度，就会使讨论得以改善。在理论层面，这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政治实践中，这种概念的不可操作性已经产生了难以解决的政策问题。因此，来自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资源的许多福利“措施”孵化了有害的后果，这是它们的作者所没有预见到的。如果告诉当代怀疑论者，许多与社会政策有关的当代问题其实重演了在政府卷入福利促进活动的整个历史中所发生的事件，他

们只会感到一丝舒坦。

尽管如此，我的解释主要不是历史性的。我试图对福利观念的发展提供一个历时性的解释，但集中探讨当代问题和论争，它们以这个概念的知识传记中流行的价值和道德规训为背景。因此，这里没有参考汤姆·潘恩的《人的权利》，这本书包含了现代福利国家的种子，但较多地参考了功利主义——显然是因为它们的辩护框架在福利和福利国家的有效性证明中长期占主导地位。

另外，本书中很少有或没有实际的材料。有过多的关于福利和福利制度的统计研究，它们主要来源于美国和英国，但大多是短命性的。对于我来说，重要得多的似乎是要提供这些概念、理想和价值的总体图画，它们现在和过去都遍布于关于这个争议性主题的政治讨论之中。我毫不怀疑，在未来，这些理论和观念材料会发现同样有用。

大部分手稿写于白金汉大学，感谢伊利莎白·斯蒂华特和利兹·克雷顿的出色打字。然而，它是在俄亥俄州保玲·格林州立大学社会哲学和政策中心完成的。我还感谢这个机构提供了一流的研究设施。我还要感谢玛丽·蒂尔席瓦的秘书工作。

诺曼·巴里

保玲·格林，1989年9月

第二版序言

此书于 1990 年出版后，福利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在第二版中所努力做的是进一步简明第一版所没有完成的一些概念要点，继续研究已经开始探索的一些考察线路。因此附言中包含了比第一版稍较详细的对需要及其相关思想的分析。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我继续进行 1980 年代已经开始的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福利制度和政策在美国和英国已经受到强烈的、批评性的分析，我发展了其中的一些思想。有意义的是，考虑福利问题的道德思路得以复兴。这对古典自由主义福利理论的影响与对更为集体主义的思路的影响一样重要。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福利国家将不可能以目前的形式存在。后面的文字有望就当代的变化给读者提供关于理论原由的洞见。我要感谢我的研究助手，法耶·马珊，感谢她在本版准备过程中的娴熟和完整的工作。

诺曼·巴里

白金汉，1998 年 2 月

目 录

第一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章 政治思想中的福利观念 1

第二章 功利主义和福利哲学的起源 19

第三章 反个人主义：从最小国家到福利国家 38

第四章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福利 55

第五章 个人主义的批评和福利伦理学 78

第六章 正义、平等和福利 100

第七章 福利、福利国家和政治 118

第八章 福利：后记 153

参考书目 177

译名对照表 185

译者后记 191

第一章 政治思想中的福利观念

一

在当代政治和社会思想中，福利概念或许正在经受最彻底的检讨：一种来自各种意识形态说辞的智识拷问。这种考察的原因既是当下的，又是长远的。当下原因是目前人们对福利哲学的一种特殊应用——“福利国家”——感到不满意，而更富永久性的争论源泉是福利理念相对于正义、平等、自由和权利等其它评价性观念的合适位置和道德位阶。

一开始，最重要的是要将福利概念与为了方便起见而一起置于“福利国家”名下的各种社会经济安排和公共政策区别开来。这样做至少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对当代大多数民主国家所特有的福利国家观念持批评态度并不会导致拒绝或怀疑福利与一种充分表达的社会哲学之间的关联。的确，福利国家的一些怀疑论者也许有理由认为，它的许多典型特征，譬如说，所

福 利

谓的家长制、强制和无效率等，本身就是合适的人类福利概念的破坏因素。其次，由于福利国家只是一套制度安排，所以它隐藏或掩饰了复杂的评价原则：（肯定）没有人看重以安排本身为目的的安排，安排所拥有的任何价值必须是它们在促进更一般的和有道德感召力的人类目标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功能。福利国家的主要制度是在本世纪早期被打造出来的，而在很久以前，福利概念就已经是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哲学争论的主题。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目前关于福利的争论主要是战后与福利国家伴行的祛魅过程所引发的后果，许多社会理论家——包括来自激进“新右派”^①和左派——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有点夸张地说，福利体系中有一种“危机”（有太多的知识辩护者和太多的大众支持将处于早期掩盖的危险中），但是，当代对其结构和目标的讨论是政治和社会思想中更广泛争论的一部分。特别是关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恰当作用问题在战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分析，一些更陈旧的概念（如“守夜人国家”）曾被设想永远遭废弃，现在却从坟墓中挖出来，复兴起来，并用于关于社会政策的知识辩论中。

而且，社会哲学中受到分析最多的概念——正义——已经不可避免地福利绑在一起。整个福利国家观念的正当性常常是根据强调再分配的正义概念来证明的，它不是根据在合法所

^① N. P. Barry, *The New Right* (London: Croom Helm, 1987); D. Green, *The New Right* (Brighton, London: Wheatsheaf, 1987).

有权的程序性规则之下与个人权利资格 (entitlement) 相联系的经济资源配置来界定公平, 而是将公平定义为一套复杂的制度, 这套制度旨在考虑超越了基于私人产权之要求 (claim) 的“需要 (need)”和“应得 (desert)”。

这只是激烈的公共政策争论中的两个例子, 其根基在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那里, 它们源于二战后统治西方民主国家的所谓“共识”的崩溃。这种共识主宰着知识生活, 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主张: 我们到达了“意识形态的终点”^①。由于没有实质性的原则差异来分隔人民, 因此, 知识分子应该致力于对既有的、公认的“范式 (paradigm)”做逐步的改进。共识包括政府的具体责任 (那些暗地里曾被承认但从来没有充分表达过的责任)。它们包括通过运用宏观经济政策 (需求管理) 干预市场而维持充分就业, 在市场体系和私人慈善之外提供一般化的福利体系, 以及通过国有化和再分配性质的征税来促进社会和经济平等。

英国也经历了这种共识的崩溃, 它所带来的有意思的结果是, 福利国家的制度基本上没有触动, 公共开支基本上保持不变, 尽管经济增长率很奇特。在福利观点出现明显分歧的情况下, 保守党政府连续获得选举胜利 (1979—1992), 而保守党的说辞, 特别是其领导人的说辞, 对套在战后范式中的福利观念抱有怀疑。该国形成了强烈抵制变革的体系, 这无疑可以部分地 (或主要地) 解释上述情况: 由于有那么多合法的预期嵌

^① D.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2).

人到那些制度安排之中，退休金保障就是其中一个明显例子，因此，不可能启动一场不会让许多人处境变坏的大规模改革。这个问题本身既是一个福利哲学问题——包括公平与合法预期的关键概念问题，也是一个实际政治问题。

当代政治生活中福利论争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政策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而在于辩论本身的性质。在争论中，尤其是在人们所熟悉的“市场对国家”的争论中，所采用的有关理论立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以致在很多政策领域，我们正在见证上个世纪知识分子战斗的重演。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当前的一场争论，一边是那些个人主义社会理论家，他们相信所有的市场外支付都应该采取现金形式（著名的负所得税），另一边则声称这些支付必须与具体的福利服务（教育、健康、住房、退休金等等）联系在一起，而且让它们不容易得到。前一观点的拥护者坚持认为现金支付具有保护选择自由和个人自主的独特优点，而反对者则声称这种制度只是鼓励了浪费和一种“依附型文化”，因为它的好处被视为“权利资格”。但实际上，这是18世纪末关于声名狼藉的“斯宾汉兰体制”的另一种争论，它是关于院外救济及其所谓缺陷的一种体制。这种争论在政治上的解决是引入了济贫法（1834年）体系，它有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让福利变得难以获得，而且伴有某种程度的耻辱。

另外，从某种不同的角度看，当前关于福利国家正当性的证明利用了“社群”和“公民资格”观念，它是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晚期社会哲学的回音。这里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有一种明显的厌恶（在T. H. 格林的思想中，以一种曲折

的方式被体验到^①），这种个人主义将公民仅仅视为一个抽象主体，被赋予一套法律和政治权利，它除了承认他人有平等的权利外，对社会不承担责任。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人的福利只是通过神圣的合同而与其他人进行自愿交易的功能。公民资格被它的法律内容耗尽了，权利资格从中流走了。研究公民资格（citizenship）的当代理论家附和格林，声称这种观念从单纯的司法关系扩展出去，包含了对社群经济资源方面的要求，其根据是社群的成员资格和对社群目标的一种认同。

公民资格流派反对市场，不仅因为由匿名的最大化者居住的交易系统不能生产一般福利（无论如何定义），而且因为在道德意义上，市场不能生产一个自主的主体。一个不能行走于市场社会而只能依附慈善的人不能算作完全的公民。因此，即使自愿捐赠足以减轻困苦，但它们是来自另一个陌生人的礼物，而非来自社群的基于正义的有效要求，这一事实足以让接受者没有资格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这一切暗示着对亨利·梅因爵士著名洞见的一种拒绝——或至少是一种怀疑，他认为进步是通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来证明的^②。

二

以上的样本式争论已经隐含地涉及到国家福利，但是，正

① T. H. Gree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in R. Nettleship (ed.), *Green's Works* (London: Longman, 1881).

② Sir Henry Maine, *Ancient Law* (London: Murray, 1890), p. 170.

福 利

如前面指出的，如果将所有关于福利的争论与政治机构强制供给的相对优点和缺点等同起来，那会是一种错误。这个概念在这个背景外还有用处。的确，如果说政治思想的历史只关涉福利问题，那会是大大的误解。评价或排列社会和政治理论要看它们如何处理福利问题，或者要看物质意义上的福利强化政策如何从它们当中引申出来，这似乎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它既是个人主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理论的特征，也是集体主义的理论特征。不管它们究竟有什么不同，但在如下信念上它们似乎统一了起来：社会哲学和公共政策的目标是为了让人民“更快乐”或更繁荣——某种幸福状态是政府应该追求的目标，它的实现要么通过很少干预人民生活，要么通过大量干预人民生活。

尽管如此，不仅福利不必被当作纯粹物质性的福利，而且更重要的是，福利最大化（不管如何定义）不一定是政治哲学的惟一必需品。如果将福利概念看作多种政治概念中的一种，直觉上不要求它优先于正义、权利或政治秩序本身，那么这种态度肯定与政治术语的普通用法更为一致。而且，很难看出，福利最大化为什么应该成为政府的压倒性关注。除非福利最大化的优点附属于所有理想的人类活动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概念成为微不足道的，甚至多余的），否则，福利理论家必须说明为什么它是有价值的，以及它与其它人类价值有何种关系。

然而，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困难在于，尽管福利似乎一度合理地与正义和个人权利等概念并列，但是，后面这些理想在很

大程度上（有些人会说是错误地）变得要依靠福利本身。这种混乱也是正义理论的一个特征。然而，亚当·斯密可以在 1759 年写道：“正义在多数场合只是一种消极品德，它只是阻止我们伤害自己的邻居”^①，这种正义观念对福利表现出很大的冷漠，它在今天会引起强烈的争议（尽管某些作者，如哈耶克和诺齐克等，继续持这种态度，他们也因此而倍受争议）。斯密只会支持运用武力来保证消极正义的规则，但福利正义则允许运用它带来资源的再分配。对于权利来说也一样。权利一度被视为免受他人侵略性行动伤害的要求，但是现在更可能被视为享受国家福利的权利资格。积极自由观念必然与集体主义福利理论有关联，这种自由定义要求，如果个人的行动将被恰当地称为自由或非强制，那就必须让他们能够得到某种经济资源。

福利概念上的明显混乱——它差不多非歧视性地吸引了其它的道德和政治观念——是政治争论中某种混乱的原因。拒绝福利与其它观念如正义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福利也应该被拒绝成为一种政治原则。分析层面上更准确的说法是，福利原则只是政治争论中使用的各种原则中的一种。分清福利和其它价值不应该仅仅被视为某种消毒过程，或者说一种必要的净化练习，这种练习让我们的政治语言得到净化，以致价值歧见更容易被识别。它还有更丰富的含义，那就是，将其它价值吸收进福利理念，就会将一种价值共识、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目的和目

^①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D. D. Raphael and A. Macfie (e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标等级强加到社会上面。

在政治和道德哲学史中，其它人类目的和目标的解释和证明常常优先于福利需求：的确，那种认为某种福利或感觉满足观念——或由个人通过市场交易经验，或由集体行动传递到社会或其它“聚合体”——应该成为某种评价标准的看法是后来出现的。在伦理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存在某种与我们的偏好与愿望无关的道德责任，这种观点同样紧紧抓住了我们的道德情操。在欧洲思想中，这似乎是事实。不管这些责任是基督教自然法（如在托马斯的传统中）的产物，或通过自由的理性概念而得以证明（如在康德的传统中），这都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将伦理区别于所有物质福利的观念。不管它的推论是什么，在标准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曾经有并且仍然有一种传统，它坚持认为“权利”要求比福利命令对我们的理性和情感有一种更高的要求。

而且，西方政治思想中，理论家更多地关注社会秩序之条件的解释，而不是福利的最大化。因此，尽管霍布斯从个人主义前提出发推导出了威权国家的理论，其中，“善”等同于主观欲望（一种后来福利理论家们所采用的形而上学），但是他主要关注政治义务以及法和主权的理论。另一个例子可算是爱德蒙·伯克。他在专门研考了所谓国家的经济和福利责任后，坚持认为，如果治理者“不能履行低位责任，那么在付出相同

比例的努力后，他们同样不能履行高位责任”^①。这两位作者的观点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更为基本的政治关注转移开。

故而，福利哲学的特别现代主义的方面就是提升了伯克之类的许多作者所说的政府“较低责任”，让它们的位置与保持法律、秩序、连续性和社会凝聚力等同样重要。由此往前，就会有近乎自然的主张：如果政府行动不能满足福利命令的要求，那么它就可以受到谴责。根据这个观点，福利哲学的根据主要是功利主义的：福利措施的价值明显与某些类型的后果相关联。尽管似乎不能像边沁的功利主义所要求的那样，后果总是根据快乐来计算，但是，正是某种可以观察到的后果，才是福利哲学所要面对的。因此，福利哲学不可避免地关注经济和公共政策的问题，而只是边际性地关注法律和政治义务问题。

然而，福利哲学中引用“幸福”、“满足”和其它类似的表达决不是没有争议的^②。事实也许是，福利哲学中的争论主要是关于人们需要（need）、欲求（want）和利惠（benefit）的棘手问题，因此，即使人们同意福利最大化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目标，但是在最大化可以显示什么样的内容方面，可能很少有或没有交集。

福利思想史中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幸福或满足是否应该只参照个人经验（一种主观主义的个人主义立场），或者说，我

① Quoted in R. Nisbet, *Conservatis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7. See also *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 Volume 7 of Edmund Burke's Works (London: Rivington, 1815 - 27).

② See J. Giffin, *Well - be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福 利

们是否可以根据福利对聚合性现象、“社会”、“国家”等进行合法的 (legitimate) 评估? 当然, 社会和“事态 (state of affairs)”可以根据某种福利尺度来评价和比较, 但是, 这种比较的合法性总是存在疑问。这种疑问至少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 许多个人主义思想家坚持一种严格的本体论立场。这种立场认为, 在现实中, 只有个人才能体验幸福, 那种包含集体术语的命题只是为关于个人感觉的复杂论断提供一种方便的表达。当然, 这并不排除公共生活的公共维度, 因为出于各种原因 (第四章将会解释), 个人只能通过公共规则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但即使在这里, 公共活动的合法性只是它与最大化个人选择的某种程序保持一致的功能。这种立场与福利经济学有密切的关联, 它不会预先排除福利国家, 只要它来自由个人偏好加以合法化的某种选择程序。

其次, 第二个观点与第一个观点密切相关, 认为如果根据福利强化的特征来比较各种“事态”, 就必然要进行幸福的人际比较——这是福利经济学的主流传统所禁止的。个人幸福的人际比较意味着, 一个观察者可以对某项特定的政策如何影响两个或更多的人做出判断。这是古典功利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 它认为这种比较可以合法地做出。例如, 它坚持认为, 累进所得税是最大化效用 (福利) 的科学方法, 因为收入再分配给富人带来的伤害少于给穷人带来的快乐^①。这里的假定是,

^① F. Edgeworth, *Papers Relating to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925), Vol. III.

每个人对货币收入的感觉是相同的，就是说，数量增加会带来相应比例的满足下降。当然，这个假定可能不真实，因为在货币收入下降一定数额的情况下，某些人会比其它人受到更大的伤害，因为，再分配的证明必须根据伦理方面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它最大化了“客观”效用。既然通过福利国家实现的几乎所有的再分配政策会让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糟，那么，福利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福利”与福利的普通含义（至少是道德和政治理论家所理解的）之间的联系就不是很密切。

尽管如此，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整个传统中，仍然隐含有很强烈的福利判断和评价。正是一个不受阻碍的市场体系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在自利行为的推动下，会自动产生最好的事态，它能够供给出一系列反映人们主观选择的物品和服务。它的优点据说是依靠为数不多的、没有争议的、关于人的假定，其中著名的是：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会确保有效率的产出。然而，这个传统中的几乎所有作者，包括斯密本人，都相信在有些环境下，情况并非如此，有某些种类的物品和服务，尽管是“所想要的”，但并不能在市场中供给出来：它们是“公共物品”。所要争论是关于公共物品的性质和程度。

于是，福利哲学中出现了真正的分裂，一边坚持认为，惟一的福利改进来自市场中的个人交易，或来自一种公共选择机制，它能够产生个人所欲求的而市场无法供给的产品（公共物品），另一边则在集体意义上来解释福利命令，认为存在一些社会价值，它们的增进应该独立于个人选择。根据后一种观

福 利

点，聚合体可以根据剥夺如何被减轻，有多少平等得以增进来进行比较，福利国家的设施专门负责促进这些客观物品的职能。然而，根据前一种观点，国家只是一种用来传送个人偏好或某种公共活动的机制或管道。这些公共物品中，法律和秩序、国防、洁净水等等是人们最熟悉的，但是，为公共福利传送个人偏好肯定不会被排除。的确，据说这是福利国家能够被辩护的惟一方法。

尽管如此，福利中的非个人主义传统也确实不能忽视制度因素。或许可以将福利要求建立在某些道德观念如平等、社会正义、甚至权利等基础上，因为福利辩护的标准而非福利物品的供给确实包括重要的制度问题。除非福利服务由一个全知的和仁慈的独裁者来设计和实施——没有哪个福利国家的理论家采取这种立场，否则，某种福利解释必须考虑到负有福利责任的制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平等问题，因为平等主义经济学家常常指出，教育、健康、退休金、家庭援助等服务的供给所导致的结果一般有利于中间收入群体^①。甚至在集体主义福利国家中，决策在某种意义上也总是主观性的，因此可以根据自利动机和人类行动的其它特征来进行分析。

三

福利命令意味着，在广义上，公共政策应该趋向增加人们

^① J. Le Grand, *The Strategy of Equalit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2).

(个人或集体)的幸福和满足：无论是一种限制市场力量自由运作的消极政策，还是相信交易体系不能生产所有可欲东西的国家积极行动，在伦理上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或许有这样的情况：福利由市场和国家之外的方式来提供，如自愿捐赠之类。的确，利他主义被保守人士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颂扬为福利事业的一个主要的（如果不是惟一的）部分。慈善责任在19世纪的文学和社会哲学中表现突出，据说一个自由的社会不仅促进自利的市场动机，而且促进利他主义情感。甚至左翼思想家，如果R. M. 提特莫斯^①，建议将“捐赠关系”当作人类的社会关注的理想形式，它独立于资本主义的无牵挂动机(non-tuistic motivation)，和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它在福利术语中常常是不可靠的。

这是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因为人们常常不理解，现代民主的福利国家非常依附某种利他主义，也就是选民的非自私品格。不能设想，国家是一个“中性”的实体，它会自动提供符合福利主义伦理的某种水平的福利，著名的平等主义者和福利思想家R. H. 托尼在论及国家时写道：“愚蠢的人会运用它——如果他们能够运用的话——达到愚蠢的目的，犯罪分子会运用它达到犯罪的目的，敏感和体面的人会运用它达到敏感和体面的目的”^②。在民主社会，国家在理论上必须被用来促

① R. M. Titmuss, *The Gift Relationship*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0).

② R. H. Tawney, "Social democracy in Britain", in R. Hinden (ed.) *The Radical Tra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p. 172.

福 利

进公民的目标，福利命令的成功将依附无牵挂情感在选民中的扩散，而且还依附特定民主机器在传递这种情感方面的效率。所以，市场和国家在动员福利情感的效能方面可以进行真正的比较。托尼如何能确保国家将用于“可感知的目标（sensible ends）”呢？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种背景下，为国家福利辩护的古典自由主义理由依附某种利他主义情感，它据说是大多数人所拥有的减轻剥夺的偏好。正是因为福利供给中的“公共物品”问题，也就是每个人对减轻贫困的贡献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致人们很少有动力来进行捐献，所以，国家不得不干预进来，校正“市场失败”。国家福利便成了一种奇怪的“强制利他主义”形式。

强调减轻贫困、动员利他情感，可视为联合传统的意识形态左派和右派的一种方法，它将表面上分裂的政治倾向拖进一个共同的事业。的确，这可以称为一种理性主义的福利思路：相信在社会目的方面存在最终的共识，那些存留的争议在于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据说后面的争议可以通过理性方法来解决。

然而，这或许有点误导，它错误地假定，在具有内在争议性的概念的性质上存在共识，而人们在关于个人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存在难以解决的观点冲突。可以坚持的观点是，福利“问题”并没有被效率问题，或者说解决剥夺问题的理性考虑所穷尽。在福利辩论的整个历史中，贯穿着社群主义和（在某种程度上）公民资格的主题，它们推荐了一种福利社会形

式——对一种社会秩序的想象，其中不仅有理性的、减轻剥夺的制度和政策，还有亲密社群纽带的培养工作。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完全依附个人主义假定的有效率的福利国家本身就会是分裂性的，它的制度会让人类主体相互“分离”^①，而福利社会则将他们联合进一个共同的事业。在这种福利社会观念中，平等在强化社群主义效果方面和减轻剥夺的具体作用（如果有的话，许多福利理论家否认这一点）方面同样重要。

四

历史上，福利争论与个体性问题以及个体行动责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在正统福利经济学领域之外，评价福利政策和制度对个人的影响是关键问题，而在这里，个人主义被如何将个人选择转换成公共物品的偏好这种问题弄得精疲力竭。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福利国家的怀疑者有个重要观点，认为非歧视性的福利支付会削弱个体性和个人责任，尤其是当它们以权利资格形式出现，并且对接受者方面没有要求相应的责任时。它们创造了一种众所周知的“依附型”文化，而不是一种由负责的、自主的主体构成的社会。

然而，有进一步的理由来说明福利与责任性和因果性观念之间的联系。尽管 19 世纪济贫法哲学强调，非歧视性福利应

^① K. Marx, *Early Texts* (Oxford: Blackwell, 1972). 值得强调的是，大多数当代社群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该受到强烈反对，因为它的吸引力会让人们变得依附国家，但是，19世纪同样存在富有影响力的福利传统，它认为人民显然有权得到救济，因为他们在道德上不应对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困境负责。这样看来，带来周期性失业的商业循环运动以及个人显然无法控制的其它大规模经济现象让福利国家成为正当。并非是不负责任（据说是由扩张性福利国家带来的）产生了剥夺和穷困，它们恰恰是由不受阻碍的市场带来的。所以，在不可抗的社会力量面前，重要的不是个人的责任，而是个人的无力。J. A. 霍布森在1896年写道：“只有在环境赋予所有人以平等机会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进行个人适应性的测试。只有当我们有正当理由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将贫穷或失业的不幸处境归因于个人性格的缺陷”^①。

很难高估因果性、个人行动的责任性和福利概念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如何理解这些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严重影响到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态度。例如，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家简单地否认自由市场的运作和社会剥夺的存在（可以避免的）之间的因果联系。的确，他们将许多这种情况归因于错误的政府政策本身：周期性大规模失业的存在据说是因为错误的货币政策产生了商业循环，无家可归和住房短缺现象被理解为通过租金控制等方式禁止出租贷款供给的结果。在没有这些误导性干预的情况下，据说市场会产生社会福利。而且，

^① Quoted in J. Clarke, A. Cochrane and Carol Smart (eds), *Ideologies of Welfare* (London: Hutchinson, 1987), p. 46.

尽管他们承认他们所允许的最低水平的国供福利会减少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他们仍然会克制对此做出道德判断：他们的确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假定自利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

另一方面，在许多国家福利思想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忽视对不可欲的社会现象进行因果解释。于是，剥夺形式存在本身就成为靠政治权威进行疗救的一个理由，而与这种现象如何发生的理性解释的说服力无关。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干预主义的措施似乎事与愿违：他们夸大了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一种熟悉的观点是，如果某种社会利益实际上可以无成本地获得，那么它就会鼓励获利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这有时被称为“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问题。

五

对福利概念的概述说明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价值。尽管也许存在某种最小程度的共识，认为正是这个概念描述了幸福、满足、救济（与那些关心责任、政治义务和秩序的人总体上形成对照），但是，在此共识之外，我们进入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争议领域。什么是“幸福”？它能够测量吗？我们有可能理性地比较意在最大化幸福的竞争性政治项目吗？正义和自由之间有什么联系？

或许最困难的和难以解决的争论是关于适合福利政策的主题和关注范围的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者，对这个概念进行认真讨论的组织者，将其范围限制为市场交易中的个人所体验到的

福 利

那些满足，再补充以必要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这包括认真界定的济贫措施。还是让人怀疑的是，这后者是否将教育、退休金、失业保险、健康和住房容纳为公共责任，正如今天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容纳的理由或许是目前最烦恼的福利问题。尽管福利国家通常用再分配术语来证明，但是人们决不会一致接受再分配是它的惟一理由。据说，由集体供给大家所熟悉的福利服务有效率属性。就是说，每个人都会从某种服务的集体化中有所收获，因为市场有内在缺陷。例如，尽管健康保险技术上不是只能由国家供给的公共物品，但是，有一些事实，如消费者冷漠问题，构成了公共卷入的首要理由。

因此，有一系列关于福利的问题要问。有些问题是关于福利的终极目标（而且很可能无法决定性地解决），其它问题则几乎是技术性的，关注实现公认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然而，无论当代论争中的问题显得是如何的新鲜，但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它们根本就不是新问题，而是与福利本身一样古老。

第二章 功利主义和福利哲学的起源

一

福利思想史不可避免地与福利制度捆绑在一起。这并不是说，思想与政策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尽管有一些制度安排似乎是理性设计的产品，譬如说，1834年修订的济贫法体系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仅仅是说，观点和思想的运动对公共政策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思想与政策之间的一些联系是相当令人困惑的。例如，19世纪的英国见证了集体主义福利制度兴起的奇怪现象（尽管福利国家本身确实是20世纪的概念），这些制度嫁接到一个大体是自由放任原则指导下的经济之中。在自由放任经济学中隐含有一种福利命令，但它与福利国家观念无关。

毫无疑问，现代福利观念来自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发展，特别是功利主义的兴起。然而，功利主义、自由放任经济学与福利之间的联系是微妙的，而且是

许多混乱的源泉。其中最有害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被迅速吸收进后来所谓自由主义的福利政治经济学。因为，尽管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确实都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斯密是否是一个真正主张自由放任的理论家还存在某种争议），但他们的根据还有点微妙的不同，并且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并不夸张地说，边沁式激进功利主义是 19 世纪英国主导公共政策的官僚式福利国家的知识源泉。它是理性主义的和设计性的，认为国家有一种福利作用，其特征可以清晰地描绘出来。

另一方面，来自斯密的福利传统是非理性主义的：仁慈是自发性而非“理智（reason）”的产品。斯密的主要创新是证明了市场的自然协调机制（价格信号）如何鼓励自利动机善良地为公共物品服务。公共物品是自利行为的偶然结果，而不是理性计划的产品。这里不认为公共物品能够建构在可观察的效用尺度上，也不意味着社会有一种福利功能，它可以由一位仁慈的独裁者来履行。

将公共福利理解为低贱动机的（几乎）偶然结果，亚当·斯密并非第一个理论家。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1）在他的《蜜蜂寓言》（1720）中，以一种更戏剧性的、也许更吸引人的方式说明，促进禁欲和自制的传统美德会破坏公共福利^①。的确，商业和美德是相互对立的，只有当人的自然欲望（特别是贪婪）被完全满足时，艺术、繁荣和进步才成为可能。

^① B.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F. B. Kaye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First published 1705.

因此，他观察到蜜蜂群处于非道德状态：“每一部分都充满邪恶/而整个群体却是一个天堂”。这就是激进的、颠覆性的自由个人主义教条的起源，它认为，如果福利是所要努力的目标，那么它是通过顺应我们自然的激情而不是通过深思熟虑地经营而实现的。这种情绪在当代自由放任思想中得到响应（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一个现代曼德维尔主义者），并同其它传统形成对照，后者将福利理解为一种（具有公共精神的政府和开明公民的）道德产品。对于一位现代福利理论家来说，即使通过价格信号运作的、不受阻碍的市场确实能产生均衡，它也只能满足他的部分计划。因为这只是在效率意义上解释福利，而忽视了此背景下自然产生的分配问题。斯密的福利经济学对分配正义是冷漠的。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写的：“正义在大多数场合只是消极品德，只是阻止我们伤害自己的邻居”^①。市场交易体系的确要求基本的正义规则，在正义保障中，允许使用武力，但是它们只是像“语法规则”那样运作。斯密承认，建立在这些规则基础上的社会也许并不特别有德性，仁慈的运用会将单纯的商业社会转变成更令人高兴的社会秩序，但它会是份外道德（非必需的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严格义务性的。所以，自由主义思想中常常重复出现这样的内容：经济福利和分配正义是严格分离的。一个有效率的市場不能满足的任何需要必须通过各种慈善制度（国家也是其中

^①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D. D. Raphael and A. Macfie (e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 82. First published 1759.

的一类) 而不是以可辩护的权利资格形式来满足。那里的正义规则要服务于一个商业社会, 而政治当局的主要 (尽管不是惟一) 责任是维持它们。

斯密的社会哲学预测了当代古典自由主义福利论中的主要元素, 这不仅体现在对任何社会正义观念的拒绝中, 而且体现在对经济福利生产机制的解释中。正是通过人性本身——“每个人千篇一律地、始终一致地、从不间断地改善自己处境的努力”——我们可以预期到改善。这至少出于两个原因: 人类知识和利益的局限以及政府方面无法控制的浪费倾向。

在反对主张将促进福利的责任赋予政府的观点中, 斯密的反理性主义是个重要的知识武器。尽管斯密倾向于将市场定价系统视为用于有效率的资源分配的信号工具, 而不是用来协调必然分散的信息的工具, 后者是哈耶克非常复杂地发展了的观点, 然而, 斯密观点的主旨瞄准了这个方向。理性主义者忘记了, “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中, 每一单个的棋子都有自己的动力原则, 它们加在一起就不同于立法者可能强加的原则”^①。另一种说法是, 理性主义者的工作是违反人性本质的, 他们不能理解, 运用“天然自由”本身是最佳利用有限资源所要求的一切。正如斯密所指出的, 自私躲在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之后, 它本身就对社会福利具有无意识的慈善后果。总之, 人们越关心他们自私的利益, 他们就会越少依附他人。

反对政府只是普遍的自利公理的特殊运用。斯密直接预言

^① *Ibid.*, p. 263.

了现代公共选择理论，他认为，自利既是私人行动的特征，也是公共行动的特征^①。公共物品主要是每个人努力的偶然产品：“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常常促进社会的利益，而且比他真正有意识地促进社会利益时更有效。我从来不知道那些喜爱换取公共物品的人做了多少好事”^②。

个人努力能够而且的确导致不平等：斯密常常对此发表评论，而且有时甚至建议法律和政府的最初理由是保护不平等。然而，他再次预言了现代自由主义福利论，他认为它显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比任何其它的体系更好地帮助了穷人：甚至商业社会中的最糟糕者也比野蛮社会中的部落首领更富裕^③。而且这里有一种隐含的信念，认为市场社会有所谓的“溢流 (trickle down)”效应，就是说，富人的消费最终导致穷人财富的增加。正如曼德维尔早前所说：“许多东西一度被视为奢侈的发明——其实是非常必要的，以致我们认为没有人应该想要它们。”^④

因此，尽管斯密的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最终是功利主义的，但它与那种激进功利主义很不相同，后者将边沁与他的19世纪继承人联系起来。不存在整体性社会的“福利功能”，

① “没有一门艺术能像从人们钱包中掏钱那样让一个政府更快地从另一个政府那里学会。” Adam Smith,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R. H. Campbell, A. S. Skinner and W. B. Todd (e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Ibid.*, p. 456.

③ *Ibid.*, p. 624.

④ B.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 Vol. 1, p. 169.

这种社会可以理智地做出决定，也没有统一尺度的幸福，根据它我们可以衡量政治行动。只有匿名的和自我逐利的个人集合，他们通过市场信号和简单的程序正义规则而松散地集中起来。斯密也经受不住共和理想的引诱。一个自由社会的思想精萃是：人们在缺乏共同（或社群）目标和少有直接的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可以一起生活，这个思想可以说起源于斯密，但是他在展望这个精致胚胎的充分发展方面，还是后退了不少^①。他对商业社会有些保留，因为，尽管商业社会很繁荣，但是它在人们充分参与道德和社会生活的能力方面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异化”问题）。对于现代福利来说，对商业社会长远未来的这种怀疑具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更多地与一种几乎是技术性的问题有关，也就是一个只由个人欲望牵引的交易系统是否能生产个人想要的所有东西（更复杂的问题是，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知道个人想要什么，后来的自由主义福利理论家探讨了这一问题）。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斯密披露了对市场失败的担心。当他描述政府职能时，他主张（在法律和秩序之外）还有如下责任：

建立和维护某种公共工程和某种公共机构，它们无法出于任何个人或小群体的利益而得以建立或维护，因为其利润无法偿还任何个人或小群体的费用，尽管它常常大大超过偿还一个

^① *The Wealth of Nations*, op. cit., p. 788.

巨大社会的费用^①。

根据经济学家对这句话的理解，福利不是通过纯粹交易而最大化的，因为存在不能由市场定价的可欲之物。因此，这里有现代公共物品理论的种子，但是斯密所没有考虑的是供给公共物品的制度机器，或者用什么标准来分离真正的公共物品。现代福利国家理论家们已经大大扩展了斯密所思考的范围。

二

正是杰里米·边沁（1748—1832）及其追随者最先将福利观念添加到伦理学中，他们极力嘲笑那种认为伦理价值可以依托与直接后果相分离的责任和正当行为概念的思想，并且（至少在理论上）让正义能够从规则和规则遵从观念的停泊地解放出来，以便服务于人类幸福的最终目标。而且，在边沁的著述中，福利观念已经呈现出专门的聚合形式，这种形式成了现代福利观念的标记。因此，尽管边沁将“社会”、“社群”等视为“虚构实体”，它们只有在分解成它们的组成部分——个人感觉和知觉——时才有意义，但这只是某种言语外壳，下面充满着强烈的聚合性教条。毫无疑问，个人偏好一旦被一个观察者所知，个人就同其他人一起混合进一个社会效用功能。正是通过这种集体标准，竞争性政策才得以评估，不同的社会才得以比较。于是，边沁有一句被再三引用的、极为含糊的名言：“最

^① *Ibid.*, p. 723.

福 利

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衡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政策是否正当，其惟一标准是它们是否拥有“增加或减少社群快乐”的倾向^①。

有趣的问题是：一个表面上完全关心慈善、并且让政府负责“增进幸福”的社会教条如何同一个严格的自由放任教条联系在一起（至少在大众的观念中）呢？标准理论将政府供给社会福利仅仅视为市场生产福利的附属物（它必然是粗糙的）。而且，功利主义正义理论原则上是向前看的，因为它关心未来幸福的创造（不是向后看的，即关心无偏规则的实施），为什么这样的理论没有导致重大的分配政策呢？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福利国家很少归功于边沁原则。的确，19世纪末出现的福利哲学理论不仅允许扩大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而且为福利供给形式的这种重要转向进行辩护，而这种理论藐视为早期立法干预提供有效性证明的那些边沁原则。1900年末，应用于社会福利的边沁原则受到启蒙社会思想家的怒骂。

边沁福利论的另一个困难是一个明显的悖论：根据与斯密相同的人类动机原则，即自利原则，他既可以建构比《国富论》远为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也可以建构允许中央集权和国家权力扩张的社会和法律理论，而后者受到同一作者的诅咒。

于是，在他的《为高利贷辩护和政治经济学指南》一书

^① J.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J. H. Burns and H. L. A. Hart (eds)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2), p. 11.

中，边沁根据自由放任原则，拒绝一系列斯密认为正当的干预措施：它们包括航海法、道路的公共供给（以零价格）、国家铸币、公共邮政系统、实行最高利率的立法等^①。根据他的这些主张，边沁比斯密更像是“个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这个自由主义原理的严格拥护者（就他对利率的完全自由市场的信念来说尤其如此），也更是风险担当和企业家精神等经济品德的感性支持者。在他的《宪法法典》一书中^②，通过济贫法、对立法控制工厂条件的支持以及对公共工程的辩护——不是出于公共物品的理由，而是作为治疗失业的工具，我们发现了对国家福利的坚定承诺。而且，在边沁的哲学中，有关于货币收入边际效用递减学说的原始论断，后来的功利主义者利用这个概念，允许（理论上）重大的再分配福利政策，因为它们让社会效用最大化。

这些悖论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当边沁的逻辑一旦被理解，它们就可以得到解决。而关键之点在于自然的和人为的利益和谐之间的区别。自利动机会在正常的市场中产生自然的和谐，但在其它地方，就需要“立法者”提供替代性的动力结构以带来秩序，刑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个人在任何地方都要受到趋乐避苦的心理命令的统治，以便实现“总体幸福”，不过，这需要对痛苦和快乐进行某种明确的测量。

① See W. Stark,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2 - 54).

② J. Bentham, *A Constitutional Code*, F. Rosen and J. H. Burns (e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福 利

在区分自然的和人为的现象方面，是否可能有一种理性的方法？在这个问题上，边沁和亚当·斯密的功利主义表现出某种区别。斯密到处看到协调过程，包括（而且特别包括）普通法的判决过程，以便让立法干预的需要最小化。然而，边沁则正视一个负有幸福创造功能的主权立法机构。的确，所有的法律都来自主权者，一个自由的行动只是立法机构允许的结果，而完全理性的主权者只会允许那些能够最大化可见效用（福利）的自由行动。这就是边沁式立法者得以扩张的理论基础，它狂热地寻求对自然体系的改进。

但是，我们知道“改进”是什么吗？我们有像温度计那样客观的快乐量尺吗？对于边沁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快乐，而且是“快乐总和”，正是那种聚合性的——的确是集体主义的——要素成为至上的东西，于是，粗糙的边沁主义证明中的错误出现了。快乐肯定是内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主观东西，不能成为理性的福利立法所要求的明确标准吗？因此，当我们说社群通过采取一种福利政策而变得更好时，我们根本就不是在说任何可知（cognitive）的东西，而只是在表达某种主观的意见。没有一种“科学”方法能够进行这些判断所需要的人际效用比较。

这个问题困扰着自由主义或其它福利经济学的历史，甚至那些反对（通常意义上的）“福利国家”的理论家，在为国防、法律和秩序等物品和服务的任何集体性供给——据说反映了人们的选择——进行辩护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边沁主义的早期版本中，集体福利的实施是“仁慈独裁者”的责任（许

多版本的边沁主义都隐含有这一点)，但正如边沁自己所认识到的，这样一个人就像其他人一样，不能免于痛苦和快乐的拉扯。在边沁心里，一个有意义的集体福利判断的概念似乎与从前一样遥远。

尽管如此，边沁在这个问题上的包容性努力突现了福利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在所有关于福利的决策中，存在一个不可抹去的主观主义元素。如果我们说，福利通过市场而最大化，那么这必须意味着，正是个人的感知才是幸福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评估事态的标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主张（当然是合理地主张）市场体系让合法的福利欲望无法满足，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以及应该利用国家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它们，这是一种主观决定，它来自某种集体选择程序，或一个精英团体（正如在费边福利理论中那样）的选择程序。

不清楚的是，所有功利主义福利论要求我们根据可测量的福利强化特征，评估各种集体性的“目标—状态”，即财富、收入、幸福等目标组合。尽管亚当·斯密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而且他肯定主张，那只（比喻性的）看不见的手的运作会比其它可知的经济安排形式产生更好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在性质上不同于正统功利主义所想象的结果。它的特征在交易系统本身运作之前就可以知道。因此，尽管使用“公共利益”之类的表达，但市场的原理并不是它生产了某种“可知的”的结果或最终的状态，而是它协调了人类行动，提供了最低水平的可预测性，个人需要它来确保自己的福利。

因此，在源于斯密的自由主义福利思想中，没有改革、干预和校正市场失败的渴望，而在源于边沁的福利思想中，这种渴望就无所不在。我们后面要注意这样一种主张：福利多少要依附知识，它不是分散于市场社会缝隙中隐含的或静态的知识，而是集权的立法者需要用来影响社会福利的直接改善的知识。

这种区别对于当代福利论争至关重要。对于边沁传统的继承者来说，任何意识形态论点都在如下信念中统一起来：市场失败是一种畸变，它只能由一位充分知情的立法采取直接的疗救行动才能加以解决；其前提假定是，无论对于所需公共物品的生产，还是对于穷困的救济，交易过程中很难有自我校正的过程。

三

脑子中有了这些论点，我们就可以解决前面提到的明显悖论：在 19 世纪，一个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与一套萌芽中的高度集权的福利制度（尽管它还没有形成福利国家）并存。而且，对这个时期知识历史的简短考察表明，理论功利主义的明显平等主义（尽管是沉默的）的主题对实际的福利政策没有什么影响。

正是在围绕济贫法所发生的知识分子争论中，特别在边沁的秘书爱德文·查德威克思想和职业中，我们发现了自由放

任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并存的理由^①。但是，该问题没有引起什么历史兴趣，只是诉诸其中的原则具有普遍的影响，而且它们仍然是当今某些福利论争中的核心。19世纪的功利主义者将济贫视一种公共物品：我们所有人都会从消除贫困中受益，但是根据功利主义所采用的人性原则（主要是自利原则），这不可能自动产生。一个同样中肯的观察是，济贫的愿望既是担心社会秩序受到威胁——因为有许多身强力壮者靠救济度日——的功能，也是一种利他主义情感的功能。其实，前面多少有点讽刺性的考虑成为当代某种自由主义福利思想的一种隐蔽特征。后面的情感可能只为身体虚弱者保留。福利问题不是某种可以留给自发过程的问题，它要求运用技巧和技能来解决。它的解决还需要社会科学家展开因果法则和收集相关数据的技能。

非歧视性福利支付的危险是，它们必定有鼓励个人成为福利索求者的倾向：以零价格供给的物品或服务会吸引无限的需求。其实，设计一种没有这个效果的福利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决不是一种反对所有国家福利的颠覆性观点，因为其主角可以说，这是为减轻痛苦而值得付出的代价，否则他们只能忽视它。尽管如此，它是功利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突出主题。1834年，英国济贫法计划的设计者对这个问题拿出了最大胆的和争议性的方案。然而，某些作者——著名的有马尔

^① See S. E. Fin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Edwin Chadwic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萨斯和李嘉图——反对济贫法，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它会夸大人口问题，而且因为它不符合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但是查德威克和其他人决心减弱它的负面影响，但仍然将福利视为合法的政府责任。

当时盛行的福利安排(源于伊利莎白时代的济贫法)没有效率，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本地性质^①。主要的畸变是院外救济支付，它在著名的斯宾汉兰体系(1795)中被戏剧化，不仅仅付给乞丐和残疾人，而且作为补贴付给就业者。这样做的理由可能是一种情感结合(对就业周期性的一种理解)，或者只是对暴乱的担心——如果它被停止的话。但是，该体系是公开侮辱功利主义，不仅因为它给本地利率支付者带来成本，而且因为它与人性科学不一致。对薪水低的人进行补贴对工资有一种歪曲的效果，因为它鼓励雇主付更低的工资。

其实，后来的经济史学家怀疑院外救济体系具有批评者所坚持认为的有害效果，查德威克的询问记录(他是济贫法委员会的秘书)是否披露了准确的结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②。对于福利哲学来说，重要的是所建议的解决方案，或产生方案的原则。在阻止人们变得穷困的努力中，院外救济被废除了(尽管实践中，它还在一些领域保留着)，对体格健康者的救济只能在济贫院中发放，而且受到监督。在经济条件方面，它精心设

① See D Fraser,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1973).

② See M. Blaug, "The Myth of the Old Poor Law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 1963, pp. 151 - 84.

计的意图是，要让那些没有就业者比就业者过得差。

这就是名声不好的“较低资格 (less eligibility)”原则——院外救济的对立面，它让利惠接受者更合格。济贫法报告认为：“如果让乞丐的条件比独立劳动者的条件更合格，那么所授予的每个便士都是对懒惰和堕落的慷慨”^①。英国历史上一个最声名狼藉的行政体系就这样开张了。其耻辱的主题是粗野、精心剥夺、削减自由、集权管理、一部分人只因贫困而被剥夺公民权等。当时并非没有能干的辩护者，其中许多人有仁慈的和人道的洞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人类应该相互帮助；在他人有急难时更应如此”^②。但是他与查德威克有同样的焦虑，试图确保该体系不那么有吸引力，以防止鼓励它所要治疗的恶习。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这是对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理想补充，因为它处理了市场明显无法处理的问题，即可以避免的贫困现象，它通过相同的机制来运作，也就是通过不可抗拒的快乐和痛苦的推拉。济贫院体系是市场价格信号的行政替代物。

修正后的整个济贫法体系代表了功利主义的科学方面。但是，当新济贫法体系似乎排除了一些人的快乐时，根据什么样的伦理命令来评价政府在促进“总体幸福”方面的能力呢？在一种控制机制明显灌输理想价值的情况下，功利主义所声称的

① S. G. Checkland and E. O. A. Checkland (eds), *The Poor Law Report of 1834*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 36.

②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5th edn, (London: Hodge, 1893), vol. II, Bk V, ch. XI, p. 590.

福 利

对个人道德的冷漠在哪里呢？而且，边沁言下同意边际货币效用的平等递减原则，其所蕴含的社会正义原则的诱惑似乎很容易被抗拒。

其实，上面所列举的福利类型与这种功利主义完全一致，它既造成了教义的含糊性，也带来了济贫法计划的优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肯定是它所捍卫的原则。其实，尽管边沁将这个用语解释为社会所有利益的模糊汇总，查德威克却将它当作某种具有工程学效率的名称。个人自由在功利主义那里没有内在的价值；它只不过是社会效用功能计算中的一种临时要求。最后，边际效用递减原则所意含的再分配从来没有被边沁及其跟随者——包括最精明的倡导者 F. 爱德华斯——当作一个政策目标，显然是因为它的实施会对繁荣和安全构成威胁。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生存的古典功利主义范围内的一个教义。

当然，最终说来，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信徒的科学之间没有冲突，后者是福利的组织理论，而不是其它什么东西。不存在福利“正当性 (right)”，因为功利主义中不存在独立于积极立法的“权利 (rights)”。

在总结整个理论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功利主义社会理论家将一些持续发生的、令人沮丧的人类境况视为更乐观的、更慷慨的福利理论家的尴尬。他们证明，那些福利建议（也许拥有说服性的标准理由）、那种压制福利“科学”及其政策建议的人性理论、以及那些建议为福利供给设置的制度安排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对当代福利政策的某种批评认为，福利政

策会产生一种“依附型文化”，福利的轻松获得和“权利资格”形式的分配会产生失去自立和自主能力的公民，这种批评让人想起“斯宾汉兰 vs 新济贫法”的论争，它主导了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社会问题的许多思考。

四

、 19 世纪，功利主义对福利的关注当然不止济贫法问题。它所允许的几乎所有的改革据说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与市场相一致。所产生的福利问题不常被认为由市场引起的；将福利问题视为自由放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后来的社会哲学家所做的事，他们依据的是非常不同的、伦理上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系统。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据说源于干扰市场平稳运作的障碍，这些障碍常常是政治性的，或者来自可校正的“外部性”。后者显然包括公共健康和卫生问题，它们是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并且困扰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对于新兴社会主义运动的奢侈的社会福利建议来说，普遍的自利人性、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定律”、稀缺性、供给和需求、回报递减等，仍然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克服的障碍。

奇怪的是，已经提到的查德威克和斯图亚特·穆勒的工作已经动摇了自由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他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为后来对他们原则上想要捍卫的思想、实践和制度结构进行攻击准备了知识弹药。查德威克根据效率原则给国家行动发了执照，这动摇了那种让市场成为福利强化制度的观点，而

福 利

穆勒的贡献则是将社会正义概念引入古典自由主义的殿堂。

查德威克的政治经济学以正统形式代表了行动功利主义的公共管理者。他对市场失败有一种几乎是企业家式的敏感，并且对政府改进福利的能力持乐观态度，这与斯密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对政治很少隐瞒他的讥讽。于是，在济贫法改革之外，查德威克还是集权管理、警察控制和管制、公共卫生和自来水供给、铁路建设等政策背后的策划者。他的这种因市场失败而导致管制的理由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直接预言，后者也基本上局限于这一点。无效率是私人垄断、浪费式竞争或市场无法供给所需物品的结果。

穆勒的准民主情感和自由崇拜让他与某些功利主义者的集权嗜好不合拍，不过，他也生产了一种预言了许多现代思想的社会福利哲学。尽管他也运用人性假定的成果，并且很少将时间花在忽视古典经济学教诲的乌托邦计划方面，但是他的人道社会秩序的观念有显著的平等主义暗示。

在这里，重要的是这种观点的原理。它可以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找到，里面有关于在经济秩序之上的政府行动范围的著名原则宣示。穆勒写道：

财富生产的法则和条件具有物理学真理的特征。

其中没有什么选择性的或任意性的。但财富的分配就不是这样。它只是人类机构的事情^①。

^①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I, p. 243.

因此，尽管政治干预不会改变经济产出，因为这得依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生产率，但根据那些被视为合适的道德原则来分配财富则在政府能力的范围之内。这个观点已经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很多批评，因为它在生产和分配之间假定了一种错误的区别，似乎可以选择任何分配规则，而不对产出带来影响。然而，特定的分配规则肯定会对生产带来反馈性的影响，譬如说，沉重的累进税会减少经济福利（尽管仍然缺乏有吸引力的标准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应该征收这种税）。穆勒其实认为，我们会有一种科学方法，测量我们所选择的分配原则的效果，但是他从来没有详细说明他做出这种原始区分的洞见的含义。

穆勒无疑喜欢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最著名的是机会平等^①。他仍然坚持市场的效率及其结果的正义，但条件是市场进入必须更为平等。因此，他不信任累进税，认为它“惩罚”成功者，他支持遗产税，认为它让财富更广泛地扩散，这符合社会理想。不管穆勒的建议有什么优点，他所说的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区别，以及他对社会正义的有资格的赞同，都与20世纪福利哲学有关。因为不像查德威克的福利计划只关心效率，像穆勒这样的现代福利哲学家同样（如果不是更多地）关心分配。

^① 尤其通过税收体制的微妙运用。see *ibid.*, Vol. II, Book V, Chapters II, III, IV and V.

第三章 反个人主义： 从最小国家到福利国家

一

19 世纪，尽管国家济贫制度的成长和社会理论的出现对纯粹个人主义的霸权构成严重的挑战，但是，这时既没有一个事实上的福利国家，也没有一种哲学来确证哪怕是假设的福利国家。当然，在文学和社会理论中，对自由放任有猛烈的攻击，对与快速工业化相关联的贫穷和苦难有很多的揭露，而这种工业化则是由那种所谓的经济体系带来的。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的确最先打造了系统性的国家福利制度，它包括养老金和社会保险，这种制度成为其它地方模仿的典范。在同一世纪，也的确形成了经济学的“历史”流派，它挑战着古典经济理论的所谓普遍主义、该理论所依附的个人主义假定以及这些假定所产生的反干预主义的偏见。

第三章 反个人主义：从最小国家到福利国家

然而，在英国，“福利”仍然是用来描述个人经验的一个词语，现有的任何国家援助都被视为市场的附属物，福利的供给是因为担心来自异化的贫民阶级的社会动乱，或者被视为其他个人的利他主义动机的产物。福利国家——将需要理解为来自社群成员资格的权利资格的一套综合制度安排——观念还需要寻找坚固的理论和政治依据。自由仍被大体上理解为消极自由，也就是说，个人自由是缺少法律或其它（可改变的）人为障碍的功能：资源缺乏不被视为一种约束，而且每个个人被假定为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从后一个论点可以推导出，个人行动责任是至高无上的，由此就可以在应得的和不应得的贫穷之间进行区分。

分裂性突破或许来自社会因果过程解释的逆转，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具有 19 世纪思想特征的个人责任观念的影响。福利国家情况的出现始于这样一种主张：公共福利并不导致依附以及丧失自主和个人对行动负责的能力，市场也并非独立和自由的源泉。福利国家的提倡者能够认为，在非个人化的市场力量的背景下，个人很难或无法控制其命运：市场体系是不可预测的，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自足理想对于有些群体来说无法实现。由此可知，既然人们不能对他们的困境负责，福利的根据就不得不与功利主义的有关根据大不相同。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原则开始以一种很不好的方式得以解释，甚至比后来更倾向干预主义的功利主义方式还要不好。

现代福利理论的诞生依附于对某些关键政治概念的重新解释：特别是自由、社群和平等。这种重新解释的效果是要改变

社会的性质，它从一个由共同规则捆在一起但缺乏共同目标的、松散协调的个人集合概念，变为一个更亲密的秩序形式（一个“社群”）。如果人们由超越契约关系的社会纽带捆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作为共同企业公民，相互提出要求，如果在更精确、更经济的概念上来衡量，这些要求会超过他们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福利便不再被视为一种慈善行动，而被视为一种权利资格。

福利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自由^①。功利主义喜欢运用这样一种自由概念，它将自由行动等同于不受（可改变的）障碍——尤其是以惩罚为后盾的法律——限制的主观选择的行动。自由在分析上区别于权力和经济条件，因此，贫穷的存在，或者劳动市场的条件恶劣到人们除了接受低工资外几无其它选择的地步，都不能算作对自由的限制。对自由的限制与人们（如立法者）的故意行动有关。在这种概念框架下面，不可能证明福利国家的正当性，而这种干预亦不能视为某种自由强化。在某种程度上，干预主义的福利立法的确削弱了契约的自由，就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家长制的。通过接受国家供给，个人放弃了某种自由，这肯定是早期福利立法（如济贫法）背后的思想。

然而，如果能够说明，表面上源于主观选择的行动实际上是被迫的，尽管这种被迫来自社会和经济条件，而非实体法或

^① See Sir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his *Four Essays on Liber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可辨认的人类主体，那么，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恶劣经济条件的福利立法也会加强自由。因此，如果（可改变的）经济条件能够影响到一个人以某种方式行动，其原因恰恰是没有其它可行的行动方式，那么，这个人的自主性就因此而降低：选择是主观的这种说法要么是误导性的，要么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样的话，合适的概念框架现在必须包括福利、自主和自由之间的和谐。国家济贫行动加强了作为自主的自由。这与古典自由主义福利经济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在成为“科学”的努力中，将所有的选择均视为非强制的选择，不考虑它们起源的环境。在其更严格的形式中，它让自己没有资格评论产生选择的产权分配问题。

二

许多现代思想隐含着自由的再定义，其知识根据可见于始自 T. H. 格林（1836—1882）的唯心主义社会哲学，后继于他的跟随者 B. 鲍桑葵（1842—1923）、D. G. 里奇（1853—1903）和 L. T. 霍布豪斯（1864—1929）的著作，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①。尽管它与具体的福利政策之间的联系有点牵强，在鲍桑葵那里，我们甚至看到了对现代福利制度和政策的明显敌意，但是，新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再定义和对公民资格和社群概念的新解释，几乎不成文地，为现代干预主

^① See M. Freedén, *The New Liber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78).

义的国家提供了伦理基础。其实，社群成了独立于原子化个人的主观偏好的价值源泉。

在他著名的文章《自由立法和契约自由》中，格林给自由下了个定义，令人羡慕地总结了其立场：

当我们说到自由时，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仅仅意指免于限制或强迫的自由。我们不是意指仅仅为己所好，却不管所好是什么的自由。我们不是意指以他人自由为代价，而由一人或一些人所享受的自由。当我们说到如此高贵的自由时，我们指的是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它让我们去做那种值得做和值得享受的事情，那也是我们与他人一起做或一起享受的事情^①。

尽管格林特别谈到工厂立法、义务教育、地主和租户法等，但这里所支持的形而上学与更宽广的福利领域有关。这里的自由不是主观选择，不是受自己好恶支配的个人反应，而是与他人协调行动的权力和能力的运用。正是一种关于共同善存在的意像是重要的，这种共同善不像短暂的、朝生暮死的欲望那样反复无常。如果有了这种客观的价值来源，那么限制雇主同雇员订立一份暂时满意的、却是剥削性的合同事实上同时会解放雇主和雇员。类似的，干预共同善的追求会加强公民自

^① R. Nettleship (ed.), *Green's Works* (London: Longman, 1888), Vol. III, p. 371.

第三章 反个人主义：从最小国家到福利国家

主，而不是以家长制方式强迫他们或对待他们。另一方面，不受限制的市场则将个人从其社群中分离出来、抽象出来。格林的确不赞成社会和经济哲学中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教义：“一些人为所欲为的自由意味着他人或后代最终没有资格行使他们的权利”^①。而且那些权利不是一个抽象自我的普遍权利，而是那些植根于社群的权利。

然而，在实践中，格林并不赞同任何实际意义的福利国家。国家被再三地解释为实现好生活的“阻碍的阻碍者”，而不是幸福条件的提供者。尽管在原则上，他将个体等同于社群的看法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甚至威权主义色彩，但是，他的著作中没有扩张性的、积极的政治行动计划。言下之意，通过社群行动而达致的个人道德在自愿的福利工作中更容易实现。的确，格林的追随者在伦敦的贫困地区大量从事社会工作，帮助建立慈善组织团体。

格林的领域是道德而不是政治学 and 经济学，他在理论上展开的国家概念在福利建议方面产出不多：他诉诸私人产权——尽管基于道德强化而非效率强化，的确为再分配和社会正义提供了障碍。然而，重要的是，他后来重申了社会合作的原则。他恰恰没有接受那种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观点，该观点认为市场——一个由自利的匿名个人居住的领域——竞争能够产生一个良善的、甚至合作性的结果。竞争与合作是相互对立的，在福利国家思想中仍继续如此。亚当·斯密的“天然自由”被稀

^① *Ibid.*, p. 376.

福 利

释了的德国有机体形而上学和维多利亚道德主义组成的奇怪混合物淹没了。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独立于个人努力的自发结果的理想，他的具有某种客观性的共同善概念成为生存至今的福利伦理标准。

当然，他最直接的弟子，伯纳德·鲍桑葵，没什么困难地运用有机国家概念为严格的反国家福利伦理服务，他的基础是完全非个人主义的^①。他对福利（包括济贫法）的反对来自唯心主义社会哲学所固有的个人道德发展观念。在这里，道德责任是绝对关键的，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妨碍它的政策都可以受到谴责。于是，在鲍桑葵那里，没有将贫困与个人控制之外的经济因素联系起来的企图：它是无能、怠惰、道德不发展等个人内在因素的结果。非歧视性的国家福利只会加剧这些毛病。当然，这些观点与个人主义没什么关系，鲍桑葵对福利之外的国家强制的确没什么反对意见。最简单地了解一下鲍桑葵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唯心的和有机的社会理论并不一定产生福利伦理。

自由放任思想的替代物的确从这些来源（尽管它们不是惟一的来源）中发展开来，人们的注意力也的确明显地从道德责任问题转移到为穷困人士——不管他们的穷困是如何产生的——提供国家福利的正当性证明。这是福利国家背后的典型现代思想：它只注重需要本身，而不管它的原因，或者因企图救济而产生的特定后果。如果我们在此之上增加最低收入和再

^① See B. Bosanquet,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London: Murray, 1899).

第三章 反个人主义：从最小国家到福利国家

分配的需要，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关于公民资格的理念。它不仅由公民和政治自由来定义，而且包含经济资源的要求，不是作为市场决定的工作奖励，而是作为格林所描述的某种社群成员的结果。

前面提到的里奇、霍布豪斯以及经济学家霍布森（1858—1940）等人为格林的哲学反个人主义提供了更符合积极的国家福利行动的解释。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作者在格林的有机论中添加了演化论色彩，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添加，因为赫伯特·斯宾塞由于运用“适者生存”教义来谴责日益增加的福利干预——视之为反社会进步（和侵犯权利）——而变得臭名昭著^①。然而，演化现在被歪曲成进步。它成为这样一种过程的描述：从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转向个人重新整合进社群的过程：福利和社会主义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社会前进的方向。然而，这些新自由主义思想关于福利的说服性和有效性不仅来自演化，而且来自他们所提出的特别建议，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经验研究之类的应用。经济学家霍布森尤其如此，他极力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内在地不稳定，它的随意性让维多利亚时代的个人责任律令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它的负面效应（side effect）让福利国家成为必需。霍布森与费边主义者一样，相信自己已经通过事实、主张和理由驳倒了旧自由主义：譬如说，失业就是混乱和无计划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必然产品。没有约束

^① Herbert Spencer,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London: Watt, 1940). First published in 1884.

的资本主义不会显示亚当·斯密式的均衡倾向，而会显示金融寡头的独裁主义^①。

L. T. 霍布豪斯，特别在其两部著作《自由主义》^②（1911）和《社会正义的要素》^③（1922）中，率先将一种可以得到承认的福利哲学融进新社群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框架，这种哲学包括平等、收入再分配和国家的积极作用等。在哲学意义上，关于自由的问题不能与关于经济环境的严肃考虑相分离。自然必须包括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而不是仅仅没有限制），但如果没有一种合适的平等概念，那么这种阐明就是不连贯的，因为“没有平等的自由是高贵声音和悲惨结果的代名词”^④。重大的不平等将个人自由转化为某些人位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力，国家有责任以集体善的名义对此加以校正。

平等实际上意味着机会平等：既然自由本身与机会有关，那么每个人个性的充分发展就需要资源。其实，霍布豪斯以一种功能性和社群性的方式来看待财富，而且它的正当性依附于它对我们所分离的共同善的贡献。于是，“无功能”的财富，如以土地所有权和继承资源形式存在的财富，是适合于再分配的，以便增加机会平等^⑤。接下来的是，盛行的济贫法体系只是绝望的个人的最后依靠，它没有为个人提供超过生存之上的

① J. A. Hobson, *Wealth* (London: Hodge, 1905).

② L. T. Hobhouse, *Liber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③ L. T. Hobhouse, *Elements of Social Justic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2).

④ L. T. Hobhouse, *Liberalism*, p. 48.

⑤ L. T. Hobhouse, *Elements of Social Justice*, ch. VII.

机会，因为它对他们完全意义上的幸福没有什么贡献。所以，霍布豪斯是最低收入保障（不仅仅是支付给失业者和贫困者，也不应被视为慈善行动）的笃信者，并坚持认为要将“需要”合法纳入福利方面的计算。这些抽象的和哲学的探讨所产生的结果是，现代福利国家理论主要来自对个人主义市场秩序的所谓缺陷的探讨，而非来自羽翼丰满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者不主张一个区别于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福利国家理论。的确，一些社会主义者和所有具有一致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认为，典型的福利制度是真正有害的，因为它们建构在既存的资本主义秩序上面。它们的繁荣会妨碍抛弃资本主义秩序的未来目标。由新自由主义鼓励的再分配最低目标是对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所固有的真实不平等的偏离。的确，根据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国家被本质主义的术语界定为保护阶级利益的强制力量，社会理论家所赋予给它的任何福利作用都必然是虚幻的。几乎所有蓄意的社会主义者都将福利视为一种社会控制，它也确实如此。

因此，福利国家的知识基础不允许抛弃市场，只允许对市场的缺陷进行弥补，指出其冷酷的分配效率不能满足客观需要，因为它的领域是主观选择的王国。福利国家被嫁接到市场之上，后者总是容易产生——尽管是无意识地——冒犯道德的结果。正是费边主义者以及由罗温特里所做的贫困调查，为伦理和社会哲学的要求提供了经验支持。重点正从贫困原因的解釋和道德责任的归属转向需要的辨认。在费边主义的著作中，道德因素没有被忽视，据认为，（可改变的）社会条件产生了

以前福利思想家所关心的道德问题^①。然而，费边主义理论中或许更重要的是，福利问题的解决被视为一项专业技术，即官僚部门的专业技术。

对统计细节的注意和对输送福利的集权机构的重视令人想起早期功利主义思路，然而，费边主义和公民资格这两个流派在实质性结论方面（特别在“自由放任”政策的可靠性方面）有许多不同。在费边主义思想中，支持福利的“公民资格”伦理理由不很明显；而在“公民资格”理论中，则有很多的管制、控制和采取保护措施专门组织。还应该指出的是，让费边主义者入迷的社会科学是关于事实、数据收集之类的东西，而较少关注法律的解释，特别是可见于经济理论中的因果类型。考虑到这些东西——特别是对稀缺性和人类的贪得无厌——的意义也许会浇灭改革者的热情，他们支持新理论所意味着的一揽子福利。

激进自由主义政府（1906年）所采取的社会措施反映了许多这类关注。义务教育及其来自公共钱包的投资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其前提假定是个人不能为自己提供这种东西，尽管这个假定决没有得到证明，而且最近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非捐献的养老金体制在1908年建立起来。尽管这种体制包含了某些资格限制的条件或根据，但它是围绕真正集体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体制，这种原则消解了应得（deserved）穷人和不应得穷

^① See J. Clarke, A. Cochrane and Carol Smart (eds), *Ideologies of welfare* (London: Hutchinson, 1987), pp. 161–9.

人之间的区别。国家保险法（1911年）有更多的个人主义根据，因为它的得利（因为疾病和失业）依附于捐献。它是义务性的，这一点侵犯了个人主义原则。它被证明为正当，是因为它有保险计算的理论基础。这赋予它“公共善”的某些特征，就是说，国家能够分散风险，因而能够提供技术上有效率的福利服务。然而，具有个人主义说服力的经济学家总是否认，强制性的国家保险是真正的公共善，而且，基于保险的国家福利服务史是一份关于渐进而持续地削弱保险计算基础的记录。

三

尽管在关于福利的政治理论中，干预措施的理由是根据社会正义、平等、需要和权利等终极伦理原则来表达的，但也有某种第二层次的考虑，人们也许会称之为座右铭，它们倾向于支配福利组织本身。但这些组织原则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工具和协议，它们估计会来自所有理性的人们。它们自身就会像更公开的伦理价值那样易于产生冲突。这里所发生的冲突类型有如下几种：

- 福利应该“选择性地”输送给那些需要它的人呢，还是当成作为共同社会企业成员的个人相互之间的要求而“普遍性地”输送呢？

- 它们应该采取类别形式，还是采取现金形式呢？

- 它们应该根据基本的保险原则进行组织，并且根据合理的保险计算基础进行合适的投资呢，还是被当作简单的再分

配？

- 应该给予它们专门的宪法保护呢，还是将它们留给民主政治中常规的投票程序和压力集团的谈判过程？

- 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福利国家应该被理解成为那些不能在市场社会中生存的人提供的“安全网”或最低限度的幸福保障呢，还是将市场社会思想理解成福利的对立面（通过自由经济学家）呢？

只是在最近，这些问题才受到认真的理论对待，政府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代表了对即时之需的回应，而不是理性计划的立法行动。在福利经济学的技术领域之外，福利思想的发展是思想和制度之间奇怪的、常常不连贯的和混乱的对话。

20 世纪福利哲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人们经历了大规模失业，并且日益强烈认识到只有政府才能加以缓解。在上一世纪，失业这种概念不为人们所知，政府能够加以校正的想法更是不可思议。然而，1930 年代大萧条的经历以及对非自愿失业思想的接受，将福利不可避免地与管理联系起来，以确保充分就业（宏观经济学意义上）。贫困不再单独与道德失败相关联，在明显不可控的和随意性的经济力量背景下，几乎任何人都是潜在的脆弱者，个人行动责任观念的应用范围似乎有限。认为福利是一种向少数人输送的、局限于生存水平的、受严格规则控制的慈善形式的思想已经衰老了。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似乎支持一种社群哲学思想，它的亲密纽带超越了仅由契约联系起来的无名个人所组成的自由社会。最重要的或许是接受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分配”不再意味着仅仅是根据边际

第三章 反个人主义：从最小国家到福利国家

生产率进行按劳分配（古典自由主义工资理论），而是根据需要、应得、甚或是平等本身等伦理标准进行的（至少有一些）在上述分配之外的再分配。于是，社会福利变得与“社会”正义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或许有点惊讶的是，美国已经尝试性地转向现代福利国家，这种转向几乎是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完全实用性的反应。具有特殊意义的是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它首要的——但决不是惟一的——目标是（由联邦政府）实行退休金制度。这个立法很重要，除了因为它涉及到针对美国的宪法问题外，还因为它是较早地说明了前面提到的关于国家福利的那些“第二层次”问题。强制性福利支付应该根据合理的保险计算原则呢，或仅仅是分配性的？其实，美国社会保险最初意在通过捐赠来适当地“筹资”，但这种做法很快就停止了：它发展成一种“权利资格”形式，而与捐赠无关。

然而，在贝弗里奇（Beveridge）报告^①以及以后的立法中，我们看到各种不成熟的福利原则在起作用。通过区分五种主要的痛苦类型——匮乏、疾病、无知、肮脏、懒惰，贝弗里奇的报告确立了国家在福利中实际上无限的责任。通过依托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福利思想已经完全与一种不是取代市场而是合适地校正市场的社会哲学联系起来。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没有被消除，而是被国家的结实皮带所约束。而且，干预的必要性与因果分析联系起来，但这一次，它似乎是特别复杂的一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据说证明了市场没有一种能够在充

^①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Cmd 6404. (London: HMSO, 1942).

分就业的前提下平衡所有资源的自然趋向，这种理论似乎将国家的福利功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理论上，这成为战后英国具有共识性的福利观点。它还不是来自连贯的社会理论：这里有公民资格理论的要素、社会正义、费边主义、干预主义经济学、以及甚至市场经济学的某些行为特征等等。它继续依靠保险原则，就是说，个人不得不为一个国家基金做贡献，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从中得到权利资格支付。“需要”因素得到承认，最突出的证据是“补助金”，它支付给那些没有被保险覆盖的人。这个体制的确承认了公民“权利”，因为那种再分配不被视为一种慈善行动——如在济贫法中那样，而是被看作社群成员资格的结果。贝弗里奇报告的平等主义特征局限于为贫困者提供“安全网”，有句话显示它相信正常的市场激励：“对于每个人来说，赚钱期间与不赚钱期间的收入差距应该尽可能地大”^①。

“贝弗里奇革命”所意含的基本原则孕育了各种福利计划，而其它国家，特别是瑞典，也出产了类似的，有时是更为平等主义的措施。在过去大约四十年里，国家福利的范围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大大扩展，具体服务及其融资的各种变化已经变得很复杂，这里无法一一罗列。它们所产生的争论主要是关涉上述第二层次的福利考虑。

福利国家的成长超越了以前社会哲学所暗示的作用，其重要含义是，关于什么应该算作国家干预的合法领域，似乎没有

^① *Ibid.*, p. 22.

理论上的限制。最重要的例子是健康和教育，尽管它们是针对个人的福利强化，但至少在表面上很少有什么理由让这些服务适于公共供给，因为它们的好处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体验着的。即使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推理，同意平等和社会正义是福利社会的内在特征，也无法推导出，这些律令会让健康、教育等等以零价格消费方式来进行公共的和强制性的供给成为必要。

有一种主张（后面要考虑）想说明，这些活动增进了集体性的公众幸福，而不是仅仅影响到针对贫困者的再分配。如果后者是正当的，那么它很难令人满意，因为在历史上和理论上，相对于以类别形式集体输送具体服务来说，通过现金转移形式进行的再分配是一种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得多的方法。仍可坚持的是，福利哲学中有其它一些特征涉及到国家向那些或许被认为是私人的领域进行延伸。最常见的是一个福利社会需要超越市场金钱关系的团结感，市场金钱关系无论如何“正义”地组织起来，形成一种依附于价格和私人产权的体系，哪怕它们建构在平等主义基础上，也玷污了“共有”基础，或某种形式的社会团结。

当代福利争论在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和社会制度的演变中都有其根基。然而，福利理论似乎不是代表一种在建立关于社会改进的“科学”命题方面走向某种共识的运动。这些争论常常是类似争论的重演，它们包括了相同的价值、命题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尽管有一些取得过明显共识的时期，但它们是短命的，常常是意识形态统一的脆弱外表，下面则充满争论。最难以解决的福利论争发生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幸福概念及其政策含义

福 利

之间。这是本书其余部分的主要关注点。尽管后面所关注的多是这种人为分割所产生的问题的分析方面,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它们有重要的历史维度。福利问题是重复发生的问题。

第四章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福利

当代自由主义福利经济学不是重述亚当·斯密建构的社会哲学,而是由 19 世纪的功利主义以某种歪曲的形式向前推进了一步。它在 1960 和 1970 年代进行了重新建构,不仅对自由主义哲学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表述,而且系统地捍卫了那种与政治上和知识上已经成为正统的福利国家相对立的市场秩序。在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已经衰落的福利观点,它基于狭窄的、严格的和毫不妥协式个人主义的人性原则。这些原则不会公理式地排除一些我们现在将其与福利国家相联的公共服务,这种容纳依附于所碰到的某些严格条件。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点绝望地坚持福利科学的观念,它试图建构的福利理论不诉诸独立于个人主观选择的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判断。

应该指出的是,在什么意义上,“福利”一词在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中得以使用:它是每个个人私有的、不可沟通的经验,与幸福标准无关,这些个人是相互分离的,“孤立”于其社群之外。即使这个理论不排除(认真列出的)物品和服务的集体供

福 利

给,这种要求背后的理由是,只以这种形式供给,某种个人的满足才能实现。在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中,“效率”一词常常用作福利的同义词,因为它明确地被界定为必要的主观愿望的满足。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传统中,可以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像社会福利功能那样,不能合逻辑地化约为关于个人的判断^①。

然而,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尽管就这种效率意义上说,国家行动在某种环境下可以改善市场,但很难看出,这种改善如何与严格的个人主义保持完全一致。尽管就显示人们对正常物品和服务的偏好来说,市场是令人羡慕的机制,但得承认,在交易机制失去效率的那些领域中,存在一个寻找与个人主义相一致的替代机制问题。投票是市场的一个明显替代物,但是,多数程序——即使在完美运作的情况下——会将决定强加给不情愿的人们。

提供一种福利“科学”的企图来自一个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雷托(1848—1923)^②。“帕雷托原则”说,当一种变化让人们(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同时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坏时,我们就可以合法地谈论福利改进。一个没有给任何人带来负面影响的市场交易显然是帕雷托改进,而且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观主义非常一致。帕雷托原则依附三个假定:1)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2)社会福利完全是个人

① 关于方法个人主义, see K.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

② 对帕雷托著作的描述, see J. Schumpeter, *Ten Great Economist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

福利的功能;3)如果一个人的福利增加,同时没有任何人的福利减少,那么“社会”福利增加。这些假定可以说包含了价值判断。它们显然不是一种行为主义式的观察,它们依附关于幸福和满足的个人主义假定,而这决不是没有争议的。尽管如此,这些价值判断据认为是最低限度的,因此要求得到普遍同意。如果否认一种有利于某些人同时不损害其他人的变化是一种福利改进,那会让人觉得很奇怪。其实,主要的抱怨涉及到帕雷托原则作为一种福利判断的不足性,而不是它的无效性。

应该清楚的是,这种福利理论不同于传统功利主义,至少不同于19世纪边沁式功利主义。它的确假定一种“客观的”福利功能可以从个人偏好中汇总出来。这要求进行人际效用比较,以及用某种方法测量其它政策对人们的相对影响。理论上,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潜在的激进福利理论,它会比较替代性的“目标—状态”,也就是社会幸福模式。但这种方法明显是评价性的:它认为某种状态是“更好”的、更有效率的和福利强化的状态,即使知道有人会因它们的强加而受害(尽管很微弱)。然而由于功利主义有更为强烈的福利含义,所以它所允许的政策可能会更有争议。

因为帕雷托标准明确禁止效用的人际比较和基数测量,而只关心个人的主观选择,所以它的评价意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在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某种事态才能被称为“更好”或更有效率。特别重要的是,现状——尤其是帕雷托改进起步时的资源分配状态——占据了特别有利的位置。帕雷托福利经济学对现状的接受并不意味着赞同现状:关键是该理论对初始分配的

福 利

沉默意味着它企图留在经济“科学”范围内,而不是扩展出去,进入更具实质性的伦理哲学。它导致一种表面上奇怪的立场,譬如说,1846年废止谷物法不是严格的帕雷托改进,尽管根据抽象的经济理论信条,国际自由贸易的确是“最优”的政策。当理论家将“更好”、“更有效率”或“福利强化”之类的词语添加到某种社会或经济体系中时,问题就发生了。因此,帕雷托福利经济学并不总是符合实质性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信条^①。

这一切都没有排除福利经济学家对现状做某种评论:交易始于对这些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描述。的确,帕雷托派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如下的建议是完全合适的:对初始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再安排,然后承认自由交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然而,初始再安排的理由必须来自评价性的概念,即社会正义或平等,与其说它们属于福利经济理论,不如恰当地说属于伦理和社会哲学的领域。它也是某种政治过程的结果,但是,除非一种投票过程被全体一致地接受,否则,其结果会与帕雷托式个人主义信条相冲突。

而且,对于这种严格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对作为帕雷托派福利经济学目标的“自我”性或“主体”性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这个主体就是正统宏观经济学中的原子化的个人,他们身份的确立是根据基本上即时的欲望而不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群成员资格。所以,他或她所拥有的任何资源权利资格都来

^① See C. K. Rowley and A. T. Peacock, *Welfare Economics: A Liberal Restatement*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75).

自个人的交换、赠送等等,而不是来自他或她作为公民的身份。

这并不排除福利国家输送市场外支付的可能性。它们也许可以在被认为合法的民主过程中很好地通过投票来达成,但是这种权利资格形式明显不同于来自某种社会成员资格的形式,这种社会具有共同的价值和共享的资源。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否认有这些共同价值,认为只存在个人欲望。

在福利理论的建构中,拒绝承认道德相关性还有进一步的有趣含义,因为它们似乎预先排除对福利接受者做道德判断,这种“道德主义”正是 19 世纪社会思想的一个特征。个人主义福利理论似乎鼓励一种怀疑主义,它常常保守地声称,非歧视性福利鼓励形成一种不受欢迎的道德特征。当然,有许多来自自由主义的反对福利的观点,但很难看出上述观点是如何成立的,因为自由主义宇宙论有一种无情的主观主义,它排除了我们都应该遵守的客观道德标准存在的可能性。最常见的支持福利的帕雷托理由在于这样一种主张:济贫其实增加了捐献者的幸福,因为这种贫困的存在是某种“公共恶”(参见下面)。

有两个关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福利的问题引起更直接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涉及自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在满足个人欲望的有限意义上,基于私人产权和自由交换的不受阻碍的市场的的确让福利最大化。这是真的吗?抑或存在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产生的福利改进(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能允许的有限意义)?第二个问题涉及关键性的分配问题。一种不能直接处理这个问题的福利解释是可以理解的吗?自由个人主义对市场外福利的似乎合理的证明主导了后一个问题。

二

尽管一个自由市场是否能最大化福利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的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它直接关系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国家的合法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均衡问题:当分权主体的行动是如此的协调,以致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资源不被浪费,所有物品和服务的价格恰好反映了生产成本时,一个经济就处于均衡之中^①。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主张是,一个完全竞争性的均衡满足社会福利的帕雷托标准:如果不让一个人变得更坏,就不能进行任何收费。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完全竞争性的均衡理想除了表示个人欲望得到满足之外,还有许多福利改进特征。除了初始资源禀赋不平等这个重要问题之外,竞争性市场有许多有利于某种平等主义的特征。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反映了边际成本(垄断的缺乏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生产者能够因为对关键资源享有排他性所有权而减少产出并同时提高价格),每个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恰好被支付足够的收入以确保最大的生产力,以致没有企业家“利润”。193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著名的有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②,将均衡模型视为理性社会主义生产的

① F. A. Hahn, *On the Concept of Equilibriu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② 对这类“市场社会主义”的阐述和批评, See D Lavoie,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一个标准,这的确不足为奇。他们恰恰像正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样,采用相同的人的概念,即人只不过是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不过,他们主张现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不能利用经济社会的潜在福利可能性。大多数当代社会主义者现在承认市场不仅仅是利润的发动机,而且实际上为最大化每个人的福利创造了机会。所要争论的是关于它们局限性的问题^①。

不难看出,如果用完全市场均衡的标准来对照,那么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是没有效率的。垄断和其它市场不完善的普遍存在意味着存在国家干预的机会,以便为作为整体的社会带来福利改进。然而,对帕雷托原则做严格的解释意味着,垄断者应该因丧失现状中的特权而得到补偿,对于许多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这个立场过于保守。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领域,国家有同样合理的机会来对市场进行福利改进^②。外部性通常是由分权主体强加在第三方和整个社会之上的害处(尽管它们也可以是好处),而且出于技术原因,它不能由市场来定价。公共物品也以相同的逻辑得到解释:在纯粹意义上,它们是非竞争性的(一人或多人的消费不减少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和非排他性的(一旦被供给出来,没有为他们付费的人不能被排除在消费之外)。有意思的是(以下要考虑到),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试图再分配福利国家的某些特征辩护,其方式是采用一种关于公共

① 社会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市场失败”是全面的。

② See especially, W.J. Baumol,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2nd ed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物品/外部性的主张,认为再分配能够让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接受者变得更好。

表面上,自由主义福利理论似乎严格倾向于自由放任,国家只限于校正市场失败和决定有效率的资源分配的个人选择。然而,市场社会主义和其他讨论市场失败的理论家设法扩展国家领域,以便(讽刺性地)在自由的基础上生产出非自由的国家。一旦承认均衡也许不会自动地达到(通过运用亚当·斯密的“天然自由”),那么对于由人工生产的可欲结果就很少有理论上的限制。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充满了反垄断立法、经济法规和福利制度和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有一种似乎合理的经济理由。

其实,当代自由主义理论不根据自由市场满足个人行动完全协调的某种均衡目标状态,来描述自由市场的福利特征。当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冯·哈耶克^①特别排除了在最大化某种整体福利功能方面的市场正当性理由,这种福利功能最不需要增加和比较个人效用。这种主张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也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它认为,在市场本身的运作之前,没有一个中央计划者能够预先知道生产协调的均衡目标状态会显示什么特征。经济学知识不像蕴含在物质系统中的工程类知识,它分散于经济过程中所有人类行动者之中。而且,这类知识快速而短暂,无法在“计划”或人为改进方案中被捕捉。

要说明均衡福利经济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鲜明对

^① F. A. von Hayek, *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London: Routage and Kegan Paul, 1976), ch. 8.

比,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垄断问题。一个“自然的”垄断者,即一种匮乏物品的单一供给者,可以出自一个不受阻碍的市场。这个供给者通过将价格固定在边际成本之上,可以获得一个垄断“租金”或超常利润。在经济学家意识中,福利或效率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得以提高:用征税收走那种利润,对这种活动进行国家化,或通过其它方法确保收取一个均衡价格的费用等等。然而,许多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否认这种干预必然是福利强化的^①。

这种怀疑主义因为许多原因而得以维持。首先,据说真正的自然垄断相当少见,而许多例子其实是某种特殊的国家特权。其次,当它们确实发生时,据说来自新成员的潜在竞争前景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垄断者的多余利润。因此,政府政策的基本特征一定是维持公开和竞争性的市场。第三,据说展示多余利润前景也许是鼓励个人进行冒险活动的惟一方式。第四,最重要的是,如果政府要最大化经济学家意义上的福利,那么,它如何知道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合适的价格是多少呢?既然市场本身是表达个人选择的最合适机制,而且均衡福利经济学的确根据个人主观经验来识别幸福,这种机制的削弱会意味着排除了关于选择的基本信息资源。投票本身的确是个人选择的表达,自由的个人承认它在某些福利领域的必要性,但它在垄断或其它市场不完善方面很难如此。

^① R.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960, pp. 1-44.

福 利

如果参照某种想象的均衡,却不能发现市场的福利特征,那么这种均衡的优点是什么呢?答案包含在亚当·斯密的“天然自由”概念中,它只是指个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最好地利用所能获得的分散化知识的自由。其中的福利标准是间接效用,就是说,一个社群的幸福是个人努力的产品,而不是由一套完全协调的经济安排精心创造的结果。在缺乏实现这些计划所要求的集中化知识的情况下,据说市场过程本身,尽管不完善,常常校正分配错误,并因此将该体系推向均衡。然而,它是一个可能被个体交易者所面对的数据变化打破的均衡。因此,尽管必须存在企业家“利润”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上可以改变的不平等,以激励该体系,但是对于竞争性体系本身来说,这可能是危险而有害的^①。

尽管这样一种分析声称是实证主义,因为它旨在客观地描述市场体系如何被理解,而不管它们的道德价值,这种分析隐含着至少两个价值判断,它们对理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体系和福利国家理论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价值判断强调市场是个人自主性得以发挥的一个领域。如果自主行动被描述为源自从属于外部因素的人类主体的有意行动,那么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据说比其它形式的社会组织更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点。如果一个人类社会真的充满严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那么实验和创新只能来自分散化个人的行动。从亚当·斯密至今,所

^① I. Kirzner,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有市场理论家都在争论这样一个观点：市场本身让个人变得软弱无力，并使他们不能进行自主行动。譬如说，霍布豪斯和“新自由主义者”就支持这种观点。

从强调自主性和自决性生发出去，尽管自利是根据个人偏好进行有效资源分配的关键机制，但市场特征并没有被自我主义行动所穷尽。市场体系让自由成为必需，它可以在每个人自主意识的主导下加以运用。市场的这种使能特征对于解释福利体系、相互帮助等从国家之外发展起来的历史事实至关重要。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并不否认，也许有一种关于国家福利正当性的证明，但是他们会认为，根据传统的输送形式，国家福利代表了自主性的丧失：这正是他们对战后福利国家的主要批评。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意含的第二个福利价值判断涉及市场过程的结果。尽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认为市场的正当性在于它们满足由某种抽象的整体福利功能所设定的标准，但是其大部分判断是后果主义的，因为交易体系据说在促进幸福（功利主义意义上）——包括促进最穷者的幸福——方面会“更好”。甚至哈耶克也有一种模糊的理想福利政策概念，而他一向特别强调人类行动的不可知性和不可预测性，并且运用这种主张反对政府追求“最优”的福利政策。他认为，如果一项经济政策旨在“增加社会任何成员随机获取高收入的机会”，那么这项政策就是最优的^①。尽管这并不是因为市场有福利强化的特征而企

^① “The Principles of a Liberal Social Order”, in F. A. von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7), p. 153.

图对它进行任何定量意义上的评估,但根据市场对个人自主性的贡献而对它进行评价就不那么一样了。吸收某种集体主义的福利标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最个人主义的教义中也是如此。

这里所说的要点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说服力方面的确非常依附某种整体标准:正是一种少见的个人主义者对市场的结果保持沉默,并将自己局限于评价各种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规则和程序(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权利)。正如阿玛塔亚·森所评论的:“很难想象市场价值可以与它的结果和成就价值分开”^①。很少有人会否认自由市场经济历史上曾有效率地分配资源——至少相对于已知的其它体制而言,因此,在狭义的经济意义上,它促进了福利。

三

市场哲学有一种正统说法,认为有某种不能被交易过程满足的主观欲求。尽管许多自由主义者会否认,诉诸一种假设的均衡是证明国家干预正当性的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但是,他们会声称这些干预措施是合法的。其总的说辞是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理论。那种认为国防、法律和秩序、洁净水之类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有动力来供给所以必须集体性地供给的观点是人们比较熟

^① A. Sen, “The moral Standing of the Market”, in Ellen Frankel Paul, Fred Miller and J. Paul (eds), *Ethics and Economics* (Oxford: Blackwell, 1985), p. 7.

悉的；而人们不那么熟悉的则是认为福利和济贫也可以类似地供给：福利是一种公共物品，国家供给的正当性可以根据完全相同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理由来证明，这些理由支持集体供给国防和洁净水等更为传统的公共物品。

米尔顿·弗里德曼写下了这样著名的一段话：

我因所见的贫困苦恼；我因它的减轻而受益；所以，其他人慈善的好处自然部分地加到我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人都会愿意为济贫做贡献，假如所有其他人也那样做的话^①。

这里所说的是，济贫是所有人想要的真正的公共物品，但由于个人所面对的动力结构的问题，它不能被自愿地供给。每个人对济贫所做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以致于不值得那样做。如果这种贡献很大，它就会需要许多个人的合作，在给定所有自由个人主义思想都接受的行为假定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背叛任何自愿的协议。因此，尽管福利供给确实依附个人的利他主义偏好，但私人市场在技术上无法有效率地记录这些偏好。这并不是说，福利的正当性是出于家长制理由，它所支持的再分配内在地“正当”或社会性地公正，而是说，强制性福利供给有利于每个人，包括满足捐赠者的偏好。它被正确而矛盾地称为一种“自

^① M.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 190.

福 利

愿的强制”。

暂时放下福利是否是一种真正的公共物品这种基本问题。我们看到,上面的陈述有许多含义。假设国家福利的这种正当性不是家长制的,而且它的存在与自由相容,那么接下来的似乎是,而且肯定是弗里德曼所做的推论,他认为福利应该以现金形式分配,而不与任何特定的消费模式联系起来。而且这还意味着,福利输送在其接受者方面不应该伴随任何相应的义务:正是他们的痛苦需要减轻,而不管他们的道德条件如何。在这里,它与自由主义的无情的主观主义相一致,而与 19 世纪的某种福利理论不相容,这种理论试图将济贫与某种道德特征的开发联系在一起。这种形式的福利似乎也与一个自由社会的思想很好地胶合在一起,这个社会是由无名商人松散协调起来的集合,他们的身份通过普遍的自利特征,而不是通过特定社群的成员资格来进行确认:这是一种关于个体性的观念,它对于保守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来说都是陌生的。

尽管这种自由主义主张的确认为济贫是一种公共物品,但它仍然允许个人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评,认为由现代福利国家供给的大量传统式服务如健康、教育、退休金等其实是私人物品,因为它们由可辨识的个人消费着具体的数量,因此可以更有效率地由市场来供给。当公共的福利物品由这种形式输送时,它就违反了自由主义和主观主义原则,因为由国家(强制)供给特定服务意味着家长制;它认为个人不能做出正确或“理性”的选择。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尽管决不反对再分配,但对统一的、强制性的教育体系怀有敌意,因为它会威胁自由社会所拥有的

多元主义和对个人选择的尊重。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作者们不可能主张“效率”会因国家输送特定福利服务而得以最大化:据认为,如果存在集体化的失业保险、教育、退休金、保健等等,那么任何人或“社会”会变得更好。据说,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证明国家的作用,这些活动都是合法的。尽管国防之类的物品不会要求禁止私人提供服务,但它们的确要求个人必须参与集体计划。

一个熟悉的理由是,技术上有效率的资源分配——它让服务供给完全符合人们的主观选择——要求个人是完全知情的理性主体:但是,如果个人不知道相关事实,那么关键服务的生产者可能利用他们对知识的垄断而从无助的消费者那里抽取“租金”。政府干预在这里肯定会让市场更有效率吗?国家化卫生体系的正当性常常明显地以这种方式得以证明。

在供给某种据认为是私人福利物品方面,支持某种国家卷入的另一种效率主张来自个人的所谓短视。例如,个人也许有太强的时间偏好,就是说,为了一个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他们以太高的比率折扣未来。因此,强制性的养老金捐献是正当的,因为这些太看重现在的个人不会为他们的退休节省开支,从而将以许多老年人和贫困人的形式出现的福利问题留给政府。既然政府不可能简单地让他们承担短视的后果,它就会供给他们福利。然而,这其实会鼓励人们短视,从而产生大规模的“道德风险”^①。

^① See G. Gilder, *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尽管如此,暂时不管此类政府行动是否是对真正的市场失败的反应这个问题,就是这种失败也是可以置疑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它们背后的理论包含了对原始自由个人主义的福利改进解释的重大修正。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这种主观主义原则受到严重削弱。就为诸如健康津贴、退休金等提供强制性国家保险来说,这种削弱是肯定的。尽管无疑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案例,但很难避免这样一个结论:它是家长制的。这种主张在福利理论中常常见到,而且不会自动被拒绝。的确,19世纪福利政策和制度,如济贫法,有很强的家长制色彩,而且功利主义并不排斥这一点,至少在其公共政策宣示中是如此。实际上,纯粹自由个人主义中家长制的缺乏使这种教义和几乎所有其它的福利哲学之间形成特别重要的区别。

而且,有种主张认为,因为自由市场中存在与私人行动有关的信息问题,所以国家行动可以带来效率改进,这一主张依附于对自由个人主义立场的一种微妙误解。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经济社会中存在有效率的资源分配(因而存在最大化可能福利的环境),那么必须假定,个体买者和卖者完全知晓所有相关的事实以及其它行动路线。然而,这种信息乌托邦的缺乏并不导致自由版市场的失效。这会混淆自由主义和“均衡”政治经济学^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供给普通物品和服务的自由版市场中,交易过程的价值不在于它能达致行动的完全协调,而在

^① See N.P. Barry, *The Invisible Hand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8).

于它能让个人有机会利用所有复杂社会显示的分散知识的机会。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人们所熟悉的福利物品一定不同。因此,即使个人常常不了解保健的专门技术,也不能假定供给者之间的竞争会比政治当局的权威性决定更没有“效率”。进一步说,人们想在健康上面花费多少,这本身恰恰是一种主观现象(保健首先是一种稀缺物品,它与其它匮乏物品处于竞争之中),而且如果我们想保持在自由个人主义框架之内,我们就不能假定,国家——甚至还会专门有一套民主投票系统——在显示人们偏好方面会比市场更好。

不难看出,现代福利经济学家如何设法在市场失败这个表面上止痛的标题下面,为超过古典自由主义所允许的国家在福利领域更广泛的活动提供有效性证明,而且不诉诸在伦理上更具争议性的要求,这种要求涉及平等、社会正义等直接的分配标准。的确,当代福利经济学家也许可以视为爱德文·查德威克在20世纪的代表,因为他们先承认个人主义和市场分配机制,然后,通过在健康、教育、退休金、住房等方面采取一系列具体步骤,而生产出一种似乎远离那些原始自由根基的总体福利体系。然而,很难看出,集体福利判断——它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如何能从个人价值中引申出来,这些个人价值在复杂社会中具有多样性和不可测量性。更富争议性的是认为集体供给这种福利与自由相一致(尽管它也许有某些其它的伦理理由)。

四

尽管难以将自由主义福利概念延伸到实际上是私人物品的

供给上,但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济贫的意义上,提供福利的最小作用本身是否与自由个人主义相容。对于许多自由主义者——包括前面提到的支持自由放任政策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似乎明显的是,尽管慈善活动是可欲的,但由于公共物品问题,单靠它不足以满足个人利他主义偏好。对于自由个人主义者来说,国家在这里不是以家长制方式行动的,因为它让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欲望都发挥作用:这能确保真正的福利改进吗?

然而,这个命题决不会被所有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所接受。一方面,假设存在这样一个公共物品陷阱:如果我的捐献对福利供给很少有或没有作用,而且如果我的利他主义偏好被其他人的捐献满足,那么哪里还有动力来自愿提供福利呢?那就很难看出慈善活动如何存在,但另一方面,在西方社会,还是有很多自愿的活动。的确,有很多的经验证据表明,当收入上升时,慈善捐款也会上升,尽管不成比例^①。而且,税负下降和慈善增加之间也存在经验联系。

然而,假设个人出于道德责任感提供慈善,而不管别人怎么做,比假设表达某种利他主义偏好似乎更为合理^②。如果人们出于道德原因捐款,那么就没有公共物品问题,因为责任的约束性对每个人都一样,而与所供给的福利总量基本无关。当然,社

① R. Sugden, *who Care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3), pp. 12 – 14.

② *Ibid.*, pp. 28 – 30.

群中道德责任的存在无法说明,会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撑当今的福利国家,尽管它也许会足以减轻明显的贫困。还有,如果没有当代福利国家,那就意味着税收会更低,而且可以预想实现道德责任的动机会强烈得多。肯定可以合理地假设,许多人现在认为他们的道德责任正在实现,显然是因为已经存在大范围的由税收支持的福利服务。

罗伯特·苏哥登对关于福利的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抽象而有力的批评,正如他所说^①,最不可能的是,存在足够广泛的利他主义情感,来证明盛行的福利服务结构的正当性。利他主义者不直接关心自己对慈善的贡献,而只关心他私人的消费和慈善的总体收入。既然对于利他主义者来说,谁来捐献无关重要,因为慈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有益的,那么,公共物品理论就有一种奇怪的、不合理的含义:如果一个人知道慈善收入会有其它来源,那么他实际上会让自己的收入有更高比例的增长。正是这种公共物品陷阱才妨碍了此类捐献——这就是福利国家的理由^②。正如苏哥登所指出的,在支持自由放任政策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更为集体主义的社会理论家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对照,前者根据所谓利他主义动机,为一种矛盾的“强制供给的”福利体系辩护,而后者则诉诸类似的“关心”假设来证明福利国家的终极道德。因此,并非不合理地假定,人们的道德责任感足以为济贫提供某种自愿的供给,不管他们对总体福利收入的看法如

① *Ibid.*, p. 24.

② *Ibid.*, p. 26.

何。尽管这种自愿主义不足以产生现有福利国家的范围和程度,但它实际上是非物质性的。现在盛行的为福利提供正当性证明的自由主义公共物品理论也未能如此。一方面,很难认为公共供给基本上是私人性的物品可以根据效率标准来证明其正当性,另一方面,它典型的强制性特征——譬如说在社会保险和退休金方面——的确包含了自由的损失。公共物品式福利证明背后的“自愿强制”观念是用名不当,它掩盖了重大的伦理价值冲突。完备的福利体系是否能同自由主义传统相协调,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五

正如前面所说的,即便承认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解释市场如何让效率和选择自由同时最大化——它们都是特别重要的福利强化特征,但这个教义本身对帕雷托改进赖以进行的产权分配通常保持沉默。麻烦在于它努力保持一种福利“科学”,或至少是一种拥有最少量的伦理假定的理论,它让自己不能就那些分配问题发表评论,而这种问题又恰恰是福利争论的内容。因此,尽管能够具有说服力地主张,两方(或多方)之间的自愿交易构成一种福利改进,因为它满足几乎一致的同意这个标准,但交易者的相应经济地位,即他们的财产持有,不能构成福利改进的内容。这些可能同时是努力(劳动交易)和运气(如继承遗产)的结果。然而,为了对此做一价值判断,就要偏离自由主义理论所意含的原初最弱意义的价值。的确,正是在复杂的工业社会

中缺乏适于这种分配问题的伦理标准共识,从而加强了个人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戏剧性的沉默。据认为,不容易对分配问题进行理性探讨,因为所有福利都混杂着冲突的观点和不可比较的价值。自由个人主义者无论为初始产权提供什么辩护理由,他们很少处理社会福利问题。其实,他们所做的大多是像保守主义/功利主义那样接受现状,或者接受来自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和权利资格理论。

当然,自由主义福利论中的困难是,产权分配能够影响市场过程的结果,从而将某种合理性借给了那种认为市场其实是强制性的观点,即使市场机制是根据自愿和同意来定义的。尽管这个命题在第五章将得到更详细的讨论,但这里先提一个让人惊讶的例子,作为对一般性主题的有益介绍。

阿玛塔亚·森在他关于印度饥荒的著作中阐明,大灾难能够并且已经通过市场过程的和平运作而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权利不被侵犯,合法的过程受到尊重^①。他引证了一些例子,在食物供给总体足够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和可以避免的灾难发生了,是因为市场不能分配资源给那些显然需要它的人。因此,它不是一种自然的大灾难,市场不会因为它而受谴责,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为”的大灾难,它是由与忽视人类福利的交易系统相结合的产权分配带来的。

这种现象也许与复杂的西方工业社会的福利问题不沾边。它们的频率的确可以被置疑,而且我们当然可以预先假定:认为

① 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集体措施在避免灾难方面会更有效。在消灭了市场体系的社会中发生饥荒的证据至少同样惊人^①。尽管如此,森还是这样来概括他的论点: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如果人们不去乞讨食物,只是因为“国家提供了社会福利系统”^②。这是一个相当强的观点:少数集体主义理论家会坚持认为,在西方,一些人会在一个不受阻碍的市场中受到饥饿的威胁;或者说,这些人会被剥夺对繁荣的分享,而这种分享受到非个人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的支持。

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建构一种福利哲学,它坚持个人主义的非强制特征,又不让自己受到森的批评。这其实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政治体系应该很好地设计,能够准确反映个人对济贫的情感,或者那些在整个历史上存在的纯粹自愿性安排的可能性应该受到更多的注意。或许这两者的某种联合会构成一种理想的福利政策。

前面已经指出,不可能存在一种广泛的利他主义情感,从而足以根据公共物品观点证明现有福利体系的有效性。然而,一些自由主义者仍然会坚持认为,福利中有一种公共物品元素,而且,如果它的供给来自投票制度下政治选择的结果,那么它就与主观主义相一致。但是,他们会进一步说,西方民主国家现有的简单多数规则体系不足以表达福利情感,就是说,它们允许利益联盟利用该体系来满足少数不需要者的利益。的确,福利国家

① 当代一个好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

② “The Profit Motive”, *Lloyds Bank Review*, 1983, p. 12.

第四章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福利

由于供给许多类型化的物品和服务,所以发展成了(也许偶然地)私人利益的复杂结构,有许多证据显示,再分配是从低收入群流往中间收入群(见第六章)。如果有一种福利情感只能通过公共机构来表达,正如许多自由个人主义者所支持的,那么,该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案会沿着消除政治体系中无效率的方向,而不是只关注“市场失败”和真正理想的政策。

第五章 个人主义的批评和福利伦理学

一

第四章所讨论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试图建构一种只在有限程度上依附伦理学的福利理论。尽管有个一般性假定,认为在功利主义意义上,竞争性市场的效率特征会导致一种所有人(包括境况最差的人)都获益的资源再分配,但它的理由既是“科学的”,又是伦理的。与此相关的惟一的道德价值似乎是自由(且不谈交易体系运作所必需的形式正义规则);但是,即使这个概念也是在传统的消极意义上被理解的,其中,个人自由是(可改变的)强制性法律之缺失的功能。禁止个人效用的人际比较(它是福利科学所需要的)是一件紧身衣,穿上它就排除了再分配的伦理学。为贫困者提供市场外支付的理由依附于社群中存在利他主义情感。在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福利社会被定义为可以帮助最不利者(被吹捧为“溢流”效果)的市场效率和慈善的结合。决不可说市场导致了贫困。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反对由市场决定的资源分配受到市场外道德原则的干预,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却常常被低估的理由,那就是在这些再分配标准方面很少有一致意见,且不论在实施过程中会有不当分配的效果。譬如说,尽管“需要(need)”似乎是客观性的,但在生存所要求的最低资源水平之上(这在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标准),则只有冲突性的“想要(want)”在翻滚,它们都要求从必然有限的资源中得到满足。社会正义是一个有诱惑力的理念,它建议在收入决定中用功劳和努力等道德标准来替代劳动市场的非道德决策,但它同样为无法解决的冲突所困扰。由于缺乏真正的价值等级,因而通过民主体系来处理福利要求导致了资源的随机分配,这种分配既是伦理原则的反映,也是政治权力的反映。

然而,自由个人主义的福利理论不只是对伦理和市场效率的描述。在关于社会福利的文献中,市场与国家的两分常常被设定,而且,据说市场这种冰冷的机制对福利“需要”不敏感,因为前者受自利动机推动,而后者显然不能转换成价格;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些贫困者缺乏资源来支付市场设定的价格。

有两个理由说明这种两分法是误导性的。首先,不能预先假定一个前提,说国家对这些需要敏感(这一点后面还要讨论)。其次,它取消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存在一个既非政治的也非经济的(狭义意义上)人类行动领域。因此,正确的两分应该在自由和强制之间。而且,自由不局限于市场交易,因为强制的缺乏增加了个人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的机会。这并非简单地意味着,个人可以为自己购买基本福利物品、退休金、保健、社会保

险等,并因此从这种“私有化”中获益,即使它伴随有一些再分配措施,来反制资源获取方面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它也仍然将自由与市场价格的经验联系起来。然而,自由可能在这种关系之外得以运用,并且会有利于共享的福利理念。这里可以举出的例子是“互助组织”^①或“友好社会”,其中,小群体中的个人通过自愿行动供应其成员的福利。这里,在由国家所设定的关于需要的正式“定义”之外,可以使用所谓非市场的“需要”标准。早期工会的功能就包括这种活动,移民形成了类似的结社,而“无政府主义”作家^②常常将它们看作社会现象中的例子,以逃避市场和国家在概念上的排他性。这些组织通过一种基于互惠义务的复杂网络联结在一起。历史上,这些结社大多被国家接管;结果是,社会福利安排要么成为由国家组织的“公共”安排,要么成为由价格决定的“私人”安排。

自本世纪早期新自由主义产生以来,国家与市场之间这种误导性的两分就一直主宰了福利伦理学,而且它导致了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进一步混乱。竞争与合作的对照导致将市场视为非合作博弈,一种只有胜者和负者的博弈,而不是存在互惠利益的交易。这无疑是赫伯特·斯宾塞所鼓励的一种态度。于是,理查德·提特莫斯写道:“资本主义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失败:它促进了

① D. Green, *Working Class Patients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 Self - help in Britain from the Mid - Nineteenth Century to 1948* (London: Temple, 1985).

② See Michael Taylor, *Anarchy, Community and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社会灭绝”^①。尽管大多数集体主义福利理论家(包括提特莫斯本人)不会拒绝市场本身,但是他们的确认为它是让一些人需要福利的那些经济不幸的原因。

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里的“原因”意味着什么。据认为,福利理论家不会声称市场体系导致了那些自然的不幸——它们让某些人天生不能正常参与社会,尽管据说不同经济体系对自然灾害的反应要接受道德批评。不过,这种主张肯定认为,市场远不能增进幸福,它们无情的分配过程产生了(经济上)必然之变化的“无辜”受害者。熊彼特有个著名的描述,说个人主义的企业家精神带来了“创造性毁灭的狂风”,但这种描述没有提到狂风之后的灾难。于是,鉴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因果观念与行动责任有联系(因此它不愿支持容易获得的福利,因为它可能产生不负责任的和没有远见的行为),所以,社会福利理论家将因果之说理解为南辕北辙。一些作家会走得更远,认为仅仅“脆弱性”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资源要求的正当性,不用管可以起作用的因果机制^②。

既然市场关系是竞争性的,那么,正如该理论所说的,它们肯定也是分裂性的,切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社群纽带,而这些纽带是处理那些我们易受伤害的灾难所需要的。这里最重要的一般原则是“团结”:它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福利不能简化为个人

① Quoted in J. Kincaid, “Titmuss”, in P. Barker(ed.), *Founders of Welfare State* (London: Heinemann, 1984), p. 116.

② R. Goodin,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130.

福 利

因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而有权享受的幸福体验,而是包括了理性和社群情感的复杂融合。甚至据说,尽管在一种社会福利理论家不喜欢的语言中,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其实接受了经济“租金”,即他们在社会外可能得到的收入与他们实际得到的收入之间有差距,因为存在他们没有直接创造的一种社会合作。因此,福利其实是来自集体资源的一种“补偿”形式。

社会贯彻市场原则的效果就是要消解必要的社会纽带。对这个立场的最雄辩的捍卫可见于提特莫斯的《礼物关系》^①,这本书不仅比较了通过价格和通过捐赠的血液供给,而且解释了福利国家原则背后的伦理。要点是,如果这种最神圣的物品都商业化了,那么所有东西都会被价格玷污,以致没有任何道德纽带。捐血的伦理特征是,它本质上是给陌生人的一个礼物;它的给出不考虑什么权利资格、互惠义务(没有人有这种义务)、价格以及个人主义伦理学和经济学的所有其它概念。提特莫斯写道:

那些捐赠者不要求或不期望任何金钱回报,他们相信其他人在未来会利他主义式地行动,而且联合起来自由地捐献,如果他们需要这种捐献的话。通过对不认识的陌生人的未来行为表达了信心,他们因而否定了霍布斯的主题,即人类缺乏任何本能的道德感^②。

① R. M. Tittmuss, *The Gift Relationship*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0).

② Ibid, p. 175.

尽管如下论点也许会成立：某种活动的市场化会导致利他主义动机的下降（例如，血液被标价这种知识会对捐血的愿望带来负面影响^①）；但这样的观点不可能成立：福利国家可以根据利他主义原则而获得正当性。福利国家所要求的转移支付显然是强制性的，而且非自私行为在互惠义务背景（提特莫斯否认其重要性的道德现象）中比在陌生人之间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有一种似乎很奇怪的假设，认为福利制度和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团结精神和利他主义，它们最终会让这些安排中的强制因素变得多余。也许人们会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所识别的人类行为的这些特征不是普遍性的，而是依附于特定的环境（与此相对应的是，公共所有权的早期拥护者天真地相信，那些企业中一旦没有了“利润”，就会在雇员中鼓励更多的合作态度）。然而，人们会针对福利政策进行行为调适，即调适自己的行动以充分（常常“不公平”）利用福利政策提供的好处，这方面的证据是当代社会一个非常强的特征（见第六章），强得让上述主张显得根本就不合理。

然而，这并没有解决这样的主张：没有阻碍的市场导致福利问题，追求“效率”产生本来可以避免的痛苦。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任何进步的经济体系都会让某种占有变成陈迹，让某种社群易受该变化的边际效果的伤害。在这方面，市场体系的伦理性跟其它体系差不多。不能预先假定，20 世纪福利国家的兴起和扩张可以完全解释为一种对市场施加于社群之上的所谓破坏

^① See D. Collard, *Economics of Altru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的理性回应。

正如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批评者所努力指出的,正是经济变化的不可预测,让自由主义关于个人行动责任的观念显得不恰当。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现象,所以才有社会保险的增长,它首先发生在德国,随后发生在英国。然而,就当代福利国家的结构来说,这种推理的说服力似乎变小了。关键是,社会保险基本上是一种自由主义观念(尽管其强制性事实的确标志着对严格个人主义原则的偏离),因为它至少在理论上将获益与捐献相联,并且因此而消灭了财产调查。因为这个原因,贝弗里奇非常欣赏社会保险。他曾说:“自己收入的管理是公民自由的一个基本要素”^①。如果这是市场原则的替代品,那么很难看出一个自由的交易体系如何(在该词语的强意义上)导致贫困。它肯定不能解释可以在英国、美国以及其它地方观察到的奇怪现象,当经济繁荣增长时,依附某种国家援助的人口数目也在增长。这并非否认存在“不可保险”者(那些天生有遗传障碍的人)的问题;然而,大量的福利国家活动不是针对这个少数。

似乎同样合理的是,一些典型的福利国家政策 and 制度本身倾向于夸大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本身可以通过因果法则来解释的现象。一个让人惊讶的例子是,在英国,尽管人口停滞或下降,住房套数出现富余,但无家可归者的数目却在上

^① Quoted in A. Lynes, “Beveridge”, in *Founders of the Welfare State*, op. cit., p. 87.

升。这个数目被显赫的福利理论家雷蒙·普兰特和肯尼斯·胡弗^①用作市场引致福利问题的证据：它不能提供住房给那些显然需要它的人。市场为什么不能分配住房给那些需要它的人呢？其原因肯定可以通过贯穿整个世纪的一系列不连续的政府干预来解释，它们已经汇集成一个复杂的无效率网络^②。主要的干预是租金控制和所有者/占有者补助。对租金实行封顶只会减少地主出租地产的动机（从受控制的租金中获得的收益甚至不能弥补基本的维修费），而传统的对所有者/占有者的补助以及对抵押的税收减免等鼓励了人们对住房的过度投资。这后一种干预会进一步影响到住房价格的上升，从而诱惑地主变卖由所有者占有的那部分地产，这部分以前是出租的。而且，公共部门的租期保障和低廉租金鼓励人们呆在这些地方，而不管“客观”的需要如何。因此，无家可归者数目似乎无情地增长，这更多地与政治行动的反常效果有关，而不是与市场过程中的因果机制有关。

在国家福利的其它地方也确实有类似的反常效果，这种现象的发生，很可能是因为它们“普遍”可得的，而不管客观需要是什么。在提特莫斯的社会哲学中，普遍主义在原则上促进社会团结的伦理优点，这种团结克服了个人主义市场体系中的所谓分裂性。然而，普遍主义体系的反常效果不会在公共领域中再产生同样的分裂性吗？

① K. Hoover and R. Plant,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89).

② See M. Ricketts, *Lets into Leases* (London: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1987).

二

尽管如此,反常效果的存在没有破坏国家福利的伦理基础;它们可被视为技术性的而非道德性的问题,可以通过认真设计的方案来消除或至少减轻这些问题的强度。福利还有其它的道德基础,它们不依靠不怎么合理的利他主义理由,这种理由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旨在回应来自激进右派的对福利的有力批评。

关于国家福利正当性的复杂的道德证明更多的是个人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并且利用了传统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权利概念。其实,它们或许代表了这种传统的完成,而不是对它的拒绝:那些让个人能够追求其主观决定的目标的规则和程序是不够的,如果他们不能注意那些让有意义的生活成为可能的基本客观需要。这些理论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依附那种认为市场产生痛苦的主张。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就毁坏了据说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个人自主观念。这类福利理论家不会否认某种贫困确实会发生,譬如说,与交易过程无关的天生不幸等,他们会坚持认为,就市场伦理没有施加减轻这种痛苦的义务来说,它与那种认为每个人有平等的自主权这种自由主义信念不一致(这种立场并不一定会证明,人们利用他们平等自主权所带来的不平等是无效的)。不去帮助处于贫困中的人——当这种帮助不会花费太多时,其实在道德上等于伤害了那个人。

因此,福利供给不是简单的慈善之心或一点道德良知(指的

是一个人关心道德上值得称赞的而严格说来很难实施的行为),而是一种强制责任。这与提特莫斯伦理学背后的利他主义形成很好的对照:后者有点不那么合理地将福利责任置于可实施的义务网络之外的某种机制中。

该理论植根于人的自主观念。一个在不受强制性法律约束的意义上是形式上自由的人不会真正地自由,如果他们的选择不是来自他们自主的意志。因此,当一个人面对贫困或低工资的前景时,他在技术上会选择后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动受到物质威胁所决定——他们是被迫的。自由个人主义相信自由只受人类主体有意识的行动限制,根据这种观点,自由不能被非人格的社会力量限制,因为它们不能直接简化为可观察的个人。然而,阿尔伯特·维尔认为,“某种物质条件必定影响个人实现广泛的计划”^①。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种关于积极自由的理论——它将自由行动等同于理性行动,而是一种自称与自由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多元主义相一致的理论。维尔认为,“人们最终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②。并不是人们做出了“错误的”的选择,而是因为在缺乏福利的情况下,一些人的选择不得不变得狭窄。如果自由主义要求个人拥有平等自主的条件,而市场又没有满足,那么就会很矛盾地需要政府行动来保持自由的社会秩序。

雷蒙·普兰特以一种人们并非不熟悉的方式,主张自由主义

① A. Weale, *Political Theory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83), p.42.

② *Ibid.*, p. 28.

传统所坚持的整个主体概念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至少在原则上对真正的道德选择赖以做出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他写道:“基本需要必须被满足,这样才能做其它任何事情”^①。多元主义要求个人能够实现特定的计划和项目,并且能够做道德选择。需要(need)是实现道德自由的必要手段,这让它成为客观的,而非短暂的和主观的想要(want)。而且,想要不能形成对他人严格要求的基础,而需要则能够如此。需要和想要之间的区别规定了与它们有关的目标的特性;前者与道德生活本身的追求有关,而后者则与大体是即时的和短暂的欲望满足等同。

需要满足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的供给失败在道德上等同于伤害了某人。这个观点明显告诫,负有尊重此种义务之责任的主体应该能够履行义务,以限制福利强化行动,因为正是一种纯粹的良心责任,而非严格的道德义务,导致了那个人的痛苦。

这样,该观点似乎是合理的,甚至让人信服。它让如下的说法成立:“要不是Y故意不救他,X就不会死”。Y的不作为是故意的,在结果上要对X的死负责,因为履行救X所必需的行动对于Y来说没有或很少有成本。很难想象道德法典会不承认这样一种义务,而且在某些领域,它是法律上可实施的。它还与一种具有普遍济难义务的互惠伦理完全一致,这显然是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的需要。

^① R. Plant, “Needs, Agency and Rights”, in Charles G. Sampford and D. J. Galligan (eds), *Law, Rights and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Croom Helm, 1986), p. 29.

尽管如此,作为建立福利国家的基础,这种论点还是太脆弱了,就像一根非常纤细的芦苇。原因是,当义务以这种形式出现时,它就适用于任何道德主体。的确,从历史上看,比国家小的地方社区或其它结社以及作为私人的个人都已经认可这种义务。然而,福利国家的活动包含了重大的再分配和在远非没有成本的行动路线之间进行的明确选择。甚至让某人活下去的义务都并非一定是强制性的,因为医疗技术的改进可以让很多以前会死的人活下去。国家保健服务中心的医生不得不“配给”这种技术,他们常常根据粗鲁的功利标准——如病人的经济潜力——而做出决定。

只要行动成本低廉,那么义务就得维持,这种告诫限制了如下主张的适用性:道德本身将福利限制于特别少的情况。而且,如果以这样方式表达,那么它就是一个普遍原则;每个人都负有那种义务;而与“救命”问题相对立的基本福利问题则关涉特定社群中资源的权利资格和要求。值得置疑的是,这些非常一般性的道德考虑都关系到那些社群的福利问题。

三

即使很难根据人类主体的终极原则以及从属它的道德来证明福利国家的正当性,某些福利哲学家还是希望用权利语言来构造它——尽管关于教育、健康、退休金等等之类的权利据说是针对特定社群的要求,它们并不为一切个人所拥有。

然而,应该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福利哲学家都求助权利。

福 利

譬如说,提特莫斯就高度怀疑基于权利的福利体系^①。它的反对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他对福利国家的辩护来自利他主义:人们应该接受福利,如同接受来自一个“陌生人”的礼物,它是社会团结的表达,而不是来自互惠义务的复杂网络的权利资格。后者太容易让人想起个人主义社会,它拥有自利动机和反社群的福利安排。在实践意义上,他认为贫困者将会输光,如果福利完全转化为法律要求。既然每种情况都不一样,那么在福利输送中要谨慎;的确,决定福利问题的官员应该被视为利他主义的承担者,而不是敌对环境中竞争者之间的仲裁者。

然而,有很好的原因来解释许多福利哲学为什么重视权利——不管根据普遍术语还是社会术语来理解。其原因正如H.L.A.哈特所说,他们的财产意味着他们“特别一致地赞同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确保正义或公平之事或者某人做某事的权利事实上能够实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另一个人的强制才是合法的”^②。如果存在什么福利权,那么它成立的理由只能是,强制的正当性可以根据他们的占有所必需的资源分配来证明,所以,福利不是根据仁慈来辩护的,而是权利资格或正义的一个特征。

这种证明会对福利理论带来两个重要的后果。首先,福利权会与大家所熟悉的消极权利(也就是免受他人侵略性行动的

① R. M. Titmuss, "Welfare Rights, Law and Discretion" in B. Abel - Smith and K. Titmuss (eds), *The Philosophy of Welfar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7), pp. 232 - 53.

② "Are there and Natural Rights?", in A. Quinton (ed.),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55 - 6.

权利)相对称。其次,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它会为新保守主义反对福利国家的观点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因为存在可以通过法律来实施的福利权,所以在它的鼓励下,人们会相应地调整他们的行为,变成了福利权的要求者。于是,新保守主义者(以一种绝对非自由的方式)将“责备”送给这些人。然而,如果福利权与消极权利对称,那么这种情感也许不合适,因为人们有权得到身边的任何物品(换句话说,这里没有真正的道德风险问题)。

自由个人主义反对将福利(积极)权利转化成消极权利的观点路人皆知,可以简单地加以概括。其他人只要克制不干预,一个人的消极权利就受到尊重,而福利权则要求他人采取(济贫)行动;由于积极权利的满足要求资源再分配,所以合法的财产持有者的权利会受到侵犯,故而将福利权视为普遍权利就不大合适;侵犯消极权利的责任归属简单明了,而满足积极权利要求的责任则无法分配给任何人。进一步说,由于积极权利的不确定性,所以在一个极端,它们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进行大规模资源再分配的要求,而在另一个极端,则被解释为只不过是显示生存的权利。

可能除最后一个观点之外,人们现在已经接受——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接受——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间的对称性不能只根据上述考虑来证明。一个显而易见的论点是,除非(譬如说)生命权只被理解为禁止杀人的劝诫而没有权利如何受保护的含义,否则,消极权利就的确包含了国家的积极行动,其方式是提供法院、警察等等;再分配也是如此。而且,正如何兰·哈

福 利

姆林^①所指出的,如果对道德上允许只保护消极权利这种主张做严格的理解,那么实际上就会导致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无限支出和福利方面的零支出。“守夜人”国家尽管是有限的,但仍然会很大。

然而,也许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要说明,在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其它原因可以解释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间没有精确的对称。这些原因不同于反对将一个转化成另一个的任何实际原因。它们涵盖了以下问题:不确定性、可裁决性和责任性。

不确定性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福利权理论谈到两个潜在冲突的事情:一个是追求幸福的积极权利超过了生存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权利资格;另一个是作为权利基础的需要是客观的。因此,即使人们同意,对于一个发达的道德来说,幸福是基本要素,我们也很难看出,如果它成为一种合法要求,而且所要求之物超过一个明显的最小量,那么这种要求如何能转换成明确的权利语言。如果一个人相信价值的不可测量性和多样性,那么,将各种“幸福”并入一种权威的模式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概念将成为一种无可争议的权利的基础,那么它就得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不过,人们对于什么是“需要”还没有形成共识。

这个不确定性问题直接导致了可裁决性问题。可以理解的是,福利哲学家应该要求对福利权利进行宪法保护,因为几乎肯

^① A Hamlin, “Rights, Efficiency and Commensurability”, in *Law, Rights and the Welfare State*, op. cit., p. 97.

定是多数主义民主中宽松的政治规则以及授予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了二战后旨在平等和济贫的福利政策的失败：群体利益联盟淹没了想为社群中存在的贫困者争取某种形式福利的广泛愿望。然而，要求用严格的宪法标准防止（譬如说）中产阶层攫取福利国家不同于要求“一系列”福利权利（就像《联合国人权宣言》所做的那样）。难以想像一个人如何在法庭上主张：他的幸福权利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的确有许多民主国家在他们的实证法结构中包容了福利要求和权利资格，但是它们来自标准的政治过程而且可以很好地被裁断。这就是说，难以想像一种“自然的”或普遍的福利权如何被吸收进一个基本的宪法文件。值得指出的是，最成功的“权利”文件——《欧洲人权协定（1950）》——对福利问题什么也没说。

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间的最后区别集中在个人的行动责任问题上。人们也许以某种方式行动以便让自己有权得到福利，这会影响他们的道德要求吗？这个问题具有某种实践意义，因为众所周知，当代福利政策鼓励人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确保某种好处。阿兰·盖沃斯肯定相信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间的对称性，但他仍然强调主体“不能理性地要求他人帮助他拥有基本的幸福，除非他自己企图拥有它的努力徒劳无效”^①。大卫·哈里斯，一个社会权利和普遍权利的支持者，他也类似地认为：

^① A. Gewirth, "Private Philanthropy and Positive Rights" in Ellen Frankel Paul, Fred D. Miller, Jeffrey Paul and J. Ahrens (eds), *Beneficence, Philanthropy and the Public Good* (Oxford: Blackwell, 1987), p. 68.

“需要的事实——不管需要是如何被创造的——不能为需要——满足政策的标准辩护提供充实的基础”^①。这两位作者都暗示，因果历史和行动责任的直接分配问题与积极权利的道德地位相关。对于我来说，这些考虑似乎确实指向福利权利与熟悉的消极权利之间的清晰对称。例如，尽管我们可以说，一个在下午两点徒步通过中央公园的人是极为愚蠢的，但我们不会说，这种愚蠢因此让他们免受潜在鳄鱼攻击的权利变得没有价值。

关键是，我们没有自动授予福利权，它所引出的两种权利之间的区别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因为那些针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声称它产生了依附而不是个人责任，它们挑战着福利哲学的信条，也就是相对于完全非道德的竞争性市场世界中的制度来说，福利制度有助于培养较少贪婪的主体。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反对意见完全不依附于其它自由主义主张的说服力，就是说，我们不能将济贫责任归于“权利”伪装下的国家。

不管福利权利主张的说服力如何，我们不能说拒绝它们就会导致拒绝福利国家。因为还是可以主张公共机构有济难责任，甚至是强制性责任。如果该要求是以这种形式，而不是那种站不住脚的权利形式提出来，那么就可以提出一些条件，作为接受福利以及盖沃斯和哈里斯所列出的福利类型的前提。

然而，存在一种更吸引人的方法，通过它可以建构福利权理论；那就是契约方法。有充分的理由假设，理性的订约者只需要根据保险的理由，就会选择一种能够保证某种形式的福利的宪

^① D. Harris, *Justifying State Welfare* (Oxford: Blackwell, 1986), pp. 160 - 1.

法。这种福利条款不太可能以“幸福权”这种形式来表达：它们可以来自一个负责输送公共物品的会议。相对于从传统多数规则的程序中产生出来的福利形式来说，很有可能产生一种更“有效率的”的福利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间显然就没有什么差异，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主观选择的产品，而且会仅仅因此而具有价值。但这种被赋予的权利不是“自然”权利。

四

关于福利国家伦理学，内在地让人困惑的是，许多潜在的冲突性价值被同时用来证明基本福利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权利理论——尽管它从消极权利（反对政府的权利）扩展为积极权利（增加机会的权利）——仍然基本上是自由个人主义理论，因为它将福利判断（最终）转换成裁决性主张；根据其他福利哲学家，正是这种权利语言将人们分隔开来，并瓦解了那些让福利有意义的社群纽带。即使不谈如下让人尴尬的含义：以权利为基础的福利哲学可以证明物质财富的国际转移的有效性，它隐含的法律主义也似乎妨碍了利他主义、福利主义情感的增长。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福利国家伦理学现在将公民资格理论嫁接到权利观念之上。这既有某种实际的好处，就是将福利要求的适用范围只限于特定社群；也有某种理论的好处，就是根据个人的集体成员资格，而不是其选择能力来确定他们的身份，他们自己就是价值贮藏室。换句话说，社群让市场“文明化”。

然而,在福利的“社群主义”基础和“公民资格”基础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异。前者是特别模糊的概念。假定有一个价值决定集“捆绑”了不那样做就会离散的个人,那么这个假定不仅是高度争议性的,而且当它变成具体内容时,就对个体性有潜在的压制。这种捆绑现象可能是宗教性的或种族性的,而不是要将人们平等地视为一个共同企业的成员。社群主义似乎反对那种自由多元主义观念,认为拥有不同目的和目标的人们能够通过服从共同的规则而联结在一起。

作为福利基础的公民资格就不那么含糊:它只是认为资源要求法律和政治权利的扩展,它们是在自由民主的发展中出现的。T.H.马歇尔在对英国社会发展的演进式解释中专门论及公民资格的经济方面^①。他区分了三类公民资格:法律公民资格,包括那些传统的权利,如自由表达权利、财产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和人们所熟悉的公民自由权利等,它们大部分在19世纪早期得以确立;政治公民资格,覆盖了一个民主政体中的政治权利;最后是福利社会公民资格,它让人们拥有某种资源权利资格。公民资格的理由在于它能够将所有个人整合进一个社会:例如,如果存在从属于公民资格的经济权利,就会防止阶级冲突(马克思意义上)失去控制。尽管马歇尔决不反对市场,但他的确认为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破坏性。而且,可能大多数公民资格理论家都认为,这些类别不是自足的,而只有

^① T. H. Marshall,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在成为一个共同社会计划的组成部分时才有意义；因此，如果自由表达和法律平等的权利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保障，那么就必须要有所福利措施^①。的确，只有当经济福利措施被保证时，自由多元主义本身才是可能的。

公民资格以其相对主义立场，诉诸流行的标准和既定的生活方式作为权利来源，试图解决完全抽象的福利权理论的模糊性。如果个人被识别为抽象的理性主体，而且如果正是这个特征让他们拥有经济权利，那么，原则上确实没有什么原因可以解释：如果存在福利权的话，它们为什么不应该在所有理性主体中实现普遍化。然而，如果个人的身份是通过他们在特定社会秩序中的成员资格来识别的，那么该社会秩序本身就包含有伦理标准。如果缺乏这些“客观”标准，一个社会就充满大量冲突性的和无法解决的主观价值。为了回应需要不能构成福利基础这种主张，哈里斯写道：“需要得参照作为整体的社会中的现行标准来定义”^②。

人们会问：它们是什么？也许真的可以说，作为差不多永久性的经济剥夺的牺牲者，一个繁荣社群中的少数不是完全的“公民”，这与他们形式的和法律的资格无关，不过，这还是为可能大范围地改善他们的条件留下了空间。在由公民资格界定的需要与保健、教育、退休金等物品的集体供应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因

① D. King and J. Waldron, "Welfare and Citizenship",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 1988, pp. 162-87.

② D. Harris, *Justifying State Welfare*, op. cit., p. 51.

福 利

福利国家而出现的众所周知的不平等(见第六章)当然有利于一部分人,而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大多数当代公民资格理论家运用这个伦理来建立自由主义权利理论,问题因此而复杂了,尽管这个理论隐含着某种精确性和可裁断性。另外,类似于隐含在公民资格的法律和政治概念中的权利资格,那些隐含在福利变化中的权利资格不可能不是一种有争议的表达。而且,在这个表面上止痛的标准社会理论的树冠下,对福利权的扩张很少有什么理论上的限制。

尽管在公民资格理论中运用了自由主义语言,但它的核心之处有某种不自由的东西。参照“生活方式”建立人们伦理身份的尝试可能是一种排斥性的信条。由于身份标准显然不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性质,而是一种地方性质和特殊性质,所以它可以用来阻止外来者,最明显的运用是实施严格的移民规则。如果在法律上,公民资格概念包括福利权,那么这会很容易导致限制那些有权要求它们的人们的数量。在理论上,这是一个福利政策问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联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州提供的福利好处差别有时很大,这导致人们迁移到最繁荣的州,而且容易导致贫困居民的憎恨。公民资格理论特别麻烦,显然是因为它包含了昂贵的和潜在分裂的经济权利资格。

然而,公民资格理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福利问题:在大多数人的繁荣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个由(可能)永远被剥夺的人们组成的“底层阶级”。无论自由交易有什么福利强化特征,它确实伴随有不适应它所产生的社会类型的异化人群。这或许对那种较为有限的公民资格观点产生某种“反馈”

效果,这种公民资格只包括法律和政治权利,因为那些异化人群由于经济上被剥夺,所以或许不适应现代、抽象和匿名社会中的生活。

有个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福利本身(正如某些批评所坚持的)才是显见于英国和美国的一些社会群体的依附和缺乏自立的原因呢,还是“冰冷的”和非人格的市场关系不能产生更亲密的和简单的社会所显示的忠诚呢?公民资格理论试图通过广泛的福利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替代方案。然而,即使这是真实的,也决不能据此认为,现有的福利国家政策 and 制度是对它的回应。这些政策和制度常常是对选举竞争所带来的政治压力的回应,而不是对更高尚的社会团结伦理的回应。如果不解释政治体系如何将一个社会内在的道德价值转换成令人满意的政策,那么公民资格理论就不是完备的。总之,在这些价值的经济含义上是否存在足够的共识,以便证实它们所谓的“客观”地位,这是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第六章 正义、平等和福利

一

一些社会哲学家争论福利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压倒性目标。且不说很难为这个概念确定一个明确的含义,以及在它的测量方面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样一种主张:所有的价值形成一种等级而福利最大化命令位于该等级的顶端。有人正确地评论地说,古典功利主义隐含有极权主义因素,因为它让所有其它的道德考虑从属于福利最大化命令。由于在这个理论中,所有关于集体福利的判断依附于某种社会计算,其中替代性社会政策对个人的影响通过一位(或许)“理想的观察者”来比较,因此,这个理论和古典自由主义之间总是存在紧张关系,而后者在某些版本中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

自由主义思想中强烈反国家的福利传统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主张:任何不考虑个人欲望,而将好“状态”归于一个社会的判断是根本误解的。自由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通过他的观察提出

了这个观点：

不存在拥有某种好处的社会实体，能够为了自身的好处而忍受牺牲。只存在拥有自己个体生命的个体的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使用这些人中的一个，就是使用他，而给其他人带来利益^①。

这里对社会福利的禁止来自诺齐克的消极权利符咒，他视此为政府行动的强大的边界约束。据此可以认为，正义必须局限于那些交换型和校正型程序规则，它们保护个人权利和公正获得的财产。

然而，这并不是惟一的自由主义立场；的确，作为边界约束的权利缺乏任何牢固的哲学基础，从而限制了它的吸引力。而且，在道德评价中拒绝所有后果主义的考虑意味着它不仅容易受到这样的指责：它吩咐政府在“灾难”面前无所作为，而且它在理论上抬高一种“目标”，即权利保护，让它居于所有其它目标之上，就像功利主义抬高某种社会最大值一样。一种更合理的自由主义主张是，在一个复杂社会，有多种多样的价值，我们没有一个先验的原因将一个价值排列到其它所有价值之上。福利是这些价值中的一种，个人会要求公共机构来表达它，因为在大数目的背景下，会发生人们所熟悉的公共物品问题。不过，根据这种观点，仍然不是分配正义的要求批准了福利，而是那些规则和

^① R.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lackwell, 1974), p. 22.

程序为它转换了人们的主观选择。

然而,在当代政治思想中,正义几乎不可避免地福利捆在一起。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坚持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的“第一美德”,它应该(几乎)总是优先于善(它可以用福利语言来进行解释);二者之间当然不存在多元主义的交易^①。不过,罗尔斯的正义观念无疑是一种福利主义的概念,它特别关注资源分配的合法性和幸福水平。的确,尽管它运用了个人主义方法论,但它是一个标准理论,为社会假定了一个福利“功能”,它在实质上而非原则上不同于其它福利功能,如功利主义或帕雷托最优原则等。

罗尔斯的正义仍然更接近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接近集体主义正义理论,尤其不同于后者的“公民资格”和社群主义变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运用了契约论方法,其推理方式意在从抽象个人的理性选择中得出道德原则,这些个人在无知之幕后进行深思熟虑。他主张,一种资源分配是正义的,如果它满足最小受惠者的利益。不平等在以下程度上被允许:它们对于根据罗尔斯准则生产再分配剩余是必需的。个人不是他们自然财产(才能)的所有者,因为它们是自然任意分配的结果,因此个人对它们没有道德权利。这好像是说,从运用才能中产生的大量收入构成了非劳动所得的“租金”,因此可以对它进行抽税,直至产出受到影响,进而损害了最小受惠者^②。

①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1972).

② *Ibid.*, pp. 160-4.

罗尔斯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方案,试图解决处于自由主义福利论核心位置的产权问题,它的意思是,在自由经济中,“效率”标准其实与资源的初始分配无关。罗尔斯是一位沉默的平等主义者,他将分配伦理的运用范围从有形资产的所有权扩展到来自个人才能的收入。至少在表面上,这似乎将福利命令置于个人主义的正义要求之上。

尽管这一切都具有平等主义含义,但是它仍然不同于福利国家的伦理。一方面,罗尔斯的个人是普遍的主体,它的福利要求来自无知之幕后下的理性选择;他们不是特定社群的成员,没有来自共享之公民资格的福利权。罗尔斯的个人主义在这里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根除了社群主义福利论的所谓首要美德,也就是特殊主义社会纽带的存在将意义赋予了个体生命。罗尔斯的个人是抽象物,是没有血肉的普遍主体,只能通过他们理性选择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正义感的拥有来识别。据说,将个人置于可知的社群中,会给他们带来可能歪曲其判断的信息。这有一个棘手的、却合乎逻辑的含义,就是说,他的分配标准会原则上要求对最小受惠者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①。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被剥夺者的再分配会被社群主义福利理论家视为一种良心责任,而不是严格的正义义务。

罗尔斯与众不同的另一个重要之处是,他的正义论不关心关于客观需要的传统福利理论。他不企图深究他的一般性再分

^① G. Tullock, *The Economics of Wealth and Poverty* (Brighton: Wheatsheaf, 1985), ch. 1.

配规则,以确定常见于现代社会的典型需要^①,或者探讨它们的原因。“最小受惠者”是一个抽象类型,界定它的依据主要是收入水平,而不是某种客观的剥夺特征,如永久性残疾或特殊要求(教育、保健或退休金等)。不平等是允许的,如果它有利于最小受惠者,这种原则其实就是“安全第一”原则,不知道自身环境的理性个人会采用这个原则。

然而,从自由主义观点来看,这种策略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将这种可以无限扩展的需要类别合并入一个福利计划,会让它们受制于奇特的政治过程,并且无法保证在这些类别中针对个人的再分配会从中产生出来。一个罗尔斯式再分配规则——当用不那么普遍主义的术语来描述时——可以来自个人对于福利的主观偏好,这不同于他们在竞争性政党民主中投票时所表达的对于特定福利服务(如“免费”教育)的偏好。

二

在罗尔斯提出的推理类型中,有可能将一种福利元素并入正义论,而不违反自由原则(尽管罗尔斯关于个人不是他们自然才能的所有者这种说法与那种传统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如果社会规则是主观选择的产品——在罗尔斯假设的契约方法中肯定如此,那么可以理解的是,传统订约者会选择一种再分配社会

^① B. Barry, *The Liberal Theory of Justi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8.

政策。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会很好地刺激理性最大化者去选择一套规则,其中包括这样的规定:减轻他们自己未来可能的贫困,并根据保险原则为它融资。而且,如果利他主义情感是个人道德形象的突出特征,那么契约论方法能够以某种制度的或公共的形式再生产它^①。无论什么原因出现了一种可能的福利规则,都会存在相同的强制,即标准的法律和政治规则,这恰恰是因为它来自个人的选择,于是,福利和正义之间的距离将被拉近。

然而,有一种强有力的(纯粹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反对将正义和福利联系起来的准自由主义打算。归根到底,它来自反契约论的自由主义传统,该传统认为正义规则是在对某种差不多普遍性的人类条件的回应中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这些条件如稀缺性、人类脆弱性、有限的利他主义等。这是近年来由哈耶克发展出来的观点。反对将正义和福利吸收进来不只是一种功利主义观点,该观点认为收入的再分配(根据社会正义)产生了资源的不当配置,从而导致所有人(包括处境最差者)受苦,它也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观点,该观点涉及正义的含义以及从属于正义的道德责任的性质。

哈耶克反对这种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正义和不正义只能归因于人类主体在适用于每个人的公平规则之下进行的有意识的行动。既然社会不是一个“人”,因此说它

^① G. Brennan and J. Buchanan, *The Reason of Ru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正义地或不正义地行动是荒谬的^①。源于个人行动的收入分配不是任何个人的谋划,因此没有人能够为它负道德责任。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市场过程的结果是不能预测的,而且是非谋划的,所以它类似于天气;没有人能够声称,譬如说,英国的伊斯雷斯和西班牙之间的阳光分配是“不公平”的,显然因为它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自然事实。尽管哈耶克,当然不会声称,收入分配非常类似不可能改变的物理规则,但是,他会说它们在没有计划的意义上是“自然的”。尽管它们可以改变,但这些校正行动会带来不可预测的结果。

而且,人们熟悉的“应得(desert)”概念与收入分配无关,应得或功劳(merit)指的是收入接受者的道德性质。在市场体系中,所接受的收入是劳动服务的价值(通过边际生产率来测量)的功能,而接受者也许在努力方面显示很少。在复杂社会里,一个计划者根本无法“知道”什么是合适的收入分配,而且,没有什么道德价值等级能够证明对匿名市场颁布的非道德价值的背离是有效的。

政治权威对匿名交易过程的所有干预不仅在功利主义意义上是无效率的,而且也是任意的。它们依靠错误的假定,认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存在关于应得和需要的一般合约,其实这是不存在的。关于分配伦理的合约只可能存在于一个亲密的、“面对面”的社会,那里可能有一种共同的目标等级和一种超越了市场

^① F. A. von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6), ch. 7.

决定的金钱关系和价值尺度的团结意识。其实,哈耶克将应得符咒视为收入分配的市场外标准,因为向原始的、部落的伦理回归与发达社会的原理有很大的抵触^①;发达社会是个体的无目的集合,他们由共同的规则而非共享的价值联系在一起。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相当严格的道德没有排除某种版本的福利的前提条件。哈耶克承认,一些人因为他们劳动的低价值或零价值而不能赚到足够的收入,不得不接受市场外支付:其实,一个不受阻碍的市场体系会有更高的生产率,应该能让它成为一个相当小的问题。然而,这种类型的市场外支付不是正义之事。经济变化中的那些不幸的、但非故意的牺牲者对于那种支付没有一种权利资格,因为他们的痛苦不是任何人精心行动的结果。福利据说是一种慈善之事而不是正义之事,尽管这并不否认在某种环境下它是强制性的。

在对这个立场的一个有力批评中,雷蒙·普兰特^②认为,尽管市场过程的结果——正如哈耶克所说——是非故意的,但是它们是可以被预见的。而且,他声称正义的含义不仅是关于事情如何产生出来的问题,而且是关于我们如何回应它们的问题。因此,尽管没有什么关于程序正义或公平的规则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被打破,但是,如果该过程的结果产生一种收入分配,其中

① F. A. von Hayek, *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6), ch. 7.

② See R. Plant, "Needs, Agency, and Rights", in Charles G. Sempford and D. J. Galligan (eds), *Law, Rights and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Croom Helm, 1986); also, K. Hoover and R. Plant,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89).

有些人极度匮乏,那么它就是一种不正义的行动,而不仅仅是缺乏仁慈。而且,尽管社会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分配者”,但它有一个机构,也就是国家,它有道德责任来减轻可改变的痛苦。这里有争议的假定是:只有国家才能履行这种义务。

自由主义者肯定会强调这样的假定:经济事件的未来过程是不可知的,因此对它进行干预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测的后果。而且,精心注意市场分配过程的不利后果需要某种关于特定环境的知识,而一个中央机构无法拥有这种知识。尽管如此,甚至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来说,未来也不是完全不可知和不可预测的;譬如说,他们对租金控制的效果就很有信心。尽管这是一种政府干预,但肯定并非不可想象的是,通过类似的方式,私人经济变化的效果能够被预测,它们的损害可以被减轻。

不清楚的是,这个主张对于福利哲学和政策意味着什么。技术性发生的周期性短暂失业和品味变化在理论上是可以根据保险原则来处理的——它在理论上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工具,即使它被现代福利国家中家长制的强制要素所折中。如果所有可预测的市场过程的结果原则上都是可以保险的,那就很难将市场想象为这样一种机制:它导致了剥夺,并因而产生了一种集体福利责任。

然而,在缺乏令人满意的保险安排(它们曾令人满意过吗?)的情况下,关于正义要求什么水平的“补偿”,或许还存在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在经济剥夺可以预测的背景下,严格正义概念只应用于不可保险的情况。但是普兰特写道:“不清楚的是,不正义仅仅是关于某种特定结果如何产生出

来,还是关于我们对该结果所做的回应”^①。因而可以设想的是,由于没有人希望在丰裕之中出现贫穷补丁,所以存在一种与保险无关的严格的福利权利资格。不采取行动减轻经济剥夺在道德上相当于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

然而,一个正在成为过去的问题仍然值得问,一种福利问题起源环境的无关性是否会延伸至这样的情况:某人尽管很有可能为自己保险以应对不幸,但他故意没有那么做。这个问题其实是假设性的,因为当今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实行一种强制性保险。尽管如此,它还是为正义理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如果现在将济难提升为一种严格的责任,而不考虑它是如何产生的,那么正义就不只是讲述人们之间的互惠义务,而且是讲述一般性慈善问题。

即使我们承认正义概念可以应用于福利问题,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在收入分配伦理中获得一种操作性含义。由于交易体系的奇特过程以及有时惩罚性的效果,个人有权得到什么水平的、作为正义之物的市场外支付呢?它是一种生存保障呢,抑或如公民资格理论所意含的,是对社群繁荣的某种分享呢?可以假定是后者,但难以想象有什么标准能够保证正义需要所要求的那种合约。困难是,福利哲学家想将市场外支付建立在比慈善更具强制性的某种东西的基础上;而公民资格思想似乎太不明确,因此不能满足我们普遍的正义观念所意味着的那种严格性。

^① Hoover and Plant,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op. cit., p. 214.

三

福利的社会哲学非常关注平等本身：不是为社会和经济意义上必要的不平等提供正当性证明（是罗尔斯的一个主要关注），也不是识别和消除客观的需要，而是为了自身目的的平等主义。1931年 R. H. 托尼所说的“不平等宗教”，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魔力和咒语的不假思索的接受，是来自福利哲学家的一个常见的批评来源^①。然而，福利哲学家没有支持一种不妥协的平等主义，一种巴比尤夫（BABEUFIST）乌托邦，其中所有财富、收入和地位的差别都消失了，或者一种马克思主义无财产和无阶级的秩序，而是支持这样一种体系，其中，古典自由主义一向看重的那些法律和政治平等在经济世界中得到更大程度的反映，远比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所能反映的程度大得多。

尽管对市场的敌意一度让干预主义的福利哲学在当代思想中较少受到注意，平等仍然保持了强有力的价值。如果交易关系的参与者被总体的财富差异所分离，那么的确可以说交易关系的优点会受到严重损害。这些优点之一是扩张自由和选择的市場能力：它是允许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出现和繁荣的中性工具，而且，由于它的流动性、允许创新和变化的开放性以及内在的不可预测性，所以防止了某些群体主宰其他群体。然而，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市场的进入者在起步时就有某种没有

^① R. H. Tawney, *Equalit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1).

理由说明其正当性的优势,这种不平等会在游戏结果中反映出来。不可预测性的快乐将变成失望,市场不会扩大机会的范围,而是根据某种社会遗传学复制原初的不平等。

暂不管这种现象是否真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不能实现内在于交易关系中的理想,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这个看法与当代福利哲学有关,那么它标志着意识形态中的重大变化。因为从传统上看,这是从格林和霍布豪斯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提特莫斯的利他主义,正是那种竞争思想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福利哲学中有一个流行的主题,竞争关系必须是非合作的,它们的冷酷和对除个人效用之外的任何事情的不敏感破坏了友情,它们鼓励分裂而不是团结。市场原则过深地渗透进社会生活,毁坏了福利伦理本身。有点讽刺性的是,在某些福利哲学家那里,市场不仅应该因为它的效率,而且因为它在特殊环境下对平等和自由的贡献而受到赞扬:普兰特的著作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

市场的平等主义方面总是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赞赏。完全竞争的市场其实是非常平等主义的:每个生产要素都被按照其边际产品而得到支付,不存在“浪费的”利润,而且整个体系适于满足理性个人的非强制的欲求。甚至在真实世界里,而不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文本中,那里存在(在某些解释中,肯定是)不完美性和利润剩余,我们也可以合理地假定,竞争状态比消除竞争的状态更为有效:凯恩斯所说的资本主义“动物精神”可以视为一个理想目标的不知不觉的推动者(正如亚当·斯密最初所说的)。换言之,那些相信平等的人应该建议(提特莫斯后尘)市场原则更多地渗入到社会生活中去。

福 利

人们有时知道,国家是促进社会平等的不可靠的工具。英国的福利国家是以一种偶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有许多冲突性的道德目标,它的活动的正当性已经被同样多样化的各套原则所证明。更重要的是,它还鼓励了复杂的既得利益的增长,各个都有动机利用福利国家的规定为所说的群体谋利,而不是促进社会福利(无论如何界定)的总体目标。这远不是鼓励一种利他主义精神,有证据显示,福利服务的集体供给的增长为古老的经济人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这里最重要的是行为调适现象:也就是个人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有资格得到福利好处的能力。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的起草者所诊断的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在20世纪又死灰复燃,而且具有了新的活力(或许从来就没有熄灭过)。

具有讽刺性的是,正是平等主义思想家,尤其是朱利安·格兰德,一直最不遗余力地讲述一种似乎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倾向,它们发生在国家供给的福利服务的消费中。或许不会让人惊讶的是,自从格兰德使用了经济学家的方法来解释这种令人烦恼的现象之后,社会福利哲学被经济学渗透,而恰好与此平行的是,社会生活被饱受福利哲学家批评的市场渗透。

在他的《平等战略》^①中,格兰德讨论了平等主义传统的要求(不仅仅以托尼为例,更重要的是以C.A.R.克劳斯拉为例),认为平等的获得不是通过传统社会主义的公共所有权方法,也不是在基础层次上打破特权(即产权分配),而是共同消费福利

^① J. Le Grand, *The Strategy of Equality* (London: Alen and Unwin, 1982).

服务——不是服从价格和与选择性联系在一起的低贱的财产调查(means - testing)。格兰德运用一种消费比,分子是在收入和职业意义上处在最高层的五分之一人口,分母是最低层的五分之一人口,结果发现了某种惊人的不平等:在保健方面,不平等比率为1.4,在16周岁以上的小孩接受中学教育方面为1.8,在非大学教育方面为3.5,在公汽补助方面为3.7,在大学教育方面为5.4,在对所有者/占有者的税收补助方面为6.8,而在铁路补助方面,则为惊人的9.8。

正如格兰德所说明的,公共服务平等供给所有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会被平等地消费:这将依附于整个范围内的因素,它们因人而异。正如他所说,几乎有一个一般性原则在起作用:“包含补助的政策有利于境况较好者,如果这种补助的分配依附于人们消费该物品或使用该服务的决策”^①。因此,尽管保健平等地以零价格供给所有的人,但是它可能更多地被中产阶级个人所消费,因为“机会成本”(他们为了消费而不得不放弃的东西)对于他们比对于工人阶级病人要低得多;例如,当他们走进一个大夫的手术室时,他们不会因为被丢掉的工作而失去钱。补助很重的高等教育体系是臭名昭著的大量不平等的生产者,在住房上的“税收开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是大量无效率和不平等的源泉。格兰德得出结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在有关服务方面没有公共开支,可能会有更多的平等——这是对市场的平等化倾向的一种含蓄承认。

^① *Ibid.*, p.46.

古典自由主义者无疑会主张,这种情况本来就可以根据某种前提而预见到,它意味着某种沉闷的,却是重要的结论。其中一个结论可能是,某种行为特征差不多是普遍性的,因此预期人们会因集体制度和政策的存在而“道德化”某个乌托邦想法。格兰德同意那么多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以致人们疑惑他们为什么还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的答案或许是,平等目标只有通过对社会中不平等的基本源泉进行攻击才能达到,这种来源就是根本层次上的资源和机会分配。

尽管国家福利服务会带来明显的低效率和不平等,它们在社会福利流派中仍然有其捍卫者。有一种主张认为,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参与,最穷者的境况会更糟。显然,正是稳定的中产阶级政治压力(“尖肘(sharp elbow)”)才维持了公共开支,穷人因此得利,近乎偶然。这好象是相当奇怪地运用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个论题,就是说,个人在自利动机的刺激下,无意地带来了经济活动的协调,每个人都从中受益。正是境况较好者对教育、健康等物品的自私消费,才确保了有利于穷人的福利国家的生存。对于福利制度会敲打出我们的利他主义资源这种主张来说,上述观点无疑具有破坏性的含义,除此之外,该理论可能是错误的。最有可能的是,或许不存在没有中产阶级参与的福利国家,而且,经验事实说明,中产阶级运用他们的“尖肘”来保护他们从中受益的服务。格兰德和古丁声称,在缩减政府开支的时期,正是那些很少有中产阶级用户的活动受到最不

利的影响^①。

这是一种从富人和穷人流向中间收入群体的福利再分配现象,它或许是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中一般性政治行为规则的一个特殊案例:穷人只是没有足够的数量,不能在选举竞争中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讽刺性的是,富人和穷人的自利决定了他们应该组成一个联盟,以防止这种不利的再分配,但由于许多原因,包括无知,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而且不可能发生。令人困惑的是,总体上,现金再分配(技术上最有效率的平等主义类型)的确在竞争性政党民主中继续着,几乎藐视中间收入群体的私利,这肯定是因为剩余的利他主义情感在起作用。

总而言之,在再分配问题上,宪法的和政治的考虑至关重要。如果存在一种利他主义情感让福利国家的某些活动有效化,那么现有的政治制度在它的传递方面是无效的。因而,可能不仅存在市场失败,也存在政治失败。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某些社会哲学家建议福利以现金形式输送,并对它实行严格的宪法保护,使之免受“政治”无常的伤害。然而,福利需求和现存民主制度之间潜在的和实际的紧张关系在关于福利的社会哲学中已经得到足够的认识。

^① R. Goodin and J. Le Grand, *Not Only the Poor*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7), ch. 4. 在本书中,古丁和格兰德用了具启发性的短语“有利的卷入(beneficial involvement)”来描述中产阶级和福利国家的关系。

四

仍然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平等价值应该具有它传统上在福利哲学中具有的意义？所有社会似乎都展示了很常见的非平等主义特征，它们对通过政治方法进行的重大校正似乎显得差不多无动于衷，只有在个人自由方面有灾难性损失时，他们才可以改变。事实或许是，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平等主义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不那么有效，因为它们伴随有经济不平等。也许财富可以“购买”政治权力，而藐视自由体系中的仅仅形式上平等的规则。然而，平等主义社会工程的结果已经被平等主义社会科学家自己证明为令人失望的。

反平等主义的福利主张利用了这样一种差别：一是改善最差者绝对福利，二是改变个人在收入尺度上的相对地位。福利哲学的道德命令应该指向前者，而不是后者（即使平等主义事实上是可能的）。这的确是名义上平等主义的社会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意思。

然而，更复杂的平等主义福利理论家主张，仍然存在一种通过平等主义措施来促进福利的道德义务，这不会对经济产出带来让境况较差者受苦的不利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行动就会是默许某种水平的经济不平等，它本身就对社会其余部分有负面的或福利缩减的效果。当然，有一种可能是征收财富税，尽管如下的观念是一种幻想：在不被迫将这种征税范围扩展至那些不被认为特别富有的社群成员身上，仍可从中得到足够高的

收入。

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主张认为“租金收入”可以被征走,而不会带来效率损失。从历史上看,最熟悉的例子是土地所有权。由于土地差不多是固定的供给,而且很少有其它的用处,所以,一个经济中的收入增长的一部分被地主抽走,而且他们没有提供生产性的活动。同样的原则还可以扩展至职业,尽管合理性小得多。如果一个人来自目前职业的收入是每周 1000 英镑,而且来自下一个最好职业(这个人不会很喜欢,我们假定)的收入是每周 400 英镑,在不影响工作动力的情况下,不能将这种差额征走吗?然而,如果存在一个自由的国际劳动市场,那么这种征税会导致工人的大批离去,从而给该社群带来效率(也就是福利)损失。

伦理学中有个传统,罗尔斯的信条跟它有点类似,它将来自自然才能的收入看作某种形式的租金,即“不应得之物”,因而适于没有成本的再分配。然而,该理论是高度假设性的,而且在可操作的福利政策建构中的价值还难以确定。尽管来自土地所有权的租金收入,大约占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 12%,是更合理的税收来源,但平等主义哲学家很少研究它。

第七章 福利、福利国家和政治

一

西方社会中的当代论争几乎总是关于福利国家问题,而福利哲学中的危机据说是基本福利政策和制度在前二十年所经历的困难之后果。1970年代经济增长的放缓让人们的注意力转到福利国家,显然因为其创立者曾假设,混合经济会产生高水平的国民收入,足以从资金上支持其正当性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服务。而且,尽管有效率观点允许一些国家供给的福利服务,但福利哲学的首要目标是再分配性质的:教育、保健、失业保险等物品的共同供给本身既是实现平等,又是减轻剥夺的一种机制。总之,有一种更难捉摸的、更有争议性的主张,认为福利国家机制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公民资格,以软化和文明化那些贪婪的和无牵挂的态度,它们被视为市场社会中人类行为的决定性特征。

这种将福利理论转化成福利国家哲学的做法是一种知识上的错误,并有严重的实践后果。理论上的错误是在社会哲学的

建构中,其实忽视了市场体系的那些福利强化特征,它们是早期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所强调的。而且,那些早期论述福利问题的作家主要是 19 世纪的功利主义者和自由放任理论家,他们怀疑政府有能力在促进福利的同时不会造成没有预计的和不受欢迎的副作用,譬如说,由广泛的国家福利所产生的对依附的鼓励。这后一种主张依附于这样的假定:有一些多少是普遍性的关于人类条件的真实特征,它们被国家福利理论家悬置了或忽视了。

将福利转化成国家福利所带来的严重实践后果是福利国家似乎无情的扩张。有整理得很好的证据表明,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福利国家起初是一个旨在保护脆弱者免受市场力量的随机效果侵害的体系,而现在已经转变为一个综合性社会安排体系,它与干预主义的原初目标只有偶然的联系。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福利国家的理论家没能适当地考虑输送福利物品所需要的制度:例如,不能保证一个民主政体中竞争性的政党过程会与福利国家理论的道德命令相一致。在将社群中存在的无论什么利他主义情感转换成积极政策方面,多数规则的程序是否有效率?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二

然而,将福利概念转化成福利国家的制度和政策也带来了知识上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其理论成份。因此,它不再仅仅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是一种对那些有关问题之解决的事实进行

选择和评估的经验探讨,而是一门包含了范式本身的基本变化的学问。尽管总是有少数社会理论家挑战社会国家的基础,喜欢限制福利概念的运用,只用它来描述在市场交易中实现的个人福利经验,或者发生在国家领域之外的任何其它形式的自愿行动,但是,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某种福利国家的必要性方面,存在某种共识——这种共识的理由明显在于这样一种主张:存在真正的集体福利目标,它不能通过自愿行动来满足。这个共识涵盖了许多具有非常不同的理论视角的理论家,其范围从自由个人主义者延伸到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前者声称国家福利是一种公共物品(它的供给满足了主观性的个人欲望),后者声称集体供给是社会正义的必要特征。

关于对福利国家的当代攻击,重要的是,尽管其声音最大的和最擅表达的倡导者来自知识和政治光谱中的“右边”,但它多被引导到反对传统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药方(下面将被考虑的一个例子是“负所得税”)上面,就像它曾经反对更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意识形态一样。另一个复杂情况是,福利和福利国家概念是如此的变化不定,以致难以搞清当代争论中所具体批评的究竟是什么。是福利思想本身,是那种认为通过国家来进行的某种资源分配原则上被道德理论允许的理论本身引起反对吗?或者是构成福利国家的过繁、过多的制度或政策因为无效率或不平等而受到指责吗?

而且,该问题被这样的事实搞复杂了:福利国家批评背后的原则多种多样,还有点不成熟,而且总是具有争议性。这最后一个特征最显著地表现在这样一个主张中:由于福利国家包含了

强制,所以它的存在必然减少自由。然而,这种主张依附于自由意味着没有强制这个判断的真实性。然而,福利思想的整个传统则声称,导致个人以某种方式行动的社会和经济剥夺本身是自由减少的因素。于是,关于福利的争论很快转化成对自由的争论,当诉诸其它的原则,譬如说权利、平等和正义时,相同的过程似乎又出现了。不过,尽管福利国家的当代批评在任何终极意义上是包容性的,但是它们至少指向了一些重要的理论主题,而且阐明了福利概念中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限于自由个人主义者对福利国家本身的批评。

关于福利国家的几乎所有讨论最终都是功利主义类型。这个概念本身明确关涉幸福以及可以带来这种那种“满足”的各种工具。确有一些观点认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根本不关涉幸福,而是关涉那些应该驾驭政府行动的限制,由于这些限制的存在,国家的福利强化行动被排除了。这方面最著名的当代例子是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其中“守夜人国家”预先从任何福利活动中排除了。

尽管诺齐克所使用的术语(即绝对的和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符咒)让他置身于当代福利论争之外,但是他严格的个人主义和反国家主义提醒社会理论家,许多福利目标可以在正式的政府设施之外得以满足。他的政治理论不是建立在市场与国家的相当过时的区别上面,而是建立在自由和强制的区别上面。这留下了一种理论可能性,即价格机制外的自愿活动能够至少解决当今某些福利问题。因此,《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最重要

部分实际上也许是最后一部分,即“一个乌托邦框架”^①,其中,有限国家的首要优点据说在于允许个人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集体主义者对传统福利国家结构表示不满的情况下,重要的是要强调,可能有其它的制度安排用来公共表达非自私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所有福利政策的基础。

三

对福利转化成国家福利的批评来自更为平凡的考虑,而不是来自自然权利理论的抽象道德主义。西方民主国家战后福利国家的经验已经让人怀疑:委托集体机构输送被称作基本福利服务如保健、保险、教育、住房等物品在伦理上是可欲的,以及这种方法是有效能的。这些服务的似乎无情的扩张,以及他们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的增长,已经导致了来自政治光谱中左派和右派的严重批评,意味着该体系的基础正在动摇。从政治理论的视角来看,重要的是,关于国家福利的主张决不是新颖的,而是既植根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历史,又植根于历史上曾证明它们有效性的原则。

困难主要来自福利国家理论自身的核心部分的混乱——这种混乱发生在两种观念之间,一种是针对那些在市场社会中能力不济者提供最低水平幸福的国家作用观念,另一种是想象集体机构最适于满足潜在无限的人类需要的观念。因此,福利问

^① R.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lackwell, 1974).

题只是政治理论中人们最熟悉的问题的一个变种,是国家日程表中的合法内容。福利国家从最小主义国家扩展成最大主义国家,以特别显著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何种意义上,教育和保健等物品的共同供给强化了福利国家哲学家所理解的福利?福利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公共经济学家所说的“搅乳”过程^①,由税收支持的服务又以集体的,并常常是强制性的服务形式(如失业保险)“回归”公民。而这样做的理由还不是很清楚。从严格的帕雷托立场来看,对福利国家的效率要求似乎很难有吸引力,因为福利国家许多内容的强制性意味着个人选择被压制;因此该体系的实际结构没有反映人们的偏好。只有交易体系的某种特征妨碍了这些选择被记录,可以说,国家理论上可以做出类似的效率改进。

在保健领域,可能是如此,那里的私人保险体系会对某种不可欲的现象负责^②。最常见的抱怨是,它会导致保健的过度供给。交了保险费的人愿意要求“过度”的服务,因为它们的边际成本为零;当然,医生也同样乐意供给它。于是,保健成本因此而增加,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环境,其中,病人的境况会因为由此而来的保险费增高而变得更坏。如果我们再加上资源成本(它产生于过度诉讼)——它无疑受到基于保险的医疗的鼓励,那么就可以为基于效率的国家干预提供一个很强的案例。当考

① G. Tullock, *The Economics of Wealth and Poverty*, op. cit., ch. 3.

② 对这种众所周知的观点的批评, see D. Green, *The New Right*, op. cit., ch. 7.

福 利

虑到“不可保险”者,即任意的自然力的牺牲品时,该主张就变得更有力。不能考虑这种现象的任何效率标准都会有贫乏的福利要求,无论它源自个人选择的纯粹性如何。

然而,即使这一点——福利转化成国家福利的最合理案例——也决不是不可争议的。将保健并入强制性体系只是将与私人选择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转变为公共选择问题^①。似乎有这样一种情况,在保健方面,相对于作为消费者准备支付的数量来说,作为选民的个人常常选择较少量的开支。这主要是因为这样一种现象:对于每个选民来说,短期内较低的税收比长期的昂贵保健更有吸引力。这里的问题是,尽管一方面,赋予保健以“权利”的福利哲学至少在道德上允许对服务此目的的社群资源的几乎无限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投票最大化过程可能同样无情地导致一种欠供给。的确,从一个纯粹的主观主义立场来看,有可能“知道”一个最优的保健供给是什么吗?

而且,如果将福利转化成福利国家的理由被社会正义要求所允许,那么,民主体系本身是实现福利国家的不可靠机制,即使社会正义是一个合法的政治目标(其本身是一个高度争议性的命题)。我们已经看到,对英国福利服务输送的经验考察显示,福利供给产生了一种偏向中间收入群的再分配,而且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它是民主社会的普遍特征^②。其实,根据政治经济

① J. Buchanan, *The Inconsistencies of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65).

② R. Goodin and J. Le Grand, *Not Only the Poor*, op. cit., ch. 9.

学一个更普遍的“定理”，即“指导者法则”，这种现象是可以预测到的^①。最简单地说，这个法则认为，由于在发达的西方民主中，可能大多数选民既不（相对地）富也不穷，所发生的任何再分配都可能有利于他们。这听起来尽管有点奇怪，但是，可以逆转它的惟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富人和穷人结成选举联盟——我们前面指出过，这最不可能发生（参见第六章）。

对福利转化为福利国家的最具决定性的反对或许被发现是对福利问题的存在进行因果解释的问题。尽管福利国家在济贫法中曾表现出了不成熟的结构，它的理由还是依附于这样一个假定：自愿安排，不管是保险市场体系，还是慈善，是不够的。尽管国家福利的早期批评指出，国家福利存在本身可能会产生它旨在解决的问题，但是直到 20 世纪中叶，综合性的福利国家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建立之后，这才成为一个严重的知识问题。

然而，最近几年，围绕这个问题已经展开争论。认为国家福利有反生产性效果的观点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它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很清楚。有一个人们熟悉的观点来自悲观的个人主义人性假定，它认为如果福利以零或接近零的价格供给，那么就会产生需求增长，就像一个标准的经济物品那样；另一个观点认为，意图良好的福利政策会帮助一个群体，而无意识地伤害另一个群体（人们熟悉的例子有租金控制，它通过冻结可租房的供给，产生了无家可归者；还有最低工资立法，它让失业的潜在工

^① See N. P. Barry,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Public Policy", *Il Politico*, XXI (1988), pp. 121 - 37.

人的边际生产率低于所颁布的最低工资。)一个更具伦理性的主张认为,超额福利产生了一种依附型文化,它很不利于培养好公民。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既指向专门是非经济的国家福利理论,它基于扩展的公民资格和多样化的社会正义,又指向纯粹自由主义的福利理论,它根据准技术性的公共物品理由证明减轻剥夺的正当性。

四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渗透整个福利国家体系的理论问题还很少谈及,这个问题与美国约翰逊总统当局所提出的“伟大社会”有关,此后的充分分析和激烈辩论引发了重要的理论问题。“伟大社会”是大规模的福利干预计划,成就于 1970 年代。它为许多福利国家的批评提供了很好的测试案例。它每年耗费约 2 000 亿美元,通过在联邦和州层次上的各种制度安排,输送了 44 个大的项目,包括向约 5 000 万人提供医疗补助、AFDC(对有依附性小孩的家庭补助)和食品补助等。应该强调的是,这些项目的设计者不是真地希望建立一个“福利社会”,其中个人通过社群纽带(它是公共福利正当性的共同理由)永远与集体安排联结在一起,而是将这些措施视为实现传统美国意义上的个人自主而提供的临时的、却是必要的援助。它是一种“支持(hand-up)”,而不是一种“礼物(hand-out)”,并且承认福利和福利国家之间的区别。

所有这一切的理由意含着这样一种主张:资本主义是剥夺

的原因——在美国,1950年前,也就是在综合性福利项目实施之前,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这种情况下,它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定。而且,某些身份群体,特别是少数族群,被认为特别受到这种因果过程的伤害。因此,为了在传统的美国制度和价值背景下改善他们的地位,就需要有整体性的法律和制度安排。

观察家们中间存在某种共识,认为该体系没有实现它的目标。尽管贫困者数目减少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更多的人实现了个人自主,因为更多的人开始依附新的福利项目。查尔斯·莫雷在—项有影响的研究中^①,对贫困人群进行了区分,一是“贫困中的人群(people in poverty)”,这是对那些生活在专门的幸福标准线以下的人群进行的直接测量,二是“潜在贫困的人群(people in patent poverty)”,指的是如果没有国家福利的存在就会处于剥夺状态的个人。他报告说,1950至1965年之间,潜在贫困者数量从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下降为18%。然而,当伟大社会计划开始产生效果时,这个数字开始上升:潜在贫困者从1972年的19%,上升到1976年的21%,并于1980年达到22%。关于被剥夺的少数,尤其是黑人,也有类似的痛苦数字被报道,他们也是最低工资法的偶然牺牲品。莫雷还专门将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与未婚母亲享受新利益的合法性上升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大规模“道德风险”的证据。

^① 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尽管对于这些数字存在某种争议,但是,大多数评论家认为,伟大社会计划至少没有减少福利数目;的确,类似现象可见于其它西方民主国家,包括英国。不考虑统计上的论点,整个主题包括了福利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它以奇怪的方式明确提出了主导 1930 年代福利论争的那些原则:社会归因、依附、权利、正义、个人和社会责任等等。

在某些哲学中,关于福利的反生产效果是(逻辑上)不相关的。如果其主张是个人有一种福利权——在针对社群的可实施要求的严格意义上,等同于一种忍耐权(right to forbearance),它在福利权持有者方面不要求特定的行动——被福利“吸引”的个人只是要求他们有权得到的东西。然而,如果福利理论家想将这种“权利”扩展至碰巧由集体供给的所有服务,那是值得怀疑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对福利的接受设置条件(至少在某种供给水平之上),该条件意在防止那种不要求接受者承担社会义务的福利可能无限地扩张。

其实,莫雷的指责最中肯地针对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福利理论。尽管所有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家都清楚国家福利的反生产效果(的确,他们提出了大部分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们的理论让他与权利理论家一样脆弱。自由个人主义者,譬如说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相信人类价值的多元主义和最终的主观性:不存在生活的“正确方式”,或应该加于人们之上的原则等级。的确,那只是针对一种再分配的反对意见,这种再分配来自所谓客观的应得和需要价值。因此,一种依附型文化和福利伦理的出现,严格说来,不是他们反对扩张的福利国家的来源。某种福利的

理由毕竟在于它事实上既提高了接受者的效用,也提高了捐献者(通常是纳税者)的效用。负所得税受到古典自由主义者欢迎,显然是因为它是一种不与任何“可欲”式消费相联的收入补助,如果把它与退休金、保健、住房之类的东西联系起来,则会将一种特定的物品观念施加到个人身上。

正如莫雷所报告的,美国实施了负所得税实验,产生了最糟糕的结果,如缺乏工作、婚姻破裂等等。但这只是对公民很少施加或不施加社会义务的福利体系的一种极端情况。其实,对负所得税的早期批评^①认为,它在效果上会产生一种新的“斯宾汉兰体系”,因为它对现金支付的承诺是可能会调整的,这背离了任何道德主义的“应得”观念,事实证明它对个人会是极大的诱惑。设计了 1834 年济贫法修正案的功利主义者提出了粗糙的“较低资格”的要求,并进行“济贫院实验”,说明自己比他们的自由意志主义继承者更加现实,然而,他们解决福利问题的方法不对现代思想的胃口。

莫雷讨论了 1970 年代发生在美国的福利“支持”的增长,这是对早期这种争论的明确回应。他主要的论点是,重要的不是福利好处的实际价值(其实,在整个 1970 年代,它们的真实价值一直在下降),而是人们能够有资格得到它们的那种舒适。尽管资格要求方面的部分削减尤其与美国经验有关(如最高法院裁决打击了关于福利的州居民规则,允许付款给与男人同居的非

^① W. Hutt, *Economists and the Public*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8).

婚姻母亲),该主张主要针对所有福利计划的一般性特征,也就是当它们以现金形式支付时,就会诱惑高“支持”。莫雷的另一个主张认为,伟大社会改革是基于人性的错误分析,明显模仿了1830年代得到公开支持的命题。他坚持认为当代讨论福利的社会理论家忽略或忽视了人性的三个基本命题:他们对激励因素和抑制因素做出回应;他们不是天生勤奋或有道德的;而且,如果社会起作用,那么个人必须对它们的行动负责^①。

因此,尽管莫雷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元素,即在福利问题的紧急状态中,相对于市场来说,国家是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果主体,但是他削弱了那种针对任何问题的特定自由主义方案——不受道德问题阻碍的现金支付。当然,他对负所得税的支持者总是持开放态度,只是坚持现金支付太高了,并且认为如果收入补贴大大降低,工作吸引力就会更大。但是,它应该降多低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呢?而且,投票体系会分裂个人主义社会哲学家的“理性计划”吗?

莫雷和反对将福利转化为国家福利问题的其它批评者的论点是,该问题其实不是金钱问题,或者只在部分程度上是金钱问题,而更多的与较为传统的自尊观念和个人自主观念有关。因此,尽管市场体系可以通过在高失业期间缩小选择范围,从而在自主意义上减少一个人的自由,但是,国家体系能够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的解决方案——尽管他承认它在政治上是不实际的——会是大大降低国家福利水平,因为他宣称正是国家福利

^① Murray, *Losing Ground*, p. 146.

产生了“剥夺循环”，并且产生了大体是永久性的底层阶级。然而，他差不多仍然留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因而他对福利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小政府，而不是反复灌输理想价值；据说，这些价值在没有福利的情况下会自动地出现。

这与对福利问题的所谓保守主义的回应有些微妙的不同，因为它根本不拒绝基于个人主义理由的国家干预情况，但实际上拒绝了自由主义本身的“价值中立”。正是在这个主张中，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民资格理论有了一个思想交汇。它们都坚持认为公民资格理念赋予个人对社群资源的一种要求权，但是它必须伴随有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个人不是由关于公共行为规则和现金纽带联系起来的无名主体，而是特定社群中有身份的成员，其身份是根据社会权利和责任的复杂网络来界定的。

因此，劳伦斯·米德^①反对美国的福利体系，不是针对它的规模，而是针对这样的事实：它的好处是作为权利资格分配的，不要求获利一方承担责任。其实，他专门将美国的“洛克”式自由主义传统连同它对国民德性的冷漠分离出来，视作那种疾病的原因。小政府和大量削减福利的洛克式药方很不够，因为“作为权利资格的福利”伦理已渗透进美国社会，使得大量人口不能以人们所预料的个人主义方式回应。讽刺性的是，所需要的是更强有力的、也许更大的国家，以实施与福利接受者有关的社会性的工作义务，以及要求更少的自由。米德用图表来说明他的

^① L. Mead, *Beyond Entitl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观点,并声称“工作必须被看成社会义务,类似于交纳税收和遵守法律”^①。在 20 世纪,不考虑其成本的工作福利成为 19 世纪资格调查的替代物。

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那些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如罗尔斯来说,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凉意,他们希望机会的获得是平等的,同时不放弃多元主义思想,认为国家应该中立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们所表达的行为原则必然是从一个连贯的公民资格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这些考虑也说明来自公民资格的福利理论在知识上起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变体,即“社会自由主义”,最先从哲学上表达它的是 T.H. 格林和 L.T. 霍布豪斯,它们当然不会将福利权视为不包含相关社会义务的权利资格。因此,尽管这些作者,特别是格林,试图重新定义自由,以致它与通过国家的再分配和联结社会义务不一致,但是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和混乱的语言策略。大范围的福利制度和政策的存在与消极自由和多元主义不协调。

为了强化福利和自由主题的这种不协调,甚至有可能从典型帕雷托式福利国家证明的至少一个变体中为同样(传统意义上)非自由的福利供给建立正当性证明。我们记得,针对被剥夺者的帕雷托再分配理由依附并非不合理的假定:捐献者得到来自减轻痛苦的满足,也就是效用收获不仅仅送给了获利者。正是人们熟悉的公共物品问题阻碍了通过自愿(慈善)方法达到一个最优状态。然而,可以肯定合理地假设,根据完全主观主义的

^① *Ibid.*, p. 82.

理由,捐献者的效用部分是福利输送形式的功能^①。他们也许恰恰认为自己受到负所得税中所含有的现金支付的不利影响,这种支付与任何具体形式的开支不相干。他们也许要求福利开支以住房、教育、退休金等形式存在。同样,他们委屈的是,他们的转移支付被个人消费,却不负担,譬如说,米德式公民资格所要求的那种具体的社会义务。

负所得税的最擅于表达的支持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它应该与特定形式的“可欲”消费联系起来,或者伴随有社会义务,这个观点是给他本人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绝对反家长制的自由主义的一个礼物。对于当代作者所界定的福利问题来说,这个观点不是一个真正的贡献,而这些作者中,有些并非不同情他所支持的更一般性的政治主张。现在所争论的关于穷人的问题不只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而是包括了自我实现、公民资格和由什么导致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等复杂的问题。得到承认的是,“底层阶级”——在增长的繁荣中被剥夺而且受产生它的社会规则和道德排斥的少数个人——的出现涉及到复杂的因果问题。它既不能通过不断扩大国家供给的服务范围来解决,也不能通过天真的和表面上“自由的”现金分配妙方来解决。

五

很明显,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个人幸福意义上的福利(或

^① H. Hochman and J. Rogers, "Pareto Optimal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1969, pp. 542 - 57.

者在更具争议性的社会福利意义上)不一定会通过过分依附国家而得到加强。这不是一个政治判断,而是一个理论判断,针对的是福利陈述的意义,以及它要被促进便理当获得的条件。因为个人的福利不单靠增加收入的方式来促进:它也是个人尊严和个人自主等方面的功能。在评论任何类型的会产生依附和反工作伦理的干预措施时,福利国家批评者的大脑中都有非经济的价值标准。正是福利的必然主观性让什么是幸福改进这个问题变得如此的难以解决。

而且,假如在基本福利目标、济贫、教育、住房、退休金等方面存在冲突性需求,又假如缺乏任何客观原则或原则等级来对这些需求进行排序,那么将福利转化为福利国家就会让某一套项目强行排在其它项目之前。不管这种做法来自仁慈的独裁者的意愿(这是19世纪功利主义的意思,可见于爱德文·查德威克的福利哲学中),或来自可能任意的民主政治过程,而对于主观主义问题来说,它都是非物质性的。因此,尽管一度存在一种超越党派感情的共识,认为济贫是福利政策的首要目标,但国家向其它领域继续扩张,并且与济贫很少相关,带来了针对公共权威的更有竞争性的主张。

国家福利问题的主要方面不只是在什么应该成为优先项目上面缺乏共识,而且在两种分立的证明原则上面存在进一步的混乱。这些是保险原则和福利原则本身。前者其实是市场原则,当然不属于福利政策的原始理由,即减轻可以避免的痛苦。然而,在重要的领域,经济社会的保险功能大量地被国家接管。这样,许多批评家认为它忽视了自己的福利作用,即济贫。不难

看出,对于 20 世纪福利理念的设计师来说,保险原则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将权利资格思想运用到利益接受方面,消除了与福利有关的任何耻辱痕迹,而且在理论上对国家开支的可能无限扩张的过程提供了一种经济制约。因此,国家保险计划与自由哲学就不是特别地不一致。当然,基本国家保险计划,如失业、保健和退休金等是强制性的,但是,甚至明显非自由的政策也总是有似乎合理的证明,即那些有高时间偏好的个人不能保证自己能够对付生活的变化无常,因此,他们肯定提供了一种福利问题。

这个问题肯定是市场与国家“竞争”的极好例子,因为不能假定的一个先验前提:私人保险是所有福利问题的普遍解决方案,如美国医疗案例所示,本章前面也引用过它。然而,从历史上看,福利供给的“保险”要素中不缺乏同样的政治问题,它们围绕着人们更熟悉的福利国家制度。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中,保险要素都很快成为一种虚构故事,而那些服务便成为税收支持项目,以满足所有的意图和目的。因此,不是这些利益的接受者接受他们有权获得的东西,而是在经济的或保险计算的意义上,他们成为再分配税收的受益人。然而,在福利意义上,它是一种无效率的再分配形式,因为它不一定针对那些被剥夺的人,而是针对那些碰巧处于国家化保险体系之中的人。由于这个原因和其它的原因,综合式国家福利不可能随着增长的繁荣而“消失”——其实这是许多福利国家奠基者共有的一个梦想,因为需要它的个人变得依附于它,其方式没有反映米德和莫雷所认可的那些道德关注。他们变得有权得到好处,即使他们的贡献在

严格经济学意义上不能支持这种好处。

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最奇异的例子是由国家供给养老金。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最先指出国家养老金具有依附强化效果,而他决不是自由放任政策的狂热支持者。他于1905年写道,“普遍性的养老金…没有包含…它们自身消失的种子。我担心,如果它们一旦启动,就会永不消失”^①。然而,随着20世纪的发展,情况更恶化了,因为出现了与工资挂钩的和非基金支持的退休金计划,现在,它们给当代自由民主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伦理问题,这些国家主要是美国、西德,也有英国——尽管在较小的程度上^②。它们的存在成为福利理论中两种相互关联和相互矛盾的最好例子:一种是保险和福利之间的混乱;另一种是帮助穷人(和不能被保险者)的有限干预和为所有人提供强制性福利的综合性安排之间的混乱。而且,正是由福利向福利国家的转化产生了非故意的有害结果,即使它们可以并的确被预测到。

尽管从表面上看,国家为老年人提供福利似乎是合法的国家福利活动的完美例子(从历史上看,在变老和变穷之间有密切的关联),但更深入的分析表明,情况不一定如此。原则上,退休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说,它们没有什么能够让国家卷入成为必要,不管基于(经济)效率考虑,还是基于伦理考虑(作

① From *Evidence to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Aged Poor* (1893), quoted in R. Harris,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8).

② See N. P. Barry, “The State Pensions and the Philosophy of Welfar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4, 1985, pp. 468 - 90.

为减轻可以避免的穷困这种普遍道德义务的一部分)。退休金只不过是迟发的工资,它从工作期间累积的储蓄中支付。它们的价值理论上代表了人们的时间偏好,就是说,为了未来的消费他们准备牺牲掉多少当前的消费。理论上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一个竞争性保险市场不应该提供各种安排,以满足人们不同的时间偏好。迫使人们为未来储存一定的数量,显然就是在福利道德哲学的意义上削弱人们的自由和自主,——它要独断地决定他们生活中的消费模式。

国家强制的惟一似乎合理的理由来自道德风险,就是说,如果国家的确有一种减轻痛苦的道德义务,那么人们会受到诱惑,提高他们的当前消费,缩减当前储蓄,因为考虑到他们退休后有足够的保障。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国家应该迫使他们在工作时储蓄。然而,这个主张依附于高度可疑的假定:个人的确比受选票激励的国家官员有更强的时间偏好。从社会正义的需要中很难推导出某种强制性和统一性的情况,无论历史上是什么情况,反正现在变老与变穷不是一回事。的确,在一个想象的社会中,个人在起点处拥有平等的资源,人们可以预期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会存在不平等,因为财产通过一生的工作积累起来。除了少数不受与工资挂钩的退休金偏爱的人之外,老年人一般相对富有。

然而,尽管有这些考虑,但国家卷入退休金给未来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它的活动很少针对那些不能被保险者,和其他不能在市场社会中应付生活者的真正福利问题。保证与工资挂钩的退休金的做法已经带来了所谓迫切的“退休金灾难”,它不是通过

合适的投资计划,其中对退休者的支付反映了真实的终生储蓄,而是通过“即用即付($\text{pay} - \text{as} - \text{you} - \text{go}$)”安排,也就是你用多少,就给多少。后一种方式是直接的税收转移,也就是从当前的工作一代转移支付给退休者,这个过程(据说)在道德上被一种代际间的准契约所证实,通过这个契约,该过程可以无限地通往未来。而且,当这些转移支付与工资挂钩时,它们就将当前收入结构中的不平等保持到退休。

这个体系在某种均衡世界里不会是灾难性的,如果经济增长率、人口统计的事实和青老年人比例是完全稳定的和可以预测的话。或许有人根据自由和自由减少的特征来反对这一点,但是它所基于的经济知识预先排除了真实世界里非基金计划所产生的代际不平等问题。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因为关于未来增长率和人口条件有某种不确定性。如果人口增长率放慢,而人们活得更长,他们可能会如此,因为医疗水平在提高,那么,在“即用即付”安排下,不断下降的劳动力就有法律(道德?)义务支持不断扩张的退休人员。标准的公共选择假定强烈意味着个人有各种动力维护该体系,因为担心他们在该体系中的税收“投资”被“一笔勾销”,如果他们想违反隐含的契约的话。这是一种奇怪的道德,它允许为了满足老一代的欲求,而将负担施加到新一代人身上,却不经过后者的同意,也不考虑需要的正常福利标准。卢梭有句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上述做法却是对这句话的讽刺性歪曲。现在,人们是生而负债。

据说^①，与“即用即付”制度一样，基金制计划（funded scheme）也同样无能为力，因为，尽管他们名义上付出一笔他们通过以往储蓄获得的收入，但是，他们仍要依附未来一代的生产力，并因此同样容易受到人口因素和其它决定这种生产力的因素的影响。然而，基金制计划包括经济中的投资，它会加深和加宽资金结构，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这种“迂回”式生产会带来更多消费品的增长。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同意，如果将捐献给美国社会保险体系的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那么就会有高得多的经济生产率，并因此有更高价值的退休金^②。目前，据估计，美国有 8 万亿美元的非基金债务，这个债务只能导致下个世纪出现非常高的社会保险税。正如最近研究福利国家中“年龄”问题的作者指出：

中等和高等收入的青年人知道，除了让他们作为上一代利益的投资者之外，福利国家对他们没什么兴趣^③。

这种现象的理论含义是有启发意义的——它们说明由福利

① N. Barr, *The 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 ch. 9.

② Feldstein, "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 1974, pp. 905 - 26.

③ Paul Johnson, Christopher Conrad and David Thomson (eds), *Workers versus Pensione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

向福利国家的转化并非要那种制度从属于由福利哲学家建构的道德命令,而是从属于奇异的选举过程。不能假定国家(通过选任或非选任的官员)比个人有更低的时间偏好。的确,重新当选的欲望意味着相反的情况,这必然意味着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将福利政策成本转移到下一代。很少有理论上或经验上的证据表明,政治体系在处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方面比市场更有效,这些不确定性折磨着所有的福利前景。而且,有很多的证据说明,国家福利责任的稳定增加,实际上让它无法履行其最初的责任,也就是帮助真正的市场社会受害者。

六

几乎所有的福利理论都有一种让人沮丧的含义:不可能想象一种福利体系,它既不会有反直觉的含义,也不会有反生产力的后果。尽管一些社会理论家建议国家完全退出,根据是保险和私人慈善可以解决类似的问题,这是很难想象的。一方面,如果它是一个功利主义判断,基于这样的主张:一个纯粹私人的市场会满足个人的福利欲望,那么它在经验上可能是错误的。一开始,公共福利的部分理由是境况较好的个人愿望(desire)由公共机构进行减轻剥夺的行动,这愿望是一种想要(want),逻辑上等同于对国防、法律和秩序、以及人们熟悉的所有其它国家活动的需求(demand)。这是位于关于福利的公共物品理论核心之处的真理精髓,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自由主义与其它政治哲学一样是福利主义的教条。

当然,它会遇到来自诺齐克的反对观点,认为国家福利(即再分配)活动包含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但是这依附于对这些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证明,也依附于某种可疑的主张,譬如说,认为国家的公共供给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侵犯它们。还应该记住的是,国家福利的立即退出会给那些终生“投资”进去的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确,福利现状给任何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社会理论提出了几乎不能克服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包括了权利和权利资格。不仅根据传统福利哲学它是不道德的,而且根据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它也会受到谴责,后者禁止以这种方式无视偏好^①。

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早期福利批评者构建他们主张的人性原则确实准确得让人沮丧。国家福利体系缺乏济贫法所列举的那些恶劣条件,而且对当前工作福利建议的回应冷淡,因此,似乎没有什么国家福利体系不具有反生产效果,它们要么显得太有吸引力,要么因为违反常规,譬如说,由民主体系产生的偏向境况较好者的再分配等。当代经验说明,福利国家制度远非鼓励一种社群主义的和关心社会的“自我”,只是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下再生产传统的经济人。而且,在这个背景下,市场价格体系的自动约束基本上不存在,或者通过它们的政治替代物——投票机制——而至少运作得缓慢得多。

因此,无论对“福利权利”存在的证明在伦理意义上是多么

^① “全体一致或某种变体,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公共活动投票规则”, see J.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的合理,而且,无论来自公民资格的福利情况是多么的有说服力,如果这些社会哲学没有考虑福利社会中被证明起作用的某种行为特征和因果机制,那么它们都是极不完备的。这些论点得到雷蒙·普兰特等人的承认,他建议福利权利应该受到宪法保护,免受民主政治的奇特行为和福利机构活动本身的伤害,而且承认福利好处的接受与相应的社会责任的存在并非不一致^①。

七

在西方民主国家,关于福利国家的伦理和效率,已经有许多的怀疑,从这些怀疑中引申出来的一个推论是,贫穷和剥夺现象部分地是一个社会和文化问题。它不仅仅是由资源稀缺带来的(尽管从福利到福利国家的转化所赖以建立的脆弱经济基础在福利国家理念的混乱中具有关键的意义),而且是由制度安排带来的,它们不知不觉地鼓励它们旨在减轻的痛苦永久化。因此,不管 19 世纪关于原因的命题中有多少的真理,但肯定可以合理地建议,在这个世纪,原因的方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已经从福利制度的复杂结构转向福利问题的再生产。对于理解福利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分析两个竞争性的和不协调的概念,在这个领域的理论化过程中,它们一开始就以不成熟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种观念将幸福概念限制于个人的主观经验,另一个观念将福利归于“事态”或各种类型的聚合现象:“福利改进”是促使作为

^① Hoover and R. Plant,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op. cit., ch. 12.

整体的社会变得更好。尽管后一种描述似乎关心个人主义的经验,但更深入的分析表明它们并非如此。有一种假定认为由国家承担福利供给的责任,提供人们想要的物品和服务如教育、保健、退休金等等,这个假定几乎总是依附于高度争议性的效率概念,就是说,由集体供给这些物品和服务会产生一种最优供给。它据说与假定的个人选择相一致,但不会由私人安排产生。然而,据说如果所有幸福陈述都是绝对主观的,那么在对人们的选择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企图由一个中央机构(国家)来提供一系列服务,逻辑上就是将一种集体安排强加到一个不可知的偏好组合上面。当然,对于一系列物品和服务的生产来说,政治或集体选择程序的确是必要的,而且,如果没有它们,个人的境况会变得更糟(在主观意义上)。还有,为了满足人们对真正公共物品的欲求,民主程序是市场的合法替代物。然而,假设国家福利功能增长的持续过程已经带来幸福的增长。正是这种理论考虑位于“官僚福利主义”的反对意见的核心,这种福利主义源自各种意识形态立场,包括倾向福利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另外,从福利到国家福利的转化在道德上是有疑问的,甚至当它的理由不是福利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而是纯粹伦理意义上的再分配时也是如此。正是在这里,程序上的考虑也是至关重要的。不管福利平等在伦理上是否可欲,或者甚至是否构成一个连贯的伦理目标,没有理由假设政治选择程序会产生它。如果福利物品以类型输送,那么在伦理上激励它们的平等主义意图将被歪曲,并被构造良好的行为假定所阻止,这种假定以某种不可抗拒的“铁律”支配着那些服务的消费。通过格兰德和古

福 利

丁所辨识的那种“仁慈卷入”，中产阶级挑战着公民资格理论所意含的平等主义命令。

福利理论和实践中的障碍无情地来自一种错误，就是将幸福归于个人经验之外的某种东西。承认这一点，就应该导致一种标准的理论，它意味着对目标状态或聚合福利陈述的拒绝，将它们看作某种误解和偏见，这种偏见倾向于“选择性”地输送任何福利强化政策，并被认为适合于国家。正是这种聚合性思路要求个人只是某种社会福利功能的计算器，而不是他们自己未来的自主创造者。

坚持将福利视为纯粹个人主义的现象是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化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特别在边沁学派的功利主义—聚合性推理方式中丧失了，他们用这种推理方式来支撑福利理论，特别是支撑后来叫做福利经济学的东西。根据前一种观点，市场的有效性不是因为它最大化某种聚合性功利功能（这种道理在福利理论家中产生了“完美主义”态度），而是因为它能够协调分散主体的活动，他们追求着自己主观确定的目标。正是这一点赋予了自主的需要以正义性，自主的价值是当代国家福利理论的一个特征。福利国家哲学家在未校正的市场安排中发现，个人缺乏决定自己未来的力量，这常常是假定由国家机器来承担福利责任的后果。这种自由的削弱既可以在不承担社会义务的福利分配政策（最朴素的古典自由主义偏爱这种形式）中反映出来，又可以在“国家化”供给保健、住房、教育、退休金等所带来的选择削减效果中反映出来。当代个人主义理论尽管排除了对国家现有福利责任的拒绝，但是，它在从现

状出发的一个不同方向上,特别指出了国家福利削弱选择,以及模糊和消解个人行动责任等特征。这后一个论点不被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福利理论家所接受,而且不被一些更朴素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他们希望折扣因果历史的重要性,以便能够对待剥夺问题。由此而来的是,如果福利理论原理关涉自主和选择,那么,福利政策应该指向许多方式,其中个人能够被赋能(empowered),就是说,能够做自主的决定,以强化他们个人的幸福。这并不能推导出市场选择是惟一的个人可以被赋能的方法,当然,市场选择是必要的。国家卷入可以赋能,如果它围绕某些制度和政策建构起来,而这些制度和政策旨在强化个体公民而不是福利机构的幸福。

这个概念的一个明显的政策含义会是通过“凭证(voucher)”计划将选择引入教育^①。这样,父母理论上可以在他们选择的学校“花费”他们的“凭证”,于是,教育的供给者(教师和管理者)将被迫回应消费者的欲求,否则就会面对明显的后果。如果有能力的父母也可望要求某种平等主义成份,那就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凭证的价值不应该根据收入来调整。不管这些计划的建议版本的细节,理论要素仍然是稳定的——个人仍然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

这种伦理态度本身并非与平等主义不一致,尽管古典自由主义/主观主义者在理论上和经验上会有其它反对再分配的意

^① A. Seldon, *The Riddle of the Voucher*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6).

见。然而,它与任何将幸福与个人经验分离开来的福利观点不协调,也与任何标准理论不协调,这种理论认为,要么个人不是其幸福(譬如说在教育或保健中)的惟一仲裁者,要么社会政策应该在这些领域中超越个人选择。这后两种主张都依附于他们连贯的“客观”福利目标和政策。尽管福利概念是“根本争议性”的,以致它理论上不可能在概念运用中对这些相互竞争的合法性要求做出裁决,但是,主观主义者也许在争论中有点优势,因为“客观主义者”必须要说明,他们偏好方面的什么东西使得他们的概念在性质上优于其它概念。但是,对于一个完整的主观主义福利理论来说,只有这种优势才有某种勇气来坚持。它必须禁止强制性保健和失业保险,这是两个明显的例子。许多理论将赋能作为个人主义福利理论的压倒性目标,因而支持在这些领域进行某种强制性投保。然而,不得不承认,对选择进行部分限制的原理的确代表了主观主义立场的一种后撤,这种原理认为那些自愿选择不投保的人会在以后出现福利问题。

个人主义福利理论不能被解释为仅仅是一种市场理论,其中价值由价格决定,因为人们很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运用他们的选择:他们的主观幸福在社群行动中被促进。这只是重申这样一个观点:福利论争没有被市场/国家二分法所穷尽;它必须考虑各种可以通过运用自由而出现的社会制度。从历史上看,福利安排自发地发展起来,上个世纪的医疗保健互助协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英国工会一个初始功能是为其成员提供福利好处。同样真实的是,自由领域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慈善机会。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state)里,福利输送

也类似地依附慈善——选民的慈善。因此,相对于非政治方法来说,政治机制是否能更有效地调动慈善情感,这至少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福利理论中的标准主张是,因为福利有某种公共物品特征,所以,它不应该由私人供给;根据这个观点,国家不仅拥有政治权力,而且拥有道德权威,以便为整体社会最大化某种(假设的)福利功能。然而,本书一直坚持认为,从主观主义角度来看,这一点是不可知的。关于政治过程中行为的传统假定预测,投票显示了人们对由国家供给的其实是私人物品的需求。当然,这解释了福利国家为什么被中产阶级“攫取”。正是这种现象导致人们对政治机制在调动慈善动力方面的有效性产生某种怀疑,有鉴于此,现代福利理论已经说明,社会合作和慈善如何在正式政治机构之外得到证明:公共物品,包括福利情感的实现,可以通过互惠行动而自发地产生。如果像提特莫斯那样,假设在不掺杂任何相应责任的情况下,单凭利他主义情感本身,就足以产生他本人认为可欲的福利水平,那是很天真的想法;但是,如果认为福利可以在传统市场和国家领域之外发展起来,则并非不合理。只要个人感到自己在道德上有必要为了相互的好处而进行合作,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这一切意味着个人之间生产福利的自愿行动是可能的,即便微观经济学的传统假定意味着违反自愿协议的动机是如此的强烈,以致“搭便车”的行为不可避免。因此,据认为,任何不被强制力支持的福利体系都是高度不稳定的。

然而,还远远不清楚的是,这一定是事实。众所周知的是,在“囚徒困境”的不断上演中,个人发现合作符合自己的利益。

当然,如果一个人不对公益活动做出贡献,那么他的境况会因这种活动的供给而好得更多,但这种反社会的行为会被合作者“惩罚”。正如罗伯特·苏哥登^①所说,社会合作的发展要求出现互惠行动的道德特征——它是这要一种规则:在没有直接激励的情况下,人们应该返还由市场或国家提供的利益或好处。就像其它道德规则一样,这个规则是经由演进过程而出现的,其中非合作者通过自然选择而慢慢淘汰。当社会受益的活动的供给依附于每个人的合作时,也就是当相互的好处能补每个迅速地看到时,这个过程就更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明显不同于利他主义的慈善会兴旺起来。

所有这一切与传统上所理解的福利有什么关系呢?它实际上是某种理论的种子,这种理论可以解释时而以任意的方式折磨人们,并因此产生国家福利需要的生活无常和命运不幸,如何能融入不依靠天真的利他主义存在的个人主义框架。为了解决福利问题的自愿结社不一定会堕落成公共物品陷阱。从历史上看,确如我们所指出的,互助社团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而且,个人主义福利理论可以从私人保险和相互帮助中建立起来。

然而,这些意见目前还只是假设,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有一理论观点认为,“大数目”特征让利用慈善本能和互惠道德变得不大可能。在由大量人员组成的人类社团中,利益供给不

^① R. Sugden, *The Economics of Rights, Co-operation and Welfare* (Oxford: Blackwell, 1986).

依附于每个人的合作；由于合作利益不能立即兑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背叛的威胁是一直存在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诉诸由国家提供的集体福利是惟一的选择：目前对这种情况的不满意来自政治光谱上的许多观点，这种不满意足以证明有理由继续怀疑这样一种解决策略。

有一种可能是将国家的福利功能分散到更小的结社中去，这样，在传递所有福利都要依附的慈善情感方面，投票机制会比在国家立法机构中更有效率。正是在后一种机构中，“投票动机”会产生集体供给基本上是私人的物品——这个现象带来不平等以及对福利政策的历史目标的冷漠。还有一种情况是，较小的政治单位不那么容易受到困扰所有福利政策的“知识问题”的影响，所谓知识问题，就是说，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很难获得福利偏好方面的信息。最后，对福利好处的接受者施加的互惠义务，许多公民资格理论家所喜爱的政策，在地方政治社群中，比在国家社群中更容易得到。

所有这些尝试性问题都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相关：福利问题本质上关涉个人的感觉和态度，不管它们通过市场、国家，还是通过这两个竞争领域之外的自愿行动形式来调和。正是将福利特征归于“社会国家”或聚合体，才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不是主要地）导致了福利国家一开始就内在具有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福利权流派将幸福权解释为针对国家的要求（在道德上相当于节制权），尽管它形式上外在于聚合性传统，但它在基础层面有弱点，而且与政策的关系不明确。有教育和健康的“权利”吗？如果有，如何安排它们呢？在稀缺条件下，有什么原则来决

定优先级呢？另外，福利权的模糊性意味着对它们的扩张很少有理论限制。一些福利权理论家的确将它们的容纳与社会义务表现联系起来。但是，尽管这个条件有助于解决一些与国家福利联系在一起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过，它也削弱了它们作为真正权利资格的地位。因此，尽管社会理论家希望将绝对性与福利权联系起来，但上述情况让它们屈尊为与政治过程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就像人们更为熟悉的集体主义福利理论那样。

八

这些考虑意味着，关于福利概念，只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那就是它似乎不可解决的性质。这种性质显见于概念本身的意义问题，甚至更显见于政策领域。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来自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 30 年里，福利概念不可避免地福利国家哲学捆在一起，以致至少在某些圈子中，据说促进幸福的责任几乎完全寄于国家。这便产生了高度争议性的社会理论，它贬低个人幸福的那些非政治性案例，譬如说，通过个人自愿交换而实现的满足等，而这是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所一直强调的。它还低估处理减轻剥夺等主要福利问题，以及供给教育、健康和退休金等典型福利物品的非国家制度。

福利国家哲学中还有一个缺陷是不注意有关福利输送的宪法安排。那些提出复杂的福利观点的理论家很少钻研实现它的合适程序，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忽视现有程序会对福利供给本身带来的独立影响。而经验研究强烈主张，民主制度不仅几

乎自主地产生了福利,而且带来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当该物品以非选择性的方式和具体服务的方式送达时。从历史上看,有一个隐含的假定,认为国家福利的理想形式会由摆脱了政治行动者正常动机的仁慈统治者来建立;或者那些信心十足的政治领导人会以费边主义方式被某种福利理想渗透。然而,所有这些都预先假定存在一个在多元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存在的关于社会目标的共识(尽管有某种证据表明,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西方民主国家有过短期的福利共识)。如果没有这种共识,福利问题肯定受支配于常常不可预测的政治舆论和选举压力的波动。

当然,不可能让福利与政治脱钩,但未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可能既集中在实质性伦理问题上,也集中在宪法问题上。因此,政治理论家应该更多地注意比目前方法更有效率的传递人们关于国家福利的主观选择的程序。尽管假定英国或美国的福利体系将有重大变化是一件稀奇的事,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幸福是一种个人现象,它不一定要由一个对选举过程和理性福利伦理的需要敏感的国家机器来促进,这说明,适合对整个主题进行基本的重新检讨的时代到来了。通过各种不同的赋能方法,如凭证计划等,让教育、保健、退休金等回归个人,原则上标志着一种新共识的开始。在促进道德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与社群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相关联的社会责任方面,与国家立法方式相比,将福利服务分散到更小的政治单位是一种更可行的方法。而且,在退休金之类的事情上,重新激活真正的保险原则会防止下一代背上债务。

福 利

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无论在理论层次上还是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福利主题都仍然无法解决。尽管关于公共事务的一种更为个人主义的理论得以复活,以及许多作者接受幸福是一种主观现象,但在这方面没有共识。对于许多理论家来说,个人的确有独立于他们欲望的需要,而且同样据说一个社会的确有不能简化为个人选择的目标。正是这种观点证明了福利转化为福利国家的正当性,而且因此也证明了与那种社会组织相伴随的不可避免的家长制的正当性。在对福利进行理论化的过程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这种两分显然形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边是潜在的伦理虚无主义的主观主义,另一边是预期的权威主义的客观主义,这只不过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一个特殊案例。这是一种基本性的争论,很难由细小的福利制度改革来解决。

第八章 福利:后记

这本书于 1990 年出版后,政治和知识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社会主义梦想的破灭,它梦想一个没有市场的、理性—计划的社会。这项计划失败的最令人惊讶的例子是共产主义的崩溃,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引发了对福利体系的再思考。这次社会思想的重新定位中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工具在本书第一版的第七章有过讨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亲市场的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已经侵入到福利论争当中。几乎所有传统的福利国家当前都在进行福利改革的试验,有一些创新来自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政府。而在很多国家,集体主义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建立很久,尽管它的成本在不断攀升,但此项制度仍然保持稳定。本书第一版所讨论了第二种类型的福利国家,其收入再分配旨在减轻贫困,它经受住了来自保守的社会理论家的猛烈攻击,他们不辞辛苦地历数似乎由它产生的机能不良的社会行为。

尽管保守的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福利思想得以成功地复兴,但类似的概念分类仍然存在。因此,根据个人主义福利政策的

要求,福利国家的所有部分都应该私有化,这一主张遭到那些否认福利被个人幸福经验所穷尽的人们的抵制。对于后者来说,整个福利思想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群的价值捆在一起。集体主义冲动不一定是寻求一揽子经济国有化,只是它的支持者感觉到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不应该任由市场处置。这些社会目标包括生产基本福利物品如失业保险、保健、教育、退休金、和济贫等。

最经常被引用的,用于证明国家在这些领域具有广泛作用的原则是需要。对这概念的分析仍然显示了导致当代思想家分裂的那种差异。福利国家的主要原理是,它的制度和政策满足需要,关于这一点,据说在心怀好意的分析家中可以达成共识。在一个人那里证实有某种客观需要,就会对其它的主体或机构产生满足它的明显义务。这也许在理论上相当于保护人们免受侵略性和攻击性行为的伤害。满足真实的需要不一定是福利国家的惟一目的,但据说是主要目的。

需要诉求主要来自需要(need)和想要(want)(或仅仅是偏好)之间的所谓区别。市场照顾想要,而它们的满足不可否认要依附收入;它们根源于个人的心理,而且肯定是主观的,并根据冲动而变化。我们决定有某种偏好或想要,而不是发现我们拥有它们,譬如说拥有健康或食物的需要。当然,在现代社会中,所表达的许多想要在任何紧迫的意义上是不需要的。它们不是满足的先决要求。

然而,需要被视为客观的,因为它们的存在不是个人心理的功能。需要是关于人的事实,并具有确定性的味道;一个人不得不拥有它们。它们甚至能够被科学地证明。大卫·威金斯声称:

“我所需要的不依附于我大脑的思想或工作(或者不仅这些),而是依附于世界的样子”^①。一种需要的存在根本不依附一个人是否意识到它——的确,一个人也许不想要所需要的东西,正如一个人常常不需要所想要的东西(无论这种想要的感觉是多么的强烈)。因此,其他人也许比特定主体更好地理解需要,显然是因为它们被视为客观的。只有福利国家能满足这些需要,而且从理论上说,需要者的需求(即使没有被表达)必须被满足,即使人们缺少收入。

然而,在现代福利国家,许多也许被认为想要的东西,即使是一种重要的东西,都以需要的形式出现,要求集体供给。因此,乔治和维尔丁主张:“激进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各种资源,不管属于健康、教育、住房领域,还是属于收入领域,都应该根据需要来分配”^②。但是,如果假设需要的所谓客观性可以在道德上授权国家将需要的满足作为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那便是一种幻想。即使由乔治和维尔丁所列出的似乎合理的候选领域如教育和健康等,也有某种不可削弱的主观主义阴影。至于有多少的教育和健康需要供给则是个选择问题,或者通过票箱表达,或者通过市场表达。如果医疗需要是真正客观的,那么在国家化保健服务的资源分配中就不会存在争论,因为会有某种机构知道在臀部移植、心脏手术、癌症治疗等方面究竟要花费多

① D. Wiggins, "The Claims of Need", in T. Honderich (ed.), *Morality and Objectivity* (London: Routledge, 1985). p. 152.

② V. George and P. Wilding, *Ideology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1976), dustjacket.

少。除了紧急状态下有明显的需要之外,保健开支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主观性的,而且需要定量供应,或者经由价格,或者经由行政许可。同样的推理可以应用于教育,因为尽管在识字和算数需要方面或许存在共识,但在基础水平之上的开支方面则存在明显的争议。保证消费者有高报酬工作的高等教育应该以零价格供给,就因为它是一种客观需要吗?

需要的客观性的确会受到挑战,但如果认为它为集体化福利国家辩护的理由无药可救,那也会受到怀疑。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一种需要似乎没有被选择,但这决不是明显如此。大多数需要可以转化为想要。我表面上似乎需要医疗服务,但这是因为我想要过具有某种品质的生活。在某一点之上,由于要服从稀缺性,所以医疗服务最终得依附主观选择;面对潜在竞争性的目标,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可以假定人们想要生存,因此,表面上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实际上是具有某种强烈度和急切度的想要。另外,如果活着意味着持续的痛苦,有人也许就不想活,而这种决定显然是主观性的。

需要不是摆在那儿的物质性东西,在等待一个有能力的观察者来辨认,而是与计划和目的有密切的关联,而这些计划和目的是主观选择的。在竞争性需要中存在优先性的问题,这削弱了认为它们是客观的和确定无疑的那种主张。西方社会因它们的道德多元主义而特别受重视,这里有某种自负的思想,认为某种机构能够知道如何根据紧迫度对需要进行排序。认为需要是客观的而且不同于强烈感受到的想要,这种主张听起来确实有点家长制味道,福利国家活动技术上就是如此。有一个强有力

的观点与这个主张同路,它对需要持一种相对主义看法,因为在西方目前被视为需要的福利物品,而在更穷的国家就会被视为奢侈品。最后,即使有客观的需要,也不能合逻辑地推出,国家有责任满足它们;在福利历史上,有各种自愿机构,它们的成员认为关心贫困的人是自己的道德责任。

这一切都不能预先排除国家福利情形,但是它对需要主张的客观性提出了严重的置疑,这种主张传统上穿有防护套。的确,现代福利国家决不局限于需要的满足,这为它的捍卫者所承认。社会保险被列为压倒性的优先项,正如一种主张所认为的,国家有责任让人们一生的收入变得平滑。而且,福利国家的许多再分配——以现金形式或以类别形式——与客观需要的满足没什么关系。需要在福利主张中是修辞性用语,在公共政策辩护中,常常用来伪装最终是主观性的观点。

关于福利国家的竞争性观念

在今天的福利论争中,严重的争论发生在关于国家责任的两种竞争性观念之间。它们被总结为“剩余的”和“制度的”福利国家。它们都是分配性的——尽管在方式上有点微妙的不同,而且它们都产生了让理论家和政府感到苦恼的严重政策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有非常不同的哲学基础和关于人类行为的不同理论。

剩余性福利国家甚至可以称为济贫法体系,因为它只关心消除剥夺——它能确保相当程度的共识(甚至富人也会感觉糟

福 利

糕,如果可以消除的贫困仍然存在的话)。福利的意义局限于增加幸福,那是从富人转移到穷人身上的(最小的)再分配。它与社群利益的增进多大关系,后者也许因为某种福利服务的普遍供给而发生。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中,再分配采取现金支付方式,不给它的使用设置条件。这种形式的福利是美国的一个特征,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英国的一个特征,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有现金再分配之外的福利。这种福利的一个特征是它依附于财产调查,如果要达到剩余性福利国家目标,这种手段必须使用。

这种福利的竞争者是制度福利国家,它让社群中的所有人都来消费福利物品,譬如说保健、失业保险、退休金、教育等等。制度福利国家的理论支柱来自社会团结的价值,它据说源自福利物品和服务的共同消费。这据认为会产生不同类型的道德主体:它不是那种古典自由主义社会理论中抽象的效用最大化者,他们与自己的同胞相互分离,而是一种愿意合作的,较小个人主义的人,他们能够承担公民责任,处理与包容性社会中其他成员的互惠关系。他们的福利不仅仅是他们收入的功能,而且包括普遍服务所明显产生的共同幸福。

在制度福利国家中有一种再分配形式,但它不是通过现金支付方式从富人转移到穷人,而是在特定群体中进行的一系列转移支付,例如,通过普遍的保健服务从健康者向病人转移,它在某个消费点上 is 免费的;从就业者向暂时赋闲者的转移;以及

通过基于代际契约的退休金从年轻人向老年人的转移等^①。也许存在一种由准保险原则和社群主义价值组成的不稳定的混合物,但它是一种共同的福利目标。它的一个好处是,这些安排覆盖的人越多,对财产调查的依附就会越少,它们所包括的对个人尊严的侮辱也会越少。欧洲和英国福利国家之间的明显差别可见于这个主题,因为前者拥有一套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安排,它预先排除了人们由于收入而导致的隔离。这些十分昂贵的计划能够在欧洲生存下来,恰好是那里反个人主义的一个后果。

正是在公共福利这些类型的分析中,产生了对福利理论和实践最有创新性的贡献。每一种要成为福利理论的核心都有毛病。与剩余福利国家相关的问题是它会鼓励机能失常的行为:与制度福利国家有关的问题不仅只是它的超额成本,而且是对自由和选择的威胁,而后者是集体供给福利所包括的。

福利国家和减轻剥夺

不管需要如何定义,福利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济贫。在美国,福利的含义似乎限于那些用来照料被剥夺者的安排。这个概念没有用于其他福利计划,如社会保险等;接受者被假设为它付过费,即使在保险计算的意义上他们没有付费。最小意义的福利

^① See Brian Barry, "The Welfare State versus the Relief of Poverty," in Andrew Levine (ed.), *The State and its Critics*, Vol. II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2), pp. 117-443.

国家的理由是减轻剥夺,但是很难真正清晰地说明:这里的明确责任是什么?有个问题在最近几年也变得更加重要,那就是在分析剥夺,以及在开出减轻剥夺的政策处方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个人责任。对于某些作者来说,人们处于痛苦状态的事实就是将援助送给他们的重要理由。根据这种“快照”式世界观,痛苦的存在是惟一管用的事,它就应该被减轻,而且毫无疑问^①。对于其他一些对社会痛苦的发生持长远观点和因果观点的作者来说,事情如何发生是重要的。人们会通过任性的行为而陷入困境,其困境的任何救济措施都应该盘算好,不能鼓励其他人也以类似的方式行为。福利政策应该防止道德风险(见第四章)。非婚母亲问题就是这方面最明显的当代案例。然而,试图克服道德风险的任何福利政策的困难是它惩罚了应得贫穷者(*deserving poor*);自济贫法以来,这已经为人所知。

在这种福利形式的理论分析中,所有的创新都来自美国。这或许因为这就是福利在该国被理解的方式,在美国,这方面研究最多的是关于主要以现金为基础的济贫体系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主要的争论则围绕着过去三十年里在社会民主领域采取的改善措施的有效性问题的。在实践层面出现了严重的怀疑,怀疑它们是否实现了将人们整合进社群,并最终减少接受福利的人员数目这个福利目标。在英国和美国,享受基于财产调查的利

^① R. Goodin, *Reasons for Welfa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7. For a critique, see D. Schmidt, "Guarantees", in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4, 1997, pp. 1 - 19. see also, N. P. Barry, "Conservative Thought and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Studies*, 45, 1997, pp. 331 - 45.

益的人员数目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它引发了关于社会福利目标的激烈争论。福利也许最初针对的是生活在男家长家庭中的工作穷人以及通常报酬低的赚钱者,但是它现在越来越多地针对家庭解体的牺牲者、从来没有工作过的非婚母亲以及其他构成一种代际再生的依附型文化的人。

在本书第一版中,注意到(第七章)在美国实施伟大社会项目时期出现的批评。这些项目特别用来应对该国的贫困问题。一些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曾声称,尽管有那些开支,但贫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实际上反而恶化了(尽管从政府开支比例上看,这些项目的花费份额是低的)^①。官方贫困者数目没有减少,更糟的是,家庭解体加剧了,特别是在黑人社群,而且,内城(inner-city)地区已经成为贫穷、犯罪和吸毒集中地。容易获得的福利正在产生一个机能失调的底层阶级。对于这种情况,有两种严肃的回应,一种依附于正统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假定,即人们根据激励做出回应,而福利供给产生了道德风险。人们也许曾经想工作,组成稳定的家庭,但是该体系产生了一种冲突,一边是所需要做的正确事情,另一边是(技术上)理性的行动方案。根据查尔斯·莫雷的分析——他在1984年出版《失去基础》之后仍然坚持了这一分析^②,人们对信号做出回应,尽管他关心道德,但他认为道德教育不能够成功地与由福利提供的懈

① 在美国,福利开支,也就是济贫,少于政府开支的2%,将医疗补助考虑进来,也只达到4%。

② 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New York: Basic Books, Tenth Anniversary Edition, 1994).

怠和机能失调行为的机会相竞争。作为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①,他不想让国家有权提供这种教育。他主张小政府会自动地产生道德和好的行为。美国福利体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它的非合法性(illegitimacy)在上升,而传统双父母家庭在衰落。在何种程度上这是由福利体系因果决定的,或者说是由文化变迁带来的,还很难说。即使导致非婚母亲的所有动因都被清除,它也不会显著地减少。

有点不同的保守主义批评来自劳伦斯·米德的著作,本书第一版简要讨论了他早期的作品《超越权利资格》。在这本著作和他后来的著作《贫困的新政治》^②中,他像莫雷一样,对美国公共福利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是批评中的标准攻击不是来自小政府的前提。的确,米德的分析推翻了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福利的批评,认为社会功能失调只有在福利世界中才能被防止,这个世界削减了个人自由,授权国家在教育 and 为公民社会培训人民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们必须变得更有能力,能够处理工作场合中的困难和责任。他声称:“工作问题的解决不仅在于自由,而且在于治理”^③。显然,对于米德来说,贫困问题的最坏药方是任何形式的负所得税或保证性工资,而莫雷^④现在

① Charles Murray,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Good Governmen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② Lawrence mead,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 Books, 1992).

③ *Ibid.*, p. 181.

④ Charles Murray, “What to do about Welfare”, *Commentary*, December, 1994, pp.28 - 49.

似乎接受了这些东西,不过接受的是修正了的形式,尽管他早期是这种东西的批评者。

米德的论点是,福利国家带来了新式的贫困——主要限于那些不工作并且永远不可能工作的人。尽管福利计划最初旨在作为工作穷人的收入补助,但是现在它们为成百万的美国单身女家长家庭提供了一种永久性的(尽管不是一种很舒服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它们基本上不受古典自由主义分析家建议的政策变迁的影响。米德喜欢的例子是,1970年代末,非婚母亲模式并没有随着福利好处的贬值而发生改变。许多支持福利国家的作者运用这个事实拒绝解释福利依附的经济学家的和因果性的方法。但是,后一种主张不单独依附收入变化对行为的影响。已经引起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福利好处的现金价值下降了,但是在对依附的因果解释中,其它因素如放松获得福利好处的资格条件等也同样重要。所有动因加起来,使得成为单身的和失业的母亲仍然划得来^①。

米德认为,工作必须是强迫性的(enforced);接受福利必须以工作为条件,可以在私人部门工作,也可以在政府项目中工作。的确,相对于那些更正统的经济保守主义理论家(与那些历史上试图将福利供给与个人自由联系起来的经济自由主义教义相比,他们似乎在政治上更有市场)来说,他的想法对美国政策有更直接的影响。工作福利一度成为美国各种福利计划的一部分——该国的联邦制度允许各个州有一定的空间进行实验,而

① M. Tanner, *The End of Welfare*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1996).

且有些州的确实行了某些形式的工作福利。但是,因为联邦政府总是很深地卷入到福利财政领域,所以,这种可能性是有限的。

支持和推广福利体系改革的真正阻碍来自一种特殊的联邦权利资格——依附型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它最初是一个旨在帮助受剥夺母亲(寡妇和离婚者)的儿童福利项目(始自新政时期),但是它的供给在1950年以后得以扩大,并且它变成了非婚儿童的母亲的收入来源。非婚生育比例从1960年的5%窜升至1990年的28%(在黑人社群则为60%)。美国的穷人主要是那些享受福利者(35%是家庭的女性家长),只有2%的工作者是穷人。福利国家其实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现象已经带来了一种新型政治,它不能归类为民主党的或共和党的,进步派的或保守派的。新主题是与这种形式的福利联系在一起的行为问题。至少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带来了新的公民资格概念,它强调福利接受者亏欠社会担负的责任,而不是他们得到那种收入的无节制的权利。

这个理论逐渐引起了政客们的注意,联邦政府已经尝试朝着工作福利的方向改革福利,最先是于1988年出台了《家庭支持法》(FSA),后来于1996年出台了更激进的《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PRWORA)。以前工作福利实验的问题是,它不是强制性的,而AFDC通常让非婚母亲免除了工作义务。PRWOPA将福利责任从联邦政府转移到州政府,后者接受大块援助,可以随心所欲地花费,限制条件是它要防止旧体系的恢复。这样,PRWORA废除了正式的联邦权利资格AFDC,而且,尽管AFDC

通过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而以一种修正了的形式继续着,但是对福利接受者有一个时间限制(两年),而且在理论上存在着繁重的工作和训练义务。

谈论这一切如何运作出来还为时尚早,但是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特别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迹象,该州在工作福利成为义务性项目之前就实施了它。但是那些持某种版本的经济决定论的正统保守主义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某些将不再起作用的动因依然存在,它们就会对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还怀疑是否有政府真正愿意实施工作福利。查尔斯·莫雷主张,工作福利计划只是在过去针对那些无论如何会工作的人有用。

米德的主张所显示的是关于公民资格的新理论。正如他所指出的^①,隐含在 T.H. 马歇尔的公民资格观点中的是一种关于互惠行动的隐含理论,那就是福利接受者对社会有所亏欠。然而,福利权的马歇尔概念被后来的福利作者做了不同解释:福利被视为人们被赋予的权利,而不管他们的行为。根据米德的观点,美国传统上输送福利的形式阻碍了合适的公民资格观念的发展。的确,自由主义者(美国意义上)将一些人视为无能者,不能获得竞争力;这是他们一直反对工作福利的原因。

针对查尔斯·莫雷和劳伦斯·米德对美国福利政策的批评,威廉·朱流士·威尔逊^②包装了一个严肃的观点,它通过谈论工

① Lawrence Mead, "Citizenship and Social Policy: T. H. Marshall and Povert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4, 1997, pp. 197 - 230.

②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福 利

作的不可获得性而将问题集中在福利问题的归因上。它的观点是重要的,因为它不依附人们所熟悉的从歧视角度对美国底层阶级和少数族群(特别是黑人)的不利处境所做的解释。他激起了传统福利流派的怒火,因为他认为美国的联邦行动和司法裁决已经消除了大部分严重的工作障碍,它们一度因种族偏见而存在。他对内城问题的解释是,不利人群的就业机会已经大量减少。过去位于内城的旧制造业已经基本消失。它们已经被新的高科技行业所取代,它们座落在郊区,而且需要那些人所没有的技能。可获得的工作类型与潜在雇员的素质之间不相匹配。而且,而重新安置在郊区以试图发现新工作的那类人应该是文明的典范。那些仍然留在内城的人可能在享受福利,而且部分人沾染上毒品和犯罪文化。

底层阶级的出现与福利没什么关系。对于威尔逊来说,因果链从工作的不可获得性开始,然后通到福利依附和功能失调行为,而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该链条差不多直接从福利制度通往社会失序(即使他们在确切的因果模式上意见各异)。对于威尔逊来说,或许得出这样的结论:更老式的干预主义方法是福利问题的答案。这也许要求由政府直接创造工作,或者采取更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直接处理现代经济中产生的那类失业问题。

福利理论家同意这一切或许有点道理,但否认它是困扰美国内城的福利问题的惟一、甚至主要的原因。其实,从历史上看,美国劳工是高度流动性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早期,哪里的工作,人们就到哪里去。黑人人口肯定是这样,过去他们为了寻

找工作而准备长途迁移。而且,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关键论点:美国产业的重新安置,很多是因为内城已经成为犯罪骚扰地,而且它们的人口已经变得像米德所说的那样没有竞争力。

值得指出的是,与欧洲相比,美国有很强的能力来创造工作。尽管这些工作也许没有吸引力,但是,人们不是倾向于在这些工作中呆很长时间,而是一旦获得了工作习惯,就会沿着收入阶梯迅速移动。的确,美国福利理论家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一项工作,不管报酬多么低,本身就是文明性和公民资格方面的一种教育。

那种认为福利问题因工作的不可获得而出现的观点在英国和欧洲比在美国似乎更合理一点。在英国的福利理论中,贝弗里奇福利保险体系通常是在充分就业政策背景下被审视的,这种政策来源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经济战略(见第三章)。这就是制度福利国家为什么采取那种形式的原因——它是一个临时救济体系,针对那些正常情况下会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中的人。但是福利体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现在同样针对那些财产调查利益的接受者、非婚母亲和家庭解体的牺牲者。不过,与美国相比,英国的工作机会更难得到。同样,福利体系让就业变得更没有吸引力,因为“贫穷圈套”和财产调查产生了许多不可欲的后果,最引人注目的是减少了工作动机,因为人们一旦赚得太多就会失去福利。而且它鼓励了欺诈。

财产调查的放弃和普遍福利的给予产生了自身的反常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普遍主义模式下,援助给了那些不需要它的人——至少根据前面所表述的“需要”定义。有一种关于

普遍主义正当性的证明来自福利理论中的社群主义观点：它将人们理解为公民，因而有权得到社群生活的某些集体好处。如果让接受这种收入成为某种以财产为基础的歧视，那么显然会带来某种分裂：一个社会必定被划分为福利提供者（纳税者）和心怀感激的受益者。不过，福利国家制度及其普遍特惠是否产生了理论家所希望的社群精神，这是令人怀疑的。

其实，福利提供者一般憎恨不得不付款给那些他们认为通常是非应得（undeserving）穷人。他们拒绝将那些个人自找的问题强加到纳税者身上。而且有些福利问题是人们不当管理自己生活的后果。因此，在欧洲福利国家中，境况较好者反而渴望保留某种非常有问题的福利好处，如普遍性的儿童特惠。

制度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的困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支撑其存在正当性的道德和政治理由是混乱的。它被有些人视为让个人免受贫穷和经济生活变化伤害的一种根本保护。不幸可能会折磨任何人，而且作为公民，我们负有相互照料的普遍化责任。然而，福利国家也提供不是针对穷人而是让所有人享受的服务（得满足某种要求不太高的标准）。这些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可以由市场来提供，在历史上，它们曾由自愿性社团来供给。制度福利国家的服务涵盖了保健、教育、退休金、失业保险和其它项目，它们表面上至少与“客观需要”没有太大关系。

由国家提供强制性保险的终极原理仍然相同。在面临市场失败时,国家干涉进来,供给公共物品,尽管在健康、退休金、和失业保险方面是否存在真正的市场失败,经济学家们从来没有一致意见。用来证明国家供给正当性的一个特征是“逆选择”现象,本书第一版没有提到这一点。在某些私人保险市场中,那些最可能受生病或失业之类的灾难折磨的人就是那些最可能为其投保的人。保险公司不能预先找出这些人是谁,因此产生了高度不稳定的市场,带来了具有潜在毁灭性的高额保险费。国家计划中的强制因素分散了风险,而且还帮助处理了“协差(co-variance)”问题,譬如说,当发生严重的经济萧条时,灾祸会大规模地相互影响。私人保险不能处理广泛的灾难。

然而,近些年来,有些理论上^①(和实践中)的尝试来治疗这些问题。甚至到目前为止还难以解决的失业保险问题也会由市场方法解决。在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中,劳动所得可能太低,不能支持广泛的失业保险,但当社会变得更富有时,对劳动者的回报会渐渐赶上对资本的回报。在一个私人保险市场中,该体系在资金上能够自我支撑。保险公司会监督该体系的运作,以避免道德风险,而且竞争会带来可控的保险费和利润。最重要的是,私人保险公司不会无限提供失业补偿,这是国家计划的祸根。在私人世界,失业补偿获得者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寻找工作,

^① See M. Beenstock, “Unemployment Insurance without the State”, in A. Seldon (ed.), *Reprivatising Welfare: After the Lost Centur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6), pp. 51 – 61.

福 利

因为补偿利惠的承诺不会是没底的。

无疑,正是社会保险型福利的成本以及不那么让人满意的质量导致对基本福利物品供给方式进行认真的重新检讨。在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国家福利的成本似乎无情地增长,而且基本上不受一般经济命运变迁的影响。尽管已经计算出^①,要在以后几十年里维持英国目前的福利体系,就需要政府在服务方面只能花费国内生产总值的5%附加,而这本身就意味着税收负担会有相当大的增长。社会调查常常表明,纳税者愿意支付教育和健康方面的额外开支,但是他们回答这些问题时,没有其他方案可供选择,而且没有支付附加成本的经验。当他们走向投票站时,他们倾向于惩罚那些威胁增加税收以保证普遍福利开支的政党。一个同样重要的观点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传递人们对有价值的公共福利物品——特别是健康和教育——的欲望方面,选举体系是没有效率的。这就是人们为什么选择“退出”并私人购买它们的原因。

福利国家的真正危机可能来自政治授予的担保不能得到尊重。这里的经典例子是国家退休金,它是以“即用即付(PAYG)”方式支付的;在这种安排下,年轻一代工作者要为当前退休的一代支付退休金,其前提假定是,下一代会遵守这种承诺。退休金供给的这种准契约模型不好似完全依靠证券市场的体系。后者不易受人口变迁的影响,而前者则不然,譬如说,发达的西方民

^① J. Hills, *The Future of Welfare: A Guide to the Debate* (York: Joseph Rowntree, 1997), p. 14.

主国家出生率正在下降,这让“即用即付”体系变得难以为继。但是,大规模投资私人保险基金会导致经济中的资本结构的深化,以致产出能够在工作资源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得以维持。英国退休金问题的严重性比欧盟其它国家要低,因为该国有更多的人处在私人体制中(除了基本国家退休金之外,它的价值很低)^①。该国有一种工资制退休金,它是为那些不属于私人职业体制的人保留的。由于类似这样的安排,英国的福利体系还没有面临国家主义色彩更强的国家所面临的那种危机。

几乎所有国家退休金计划起初都有基金支持的目标,因此它们在技术上不是再分配型福利,但是这个目标从未实现过。尽管美国在里根领导下对退休金体系进行了改革,旨在建立“信托”基金,减轻未来一代的负担,实际的退休金捐献用来支持公共开支,以致信托资金包含了政府债务,这个债务有一天是要偿还的,如果退休金承诺受到尊重的话。这将证明是极其昂贵的;的确,大多数年轻的美国人设想,当他们退休时,他们将得不到社会保险(或者至少没有他们父母一代所得到的那么多)。

除这些明显的问题外,国家退休金计划另一个反常特征开始吸引了福利理论家的注意:它是嵌入国家计划中的隐性不平等。如果它们是工资挂钩的,工作时间的不平等在老年时被简单地复制了。这在基金安排中没什么错,因为它们中的更高支

^① N. P. Barry, “The New Right and Provision for the Elderly”, in G. Jordan and N. Ashford (eds), *Public policy and the Nature of the New Right* (London: Pinter, 1993), pp. 251 - 67.

付来自特定个人的更高储蓄；但是，因为“即用即付”计划是非基金式的，它们比合适的保险更像福利安排。然而，美国也有同样的争议性不平等，它发生在种族之间。平均说来，白人比黑人活得更长，因此年轻的黑人工人在支持境况更好的白人过老年生活^①。当然，妇女在国家退休金体系中的地位总是反常的；她们退休得更早而通常有更长的寿命预期。所有这些不平等都没有代际不平等那么明显，但是当“即用即付”退休金计划成熟时，它们将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这里所产生的不平等与由国家福利带来的偏向境况较好者的反常再分配有着相同的逻辑；它们在第六章考察过了。

现有的私人退休金体制已经说明，实施它们是完全可行的。1980年代的智利成功地从一个完全的国家体系转变为一个基金体系^②。尽管为老年储蓄是强制性的，但是公民在他们的投资选择中有相当的自由（尽管它并非没有限制）。新加坡的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产生了某种类型的基金安排，尽管它比智利有更多的中央指导。尽管这些安排中存在某种强制，以致福利理论家所描述的人们所熟悉的问题，如道德风险等，能够被解决，但是它仍然与相当程度的自由选择相一致。惟一的困难似乎会发生在成熟的“即用即付”计划的私有化过程中，因为一代人将不得不两次付费，一次为当前的退休者付费，一次为自

① *Ibid.*, pp.256-9.

② E. Butler and M. Pirie, *The Fortune Account* (London: Adam Smith Institute, 1995), pp. 7-12.

己的老年付费。

福利的未来

本书第一版有个强烈的暗示,它在这些最后的想法中得以强化,那就是 20 世纪中叶将福利与国家福利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在概念层次上,幸福资源确实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不仅可以来自自愿组织、教会等等,而且可以来自市场本身。国家相对来说是这里的后来者,它早期卷入贫困问题时没有关注人们福利希望和理想的复杂性;它没有提供保健、教育或退休金等。

这里有个认识论问题:根据国家福利的早期批评,没有什么中央组织能够拥有关于人们福利目标的知识,或者关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的知识。所有这些信息都被锁在公民社会的复杂性之中,并由地方的、个人的和其它类型的非强制行动进行着最好的协调。国家或许应该将自己的作用局限在减轻最明显的剥夺方面。还应该经常对道德风险保持警惕,1834 年济贫法的设计者就保持了这种警惕,尽管方式有点夸张。

正是由于现代世界的许多福利问题似乎是由国家行动引起的,所以许多理论家转而寻求较少强制性和强迫性的方法来实现福利。这种强调地方主义和自愿主义的新思路既覆盖了基本的福利需求,又覆盖了“更高级”的福利物品如教育和保健的供给。

在对美国福利所做的阴暗评论中,纳桑·格莱兹写道:“每一项社会政策都是对某种传统安排的替代…其中公共权威代替

福 利

了——至少是部分代替了——家庭、族群、邻里和自愿结社的作用”^①。人们还认为,美国人对穷人的自然同情被滥用了,因为从 1930 年代反萧条战略到 1960 年代的伟大社会改革,国家变得要对人们幸福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负责。当国家成为单独的供给者之后,福利的给予者和受益者之间的互惠关系枯萎了。市场的自我主义传递到公共领域,以致福利接受者没有承担任何义务,以回报他们的援助^②。

倾向自愿主义和地方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它们让道德风险更容易克服;分散化的主体输送福利更可能拥有福利问题所赖以产生的环境方面的知识,并且更警惕福利体系的滥用。不管福利是私人输送还是公共输送,这个考虑都适用。

现在大量的历史证据说明,在 20 世纪社会保险到来之前,覆盖疾病、失业和老年的福利计划就已经处在适当的位置。在 1911 年自由党政府进行社会保险立法之前,就有大量的友好社会和其它自愿组织^③,它们包容了大部分人口。这里没有强制——许多理论家认为必须用它来克服逆向选择问题,而且这些组织的覆盖范围是广泛的。引人注目的是,友好社会(以及以工会为基础的福利组织)现象似乎在所有的西方社会都很常见。在强制性福利国家对自愿组织进行阉割(德国和英国也发生过)

① Nathan Glazer, *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

② Marvin Olasky,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 (Chicago: Regnery, 1992).

③ See D Green, *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3).

之前,美国有繁荣的友好社会网络。同样有意思的是,英国和美国的职业医疗协会^①在促进政府颁布的健康标准方面很活跃,因为它们害怕被由友好社会提供的更经济的服务切割了。

在概念层次上,关于福利性质的争论将会以同样的烈度继续下去:这种争论持续在有点过时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分类中进行。它们是误导性的,因为集体主义已经开始意味着国家指导,而解决福利问题的某种集体行动是自愿的而且有很长的历史。福利成本被外部化,但没有推到一般纳税者身上。这些活动是真正社群主义的案例,因为它们只来自离散群体和自愿组织的自发行动。社群主义常常是作为私人行动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在福利理论中,那通常意味着反对私人保险),而且它过分支持强制性国家计划的共同消费。在未来的福利世界中,扩张的真正私人的保险安排与自愿组织结合在一起,可以很好地与到目前为止占支配地位的福利国家进行竞争。

在英国,福利争论可能关涉与财产调查式福利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它们对当前的福利问题贡献良多,而且在未来几乎肯定要贡献更多。它们带来了贫困圈套,其中,从失业到工作反而带来利益损失,这会继续成为相当强的工作反动力。它们还提供大量的欺诈诱惑。尽管在英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不断成长的而且几乎是永久性的“底层阶级”问题——美国正在处理的问题,但是,有迹象表明,该国在往那个方向前进。在两个国家,福利较少地涉及对被剥夺者的临时援助,而较多地涉及将一种永

^① D. Green, *ibid.*, ch. 7; M. Tanner, *The End of Welfare*, op. cit. p.41.

福 利

久性生活方式提供给已经被分离出来的那类人。拟议中的补救方案,如保障最低收入计划、将人们重新整合进国家保险体系等,可能成本太高,至少短期内如此。解决福利问题的任何“理性”方案似乎都会碰到不能克服的问题,它们又似乎来源于人性。

参考书目

还没有一本从分析角度或从历史角度完全讨论福利问题的一般性“教材”。作为一般性介绍来说,下面著作特别有用:

Clarke, J., Cochrane, A. and Smart, C., *Ideologies of Welfar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987.

George, V. and Page, R., *Modern Thinkers on Welfare*.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London, 1995.

Goodin, R., *Political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5.

Griffin, J., *Well-being*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6.

Hils, J., *The Future of Welfare*,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York, 1997.

Ignatieff, M., *The Needs of Strangers*, Chatto and Windus, London, 1984.

Pinker, R., *The Idea of Welfare*, Heinemann, London, 1979.

Plant, R., Lesser, M. and Taylor – Gooby, P.,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Welfar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980.

福 利

Taylor – Gooby, P.,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Welfar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84.

Weale, A., *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978.

Weale, A., *Political Theory and Social Policy*, Macmillan, London, 1983.

18 和 19 世纪的背景,尤其是功利主义兴起为一门公共哲学,对于理解现代福利理论非常重要。关于令人羡慕的总结,特别推荐以下著作:

Ekuland, R., and Hebert, F.,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Method*, McGraw, New York, 1984.

Finer, S. E., *The Life and Times of Edwin Chadwic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2.

Himmelfarb, G., *The Idea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 Faber, London, 1984.

Letwin, S., *The Pursuit of Certain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Quinton, A., *Utilitarianis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

Bobbins, L. C.,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cs*, Macmillan, London, 1952.

Schwarz, P.,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John Stuart Mill*,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 C. 1974.

Wilson, T. (ed.),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Essays on Adam*

Smith,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6.

有许多著作关于社群主义对 19 世纪个人主义的反应。最原始的文本是：

Hobhouse, L. T., *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4. First published in 1911.

对这个时期的评论,参见：

Freeden, M., *The New Liberalis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2.

Vincent, A. and Plant, R.,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Citizenship*. Blackwell, Oxford, 1984.

关于英国福利国家的发展,参见：

Bruce, M., *The Com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5.

Fraser, D.,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3.

Pope, R., Pratt, A. and Hoyle, B. (eds), *Social Welfare in Britain, 1885—1985*, Croom Helm, London, 1986.

Robson, W., *Welfare State and Welfare Society*, Allen & Unwin, London, 1976.

福 利

当代福利哲学常常植根于传统伦理和政治概念中,参见:

Berlin, SiI., *Four Essay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9.

Campbell, T., *Justice*, Macmillan, London, 1988.

Fried, C., *Right and Wro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78.

Gerwirth, A., *Human Righ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2.

Miller, D., *Social Justic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6.

Paul, E. P., Miller, F. and Paul, J., *Ethics and Economics*, Blackwell, Oxford, 1985.

Plant, R.,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Blackwell, Oxford, 1991.

Raphael, D D. (e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ights of Man*, Macmillan, London, 1967.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2.

Sen, A. L., *Poverty and Famine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1.

Sen, A.K. and Williams, B. (eds)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1983.

Walzer, M., *Spheres of Justice*, Martin Robertson, Oxford, 1983.

许多经济学文献是高度技术性的,远离当代争论,福利政治经济学可参考以下著作:

Atkinson, A. B., *Poverty and Social Security*, harvester, Hemel Hempstead, 1989.

Atkinson, A. B., *Incomes and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6.

Barr, N., *The 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Allen & Unwin, London, 1993.

Baumol, W.,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67.

Hamlin, A., *Ethics, Economics and the State*, Wheatsheaf, Brighton, 1986.

LeGrand, J. and Robinson, R.,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roblems*, Macmillan, London, 1984.

Ng, Y - K., *Welfare Economics*, Macmillan, London, 1979.

Pigou, A. C.,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Macmillan, London, 1920.

Rowley, C. K. and Peacock, A. T., *Welfare Economics: A Liberal Restatement*, Martin Robertson, Oxford, 1975.

Suden, R., *The Economics of rights, Welfare and co - operation*, Blackwell, Oxford, 1986.

福利国家的辩护,市场的道德和经济要求,参见如下著作:

Furness, N. and Tillon, T., *The Case for the Welfare State*, In-

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IN, 1976.

Goodin, R.,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5.

Goodin, R., *Reasons for Welfa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88.

Harrington, M., *The Other America*, Macmillan, New York, 1962.

Harris, D., *Justifying State Welfare*, Blackwell, Oxford, 1987.

Hoover, K. and Plant, R.,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Routledge, London, 1989.

Marshall, T. H.,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len, Heinemann, London, 1981.

Roemer, J., *Free to Lo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88.

Tawney, R. M., *Equality*, Allen & Unwin, London, 1968.

Titmus, R. *Essays on the Welfare State*, Allen & Unwin, London, 1958.

Titmus, R., *Commitment to Welfare*, Alen & Unwin, London, 1970.

Townsend, P.,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79.

Wilson, W. 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7.

对福利国家的怀疑和直截了当的批评,主要有以下著作:

Friedman, M., *Capitalism and 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2.

Friedman, M. and Friedman, R., *Free to Choose*,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81.

Gilder, G., *Wealth and Poverty*,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1.

Green, D., *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93.

Mead, L.,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Basic Books, New York, 1992.

Mead, L., *Beyond Entitlement: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Free Press, New York, 1986.

Murray, C.,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4.

Murray, C., *Small Government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8.

Nozick, R.,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lackwell, Oxford, 1974.

Olasky, M.,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 Regnery, Chicago, 1992.

Skidelsky, R.,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London, 1997.

Sowell, T., *Knowledge and Decisions*, Basic Books, New York,

福 利

1980.

Sowell, T., *Markets and Minorities*,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1.

Sugden, R., *Who Cares?*,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84.

Tanner, M., *The End of Welfare*, Cato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1996.

Tullock, G., *The Economics of Wealth and Poverty*, Wheatsheaf, Brighton, 1985.

Von Hayek, F. A.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960.

下面是福利国家支持者的著作,对批评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Goodin, R. and Le Grand, J., *Not Only the Poor: 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 Welfare State*, Allen & Unwin, London, 1987.

Le Grand, J., *The Strategy of Equality*, Allen & Unwin, London, 1982.

译名对照表

逆选择 adverse selection

依附儿童家庭援助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

异化 Alienation

利他主义 Altruism

反理性主义 Anti - rationalism

自主 Autonomy

慈善 Benevolence

边沁主义 Benthamism

贝弗里奇报告 Bereridge Report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因果解释 Causal explanation

公积金 Central Provident Fund

慈善组织社会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搅乳 churning

公民资格 citizenship

古典自由主义 classical liberalism

福 利

强制,强迫 coercion

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

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

社群 community

共识 consensus

契约论 contractarianism

谷物法 Corn Laws

协差 Co - variance

剥夺循环 cycles of deprivation

民主 democracy

依附 dependency

应得 desert

边际效用递减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指导者法则 director's Law

责任 duty

工资制退休金 earnings related pensions

教育 education

效率 efficiency

认识论 epistemology

平等 equality

均衡 equilibrium

欧洲人权协定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演化 evolution

外部性 externalities

| | |
|---------|---------------------------|
| 费边主义 | Fabianism |
| 自由 | freedom |
| 友好社会 | friendly societies |
| 礼物关系 | gift relationship |
| 大萧条 | Great Depression |
| 伟大社会 | Great Society |
| 健康、保健 | health |
| 无家可归 | homelessness |
| 个人主义 | individualism |
| 保险 | insurance |
| 人际比较 |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
| 正义 | justice |
| 社会的 | social |
| 知识 | knowledge |
| 自由放任 | laissez - fair |
| 自由意志主义 | libertarianism |
| 自由 | liberty |
| 自然的、天然的 | natural |
| 洛克原则 | Lockean principle |
| 宏观经济学 | macro - economics |
| 市场失败 | market failure |
| 市场社会主义 | market socialism |
| 马克思主义 | Marxism |
| 财产调查 | means testing |

福 利

医疗补助 Medicaid

最低工资法 minimum wage laws

垄断 monopoly

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互助 mutual aid

天然自由 natural liberty

需要 needs

负所得税 Negative Income Tax

新保守主义 neo-conservatism

新自由主义 Neo Liberalism

无牵挂 non-tuistic

客观价值 objective values

义务 obligation

本体论 ontological

机会 opportunity

帕雷托最优 Pareto principle

家长制 paternalism

退休金 pensions

即用即付退休金 Pay-As-You-Go pensions

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多元主义 Pluralism

济贫法 Poor Law

济贫法修正案 Poor Law Amendment Act

| | |
|------------|--|
| 贫困 | Poverty |
| 偏好 | Preferences |
| 囚徒困境 | Prisoner's Dilemma |
| 产权 | property |
| 公共物品 | public goods |
| 互惠 | reciprocity |
| 再分配 | redistribution |
| 租金控制 | rent control |
| 租金收入 | rental income |
| 责任 | responsibility |
| 权利 | rights |
| 选择性 | selectivity |
| 自利, 自利动机 | self - interest |
| 社会契约 | social contract |
| 社会安全法 | Social Security Act |
| 斯宾汉兰体制 | Speenhamland system |
| 国家 | State |
| 主观主义 | Subjectivism |
| 征税 | Taxation |
| 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 | 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 |
| 时间偏好 | time preference |
| 滴流效应 | trickle - down effect |
| 联合国人权宣言 | UN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

福 利

底层阶级 under - class

失业 unemployment

失业保险 unemployment insurance

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非婚母亲 unmarried motherhood

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凭证计划 voucher scheme

想要 wants

福利和宪法主义 welfare and constitutionalism

福利经济学 welfare economics

福利权 welfare rights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

制度的 institutional

剩余的 residual

幸福 well - being

工作福利 workfare

译者后记

感谢谭君久教授的推荐,感谢朱海英同学的介绍。另外,感谢我的妻子王景女士,她不仅在生活上给我以细致的照料,而且为家庭提供了轻松、欢乐的气氛。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译文中难免存在一些错误,其责任自然由本人承担。

储建国

| | |
|----|---|
| 封面 | 页 |
| 书名 | 页 |
| 版权 | 页 |
| 前言 | |
| 目录 | |
| 正文 | |